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



我的修养要则

-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红岩。

全世界为他哀歌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北京刮着刺骨的寒风。它扫过大地，卷过长空，摇撼着树木，抖动着电线，发出一阵阵悲戚的呜咽声，仿佛在宣告什么震天动地的不幸的消息。

大风一直刮到第二天还没有止息。

当寒风又吹来一个黎明的时候，清晨五点钟，全世界都收到北京新华通讯社发出的沉痛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全世界都被这噩耗震惊了，人类的活动一时间似乎陷入停顿。各种各样的人群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品味出这消息宣告的严峻的事实所包含的全部意义。

当寒风中一传出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北京和全中国立即陷入了无边的悲痛海洋。泪水似乎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漂浮起来了。

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通讯手段都忙碌地传递着这个消息。

从那天开始到一月十五日（他的葬礼举行的日子），甚至以后更长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家中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对他的逝世发表了悲痛的声明或谈话；许多国家下半旗志哀，联合国旗也下半旗，同时没有升起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这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无数唁电和唁函飞向北京；各国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惊人的噩耗，有的报纸整版套上了黑框；无数电台播放这悲痛的消息，有的还播放沉痛的哀乐；周恩来的照片和影片资料，反复地出现在书刊报纸和电视屏上；无数普通的群众涌向当地中国使馆和驻在机关，表示自己的哀悼，悲痛汹涌在他们心里，热泪洒在他们胸前，全世界都为他哀歌。

一家外国报纸宣告：“全世界都哀悼他的去世，因为他是一个罕有的受人爱戴的人”；他“赢得了他的朋友和敌人的尊敬。”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的逝世震动了全世界人们的心？为什么他能赢得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尊敬？

我们应该知道，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把他光辉的品德、崇高的精神记下来，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一切中华民族的后裔，把他的精神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继承下来，永远永远地为我们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他这样的人物而自豪！

这本书不是他的传记，没有、也不可能记载下他全部的功业。只是为了让年幼的孩子们了解他，记住他，而搜集编写了关于他的一百多个小故事。

他在生前是不愿意任何人称颂他的。然而，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我们还是做了他不愿做的事。

周恩来同志，请您谅解吧，这是建设祖国的事业所必需的呀！

三个妈妈

在我们祖国的东南部，大运河和淮河交叉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这就是江苏省淮安县城。

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淮安县驸马巷里一户姓周的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降生的第二天，他的外祖父就离开了人间。这老人临死前听说自己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就颤巍巍地问了孩子的生辰八字，然后带着满足的微笑说：“好，这孩子有出息！”慢慢地阖上了眼睛。

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周恩来。他后来果然闻名世界。可是他没有满足外祖父重振家业的愿望，却成了家庭的逆子、埋葬旧社会的掘墓人。

新生的婴儿给全家带来喜悦，父母给他取名叫“大鸾”。鸾是与凤凰一样的“神鸟”。父母亲期待自己的儿子能够展翅高飞青云直上。

吉祥的名字一时没有发生效用，大鸾不满一岁，他的十一叔就病危了。年轻的十一叔刚满二十岁，娶妻才有一年。婶婶陈氏满心忧虑。于是有人提出让大吉大利的大鸾过继给十一叔，用他美满的天命来挽留十一叔的生命。那时候这叫做“冲喜”。这样，大鸾就从生母万氏的怀抱里，转到过继母亲陈氏的怀抱里。陈氏母亲又为他请了一个很好的乳母——蒋江氏。幼小的大鸾就有了三个爱他疼他的妈妈。

可是大鸾的到来并没有延长十一叔的寿命。不久，十一叔就望着新妇、婴儿告别了人世。从此，大鸾成了陈氏唯一的亲人。

三个妈妈把同样的慈爱给予大鸾。也以不同的性格，给大鸾以不同的影响。

生母万氏是周家这个败落下来的官宦之家的主妇。因此，她要应付许许多多场面事。明知缺钱少粮，还得维持周家的排场，这就要典当借贷；她还负责调解大家庭内部与亲戚的不和，为此四处奔走，排解纠纷。她处理这些家务大政的时候常常带上大鸾，使大鸾从小就懂得了大家庭内部的黑暗。万氏妈妈的口才、干才给大鸾以深刻的印象，可是他不喜欢妈妈办的那些事情。他不懂忙活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陈氏妈妈是个才学出众的女子。有丰富的诗词、小说、戏曲和绘画的知识。丈夫去世以后，她同大鸾相依为命，就用教儿子读诗词的办法打发日子。所以大鸾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许多唐宋名家的诗句了。当然，那时候他还不能理解背诵的诗句究竟说了些什么。陈氏妈妈还喜欢给他讲故事。孙悟空、张飞、岳飞……的形影从小就活动在大鸾心头。

乳母蒋江氏教给大鸾的是另一种知识，给他的慈爱更加纯朴而宽厚。比如吃米饭吧，蒋妈妈会把米饭的来历数落得清清楚楚。怎样播稻种，怎样插秧，怎样收割，怎样舂米。从种到吃要经过十几道关口，每一道关口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你以为吃米饭那样容易吗？才不哩！”这可是大鸾从另外两位妈妈那里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

有一次，四岁的大鸾问蒋妈妈：“瓜也是种出来的吗？”

“对喽，宝贝大鸾，瓜也是种出来的。”蒋妈妈告诉他种瓜的方法。

大鸾在花坛里埋下了一粒瓜子，天天浇水，可是总也不见绿油油的小苗钻出来。

“蒋妈妈，怎么我种的瓜，老不长苗呢？”大鸾问。

蒋妈妈一拍掌，笑了：“傻孩子，现在是冬天。春天种才行呢！”

于是大鸾盼望春天快快到来，他好去种瓜。

春天到了。大鸾和蒋妈妈种下瓜子，也种下希望。

南瓜生苗了。大鸾浇水呀、上粪呐，忙个不停。秋天，他收获了几个大南瓜。他高兴得很，同时钦佩蒋妈妈。蒋妈妈会帮他种瓜呀！这是那两位妈妈不会的。

不拜菩萨

大鸾喜欢跟蒋妈妈上街。街上有许多新鲜的人和事。他“可以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蒋妈妈也一样一样地回答他，从不心烦。

有一次，他见一个胖子坐在黄包车上，一个瘦子拉着车。大鸾问：“那胖子怎么不会走啊？”

蒋妈妈说：“胖子有钱，瘦子是穷人……你长大了，会挣钱，就可以坐黄包车，不走路了。”

大鸾摇摇头：“我会走路，不要别人拉！”他可不愿意光坐车不走路。

有一天，蒋妈妈带大鸾去东岳庙烧香。蒋妈妈相信天上有神，地下有鬼；神鬼都是威严的东西，不能得罪他们。她希望大鸾从小敬畏鬼神，也希望鬼神和自己一样疼爱大鸾，赐福给大鸾。

大鸾头一次进庙，奇怪地看着那些有三只眼睛或许多只手臂的神像。他不懂：神仙干嘛都长得那么怪呢？他偷偷地摸摸这个神像，碰碰那位菩萨。他看见一位小菩萨的手断了。走过去一看，嘿，神像都是泥做的。原来菩萨们是泥捏的大娃娃，不过更奇怪更有趣一些。

“大鸾，乖孩子，过来，给菩萨磕头！”蒋妈妈细声细气地招呼他。

“不，我不磕。”大鸾扭动着身子向后退去。

“为什么？”蒋妈妈睁大眼睛小声问。

“那是泥捏的。”

蒋妈妈的脸吓黄了，连忙捂住大鸾的嘴：“哎呀，罪过，罪过……”

旁边几个最敬畏鬼神的香客生了气：“你这位大嫂真不懂事，为什么把孩子领进庙里来，还让他胡言乱语。”

蒋妈妈生了气，把大鸾拉到院子里，数落着：“你呀，小孩子说这话，神仙要生气的。看你长大了怎么办？我真白疼你了。”

大鸾觉得委屈，不给大泥娃娃磕头有什么错呢？整整两天，他都不和蒋妈妈亲近。

把神和大鸾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蒋妈妈觉得还是大鸾比神更可爱一些。所以，没过几天蒋妈妈就忘记了大鸾不敬神的“罪过”，把大鸾领到自己的家乡去玩了。

一年中失去两位妈妈

大鸾五岁的时候进家塾读书（家塾是大家族办的私人学校，只收本家族或近亲子弟入学，老师都是些只有旧知识的秀才，所教的书也是什么《四书》、《五经》之类），学名恩来，字翔字。新的生活开始了。但是他家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窘迫。大鸾的祖父周攀龙原是浙江省绍兴县人，来到淮安县做官。先是给县官当“师爷”（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到老了才当上个县官。可是偏偏赶上有个有后台的前任县官，长期赖着不肯交印。所以等到他正式上任的时候，已经病体奄奄，不久就死了。他并没有给家庭留下什么财富。

大鸾的父亲周贻能，是个忠厚老实人，学做师爷不成，只好在外地做些小事情。大鸾的生母万氏，虽然是县官的第十二个女儿，最受疼爱，可是大鸾出生第二天，那位老太爷就离开了人世，所以万家的日子也一天不如一天。

大鸾的万氏妈妈，常常住在自己的娘家清江浦。她曾抱着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同自己一个兄弟合买了一张彩票。彩票是一种赌博，几个人发财，千万人上当。所以万氏妈妈也没有对这张彩票抱多大希望。谁知道开彩的时候，她和兄弟却中了彩，两人合得一万元。这是大鸾五岁那年发生的事。

意外的五千元收入，使万氏妈妈费开了心思。留在淮安县城继续当周家的主妇吧，这五千元会很快填进穷困的无底洞里。于是，她决定带着儿子回到清江浦娘家去住，过一段安宁舒适的生活。弟媳妇陈氏，是自己长子的过继母亲，蒋江氏又是儿子的乳母，自然要同自己一道走。这样，大鸾——恩来六岁的时候，随着三位妈妈一起搬到清江浦外婆家。又进了万氏家塾读书。

五千元的收入使万氏妈妈挺了挺腰，也换来家人对她的尊重。

万家虽然也已开始衰败，但是还留着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的架子。接待客人的房间自然是宽敞的，花园自然是幽静的，就是屋里的陈设也算得上讲究和典雅。然而更吸引恩来的却是外祖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藏书。万氏家塾办得非常之糟。教书先生的学问只可混饭，绝无独到的见识。陈氏妈妈不满意这位落第秀才，怕耽误了儿子的前程，因此支持恩来选读各种有益的书籍。于是，万家的藏书就成了恩来童年时代获取知识的宝库。

隔了一年，万氏妈妈和陈氏妈妈都主张单请一位先生来教孩子读书，再加上大家庭的种种矛盾，于是他们又搬进了另一所住宅。在新居里，恩来的学业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三年过去了。万氏妈妈的五千元钱快花费完了，穷困又重新袭击他们，家族里的人们又开始递给他们冷落与白眼。

一九一七年春天，恩来刚刚九岁，万氏妈妈在悲叹中去世。内心凄凉的陈氏妈妈摸着恩来的头说：“大鸾，我也活不长了！”

万氏妈妈死了，外祖母为了维持官宦人家的面子，非要厚礼安葬不可。恩来的父亲没钱，只好唉声叹气，万氏妈妈的棺木也一直不得安葬，停放在庙里。幼年的恩来不懂得为什么往日的恩爱都一齐化作了冷漠无情？为什么不为活着的三个外孙着想，却偏偏为了死者家族的面子大花钱财？他感受到大家族的丑恶。他悲愤和痛苦，他不能理解这奇怪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陈氏妈妈为了解除心中的痛苦，也为了治病，带大鸾到自己的家乡宝应县去。

在陈家，恩来认识了比自己大十二岁的表哥陈式周，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

在宝应，陈氏妈妈的病更加重了，他们又搬到淮阴县城。不久，陈氏妈妈也被痲病夺去了生命。作为长子，恩来从九岁就担负起人们对一个成年人要求的责任。他没有在生活重压下屈服。他提出：陈氏妈妈简便人殓，遗体运回淮安县和十一叔合葬。

一九一七年秋冬之交，落叶纷飞，西风萧瑟，九岁的恩来，带着两位弟弟，扶着陈妈妈的棺木，在人们的白眼和冷落下，乘船回到淮安县城。

一年中死去了两位妈妈，家人们也从笑脸相迎变成鄙薄和冷谈。这变化使九岁的恩来一下子长成大人。他在生活的悲喜剧中成长了。

鸽哨

淮安是个美丽的地方。浩浩的淮河向东流去，宽广的大河直通北京。

童年的恩来曾经在文通塔下挖过野菜，在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关天培的祠堂里流连，还常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

恩来小时候喜欢放鸽子。

淮安县城中心有一座宋代建成的镇淮楼，高大雄伟。恩来小时候常常爬上这座高楼去放鸽子。当一只只鸽子展翅飞翔的时候，恩来的心也飞到了高远的天空。他多想能生出翅膀飞到祖国四面八方，飞到辽阔的宇宙去看看呐。

恩来有一个表哥叫万叙生，是他十三舅的孩子，比他大六岁，是位能干的养鸽子的小行家。表哥还会做鸽哨，一只只鸽子拴上木制的小哨，飞行的时候就迎风发出悦耳的哨声，好听极了。恩来多想有那样的鸽哨哇！表哥看出他的心思，要把自己做的鸽哨给他。他不要，一定要表哥教给他怎样做，他要亲手做出好听的鸽哨来。

表哥细心地教给恩来，恩来耐心地学习，他终于做出鸽哨来了。他和表哥一道登上镇淮楼，把小小的鸽哨拴到鸽子身上。他轻轻张开双手，鸽子扑棱一声飞上蓝天。从天边、从云际，由近到远，响起一串悠长、动听的鸽哨声。恩来睁大眼睛，思绪跟着鸽哨声缠绕在云头。一会儿，鸽哨声又由远而近，他知道，自己的鸽子又飞回来了。他和表哥沉醉在鸽哨声带来的沉静、安详和遐想里。这快乐是自己的劳动带来的呀！

以后，恩来的鸽哨越做越好。

为丫头鸣不平

两位妈妈去世以后，由于家境困难，恩来不得不辍学。只有蒋妈妈的慈爱，给这段凄苦的日子撒下点温暖的光。他多么盼望能够重新上学读书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高兴极了。这是一个偶然的機會造成的。

有一天，恩来跟蒋妈妈一起到表舅龚荫苏家探亲。表舅喜欢恩来的勤奋好学和聪明，同情他目前困难的生活，怕他荒废了学业，就让他到龚家的家塾去读书。这样，恩来的生活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表舅龚荫荪是个革新派人物，尊崇孙中山先生。他常常变卖家产，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之间，支援革命。在家里，他带头剪掉清朝政府命令人人必须留的辫子。他不信鬼神，不让女儿缠足，主张男女同校。所以，恩来就和自己的表姐妹成了同学。表舅还聘请了一个有学识的开明秀才周先生当家塾的老师。自己除了有丰富的藏书外，还购买宣传近代科学、西洋文明的新书刊。这些对恩来都十分有益，为他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条件。

恩来同龚家的表姐妹、表兄弟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常玩“捉洋鬼子”的游戏。内容都是义和团的故事。“洋鬼子”和“坏蛋”捉到以后，由恩来当“法官”进行“审判”。最后总是恩来站在台阶上严肃地述说“洋人”、“坏蛋”的“罪状”，宣布对他们的惩处。于是，所有的“战士”们都齐声欢呼。

有一次，曾经在龚家当过丫头、又被她父亲领回去的姑娘，偷偷地跑回龚家要求收留。原来她的父亲是个鸦片烟鬼，把她卖给一个有钱人当小老婆。这个有钱人常常打她。她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又偷偷跑回龚家。龚家的老太太摇头叹气地说：

“唉，忍着吧，这是天命！你还是回到夫家的好。”

恩来听了以后，顿顿脚，说：“不！让她住在这里，永远不要到那人家去！”

老太太说：“真是小孩子见识。要是夫家来找她，怎么办？”

恩来说：“要是那人来找，大家一齐动手把他打出去！”

“打出去？”

“是啊，他能欺负一个女孩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同他讲理，把他轰出去！”

老太太听了摇头，连连说：“孩子话，孩子话！”

可是表舅龚荫苏听了却大加赞赏，点着头说：“嗯，好！恩来这孩子有见识、有肝胆，将来一定有出息。”

离开家乡

在表舅龚荫苏家读书的生活给恩来带来新的希望。他知道表舅是爱国的，他希望跟表舅走出家乡，挣脱家庭的牢笼，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有一次，表舅又要远行。恩来缠着表舅，要求带他出去。表舅非常称赞他的志向，但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表舅说：“你年纪还小，妈妈去世了，父亲又不在家，我不好带你出去。你再读几年书，等长大了再说吧。”

表舅走了。接着龚家又发生了变故，全家搬到淮阴县。恩来又不得不整天陷入令人厌烦的家务中。他苦闷极了，盼望着有一个机会能从这庸俗无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一九一一年春末夏初，恩来十二岁。有一天，他的三伯父从外地回到家乡，带来了在东北工作的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的信。四伯父希望把恩来送到东北，在自己身边读书。恩来高兴极了，立刻束装出发，跟三伯父离开了家乡。

翔宇，这是恩来的另一个名字，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凤凰一样的神鸟——大鸾——应该自由自在地在宇宙间翱翔。可是，十二年来，这个少年的手脚却被封建家庭所束缚。如今，他挣脱了这枷锁，开始飞翔了。他看着美丽的家乡，心里默默地祝福疼爱自己、共过忧患的蒋妈妈，默默地同小伙伴告别，向着远方，向着陌生的地方，也向着未来，出发了。

寒风中的“弱小者”

一九一一年夏，周恩来到了东北。他先在铁岭的银岗书院哲读。当年秋天，他进入奉天府（今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这是一所设备很好的学校，在县城大东门外万泉河畔，校舍是两栋红柱青砖的两层楼房。

淮安是南国水乡，风光秀丽，有生满香蒲和莲花的勺湖，有滚滚滔滔的淮水、运河；沈阳呢，干燥寒冷，风霜袭人，有飞舞的白雪，还有冰封的流水。恩来从南方乍到北国，人地两生，吃的是不习惯的高粱米、玉米面，又加上身体历来“文弱”，一个孤零零的少年，难免会觉得处处困难。还有一些好欺负小孩子的大同学，瞧不起他，经常打他。

这些困难摆在他面前，怎么办？

恩来是个顽强的人。冬季，每天清晨，天边上还留着几颗残星，恩来就在学校附近的万泉河边跑步了。寒风吹在他脸上像刀割一样，呼出的热气在他胸前凝成冰花。他全不顾，只是一步步地跑哇，跑。三年过去了，他终于改变了生活习惯，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增强了体质，锻炼了肠胃，他变成一个健壮英俊的少年。

为了对付那些好欺负小同学的大孩子，恩来就和许多受欺负的小同学交朋友，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被欺负者“同盟”。大同学无论欺负哪一个同学，大家就一起上前评理，保护弱小同学。那些大同学在这“联合战线”面前失败了，再也不敢欺侮人了。现在他们知道，这个“弱小者”原来是个聪明坚强又坚持正义的少年。

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

现在的男人是不留辫子的。但是，在清朝政府统治的封建时代，全中国的男子必须在脑后梳上一根“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男子梳辫，本来是满族人的装束，满族的统治阶级占领了全中国以后，就强迫全国男子留辫，作为臣服的标志。要不然，就被当作“反叛”，抓去砍头。梳辫子，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很大的风波。到了清朝末年，革命派人物首先剪掉自己的辫子。因此，剪不剪掉这么一根小小的辫子，就成了那时候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那时候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学堂里有位从山东来的史地教员高亦吾，是位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在宣统（清代最末一个皇帝溥仪的年号）年间，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剪去了辫子，表示他痛恨列强和腐朽的清朝政府的决心。

一九一一年，恩来进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学堂读书，直接受到高亦吾老师的教育。高老师常在课堂上激昂慷慨地宣讲革命志士的爱国英雄事迹，宣传爱国思想，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有一次他向恩来和同学们讲述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广州起义失败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他讲得悲壮激越，恩来听得心潮翻滚，热泪满腮。高老师还常常把当时的革命书籍介绍给同学们。恩来读了高老师推荐的《革命军》，深深地被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九岁时写的这本书所感动。年轻的恩来，壮怀激烈，决心为了救国救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

这年十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获得成功，推翻了清廷，建立了中华民国。消息传到沈阳，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在欢呼声中，年轻的周恩来赶忙找来剪刀，剪掉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他是学校中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为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常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自己在阅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当时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怎样救国和宣传救亡的问题。

周恩来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认真完成课外作业，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有礼貌，守纪律。他特别注意课外阅读，来弥补课堂上学习的不足。他所读的书报，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了社会科学的书籍外，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的书籍也是他喜爱的读物。他还能把几本书的内容对照起来阅读，加以比较，探求最科学的内容和答案。

有一天，东关模范两等学堂的魏校长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

大家纷纷回答。

有的同学说：“为了给自己将来找条出路。”

有的同学说：“为了能发财致富。”

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

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

周恩来站起来，大声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兴盛，像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而读书学习。

老师和同学们都敬佩地望着他。

周恩来在小学三年，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经被选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印行，这篇题目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感言》的文章，后来还收入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成绩精集》这两本书里。这篇九百多字的文章写得非常精采，其中对于老师、同学充满着热情的希望，希望师生一道以担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这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中学毕业以后，赴日本留学前，曾经回到沈阳母校，看望诸位师友。他给一个要好的同学写了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相约当中华民族独立、繁荣的时刻再相见言欢。这位同学一直把这个题字珍藏了四十年。一九五七年，又送给周恩来总理，两位老同学终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重逢，畅谈了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只有一件蓝布长衫

一九一三年春天，恩来完成了小学各门课程的学习，准备报考天津南开学校。

恩来就要离开沈阳，离开亲爱的老师、同学了，师友们纷纷同他话别。恩来提起毛笔，给母校同学留下了一幅题词，“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然后登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天津。

一九一三年八月，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编入一年级己三班学习，同住在天津市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的伯母周杨氏一起生活。

他的这位伯母，心地善良，勤劳朴实，懂得一点医术，还能编织一些日常什物。她主要靠丈夫周贻虚从沈阳等地寄来的钱维持生活。恩来平时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回家看看。

他在天津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伯父的收入本来就并不多。还常常失业。因此，并不是每月都能有钱寄到家里。这时候，伯母就靠编织挣些钱，尽量安排好恩来的生活。恩来呢，就尽量在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学校抄写教材或刻蜡版，挣一点钱来贴补家用。他从小就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工作起来又认真负责，所以他抄写的材料和刻的蜡版，字迹工整、清晰、美观。老师们对他也很关心，经常给他找一些这样的工作，来减轻他经济上的窘迫。那时候，恩来只有一件蓝布长衫。南开学校又是有名的学校，校规很严，要求学生的穿着必须整洁。而恩来又是从小就爱整洁的孩子，他的衣服不论怎样破旧，都要补好、洗净，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他非常爱惜这唯一的一件蓝布长衫。每到星期日他都自己动手洗净，当夜烘干，星期一又穿着它去上学。

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贫穷的生活，更激发了周恩来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他吃饭极其简单，常常从家里带一小罐酱当菜吃，有时候就到南开校门外不远的豆腐房买些最便宜的豆腐充饥。可是他学习的欲望却特别强烈。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全校举行作文会考，他又得到第一名。他才思敏捷，作文不打稿，挥笔成篇，受到老师同学们的称赞。

他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搜罗能得到的一切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书刊。有一次，他看到一部《史记》精印本，爱不释手，就把伙食费全掏出来买回这本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他的英文基础原来并不太好。报考南开学校之前，特地到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刻苦攻读，很快掌握了英文。在中学读书期间他读了不少英文著作，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南开的校史上是少见的，使得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南开学校是著名的学校，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教学作风比较民主。但是课业重，考试难，学费贵，学校里还从来没有收过一个免费生。周恩来贫困的生活和他优秀的学习成绩，强烈地触动了老师们的心。老师们经过议论，极力向学校领导推荐，终于感动了学校当局。从周恩来入校的第二年起，学校宣布免去恩来的学杂费。他成了南开学校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大江歌罢掉头东”

一九一七年，是恩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寒假期间，他到河北省开平县耿家营一位好友家作客。开平是开滦煤矿的所在地，村里有许多矿工家属。恩来一方面看到了经济破产的北方农村，一方面又看到了在英国资本家奴役下的矿工悲惨的生活。这使他更加迫切地想寻求救国的道路。

在恩来上学期间，经常利用假期到农村、矿区参观游历，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眼界。还在沈阳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暑假期间访问过日俄战争的遗址——魏家楼子，在断墙残壁面前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誓言，感动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特意给十三岁的恩来写了一首诗，对他寄予厚望。所有这些走访，都使恩来更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坚定了他爱国救国的志向。

那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还没有爆发，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的真理，总是面向西方。中国的近邻日本学习资本主义，改革封建社会，成了东方的强国。因此，也有不少中国青年到日本学习，想从那里获得解救祖国的理论和方法。

中学即将毕业，恩来为自己的道路而思虑，他下定了救国的决心，决定到日本去留学。可是那时候他家境贫寒，一个只有一件蓝布长衫的学生要渡海赴日，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困难并不能阻止他。

他在六月底以品学兼优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七八月间奔走于津京两地，向老师同学筹措旅费。很多老师、同学都尽力帮助他，旅费很快凑齐了。

他就要渡海而去，离开祖国。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不心情激动呢？他仁立在屋中，凭窗遥望，思潮起伏，俯身到桌前，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的大意是：

唱罢“大江东去”的词章，我毅然掉头东渡远航；
我要深刻精细地探讨社会科学，来解救祖国的危亡。
我愿像古人一样刻苦钻研，达到“破壁而飞”的境地，
以此精神来改造今天的社会。

即使壮志难酬，我要跳入东海，为理想献身也算英雄刚强。

十九岁的周恩来就怀着这样的激情，慷慨辞国。他先北上沈阳，告别伯父，又向沈阳的母校师生辞行。九月初，穿过鸭绿江，从朝鲜的釜山乘船，横越滔滔的东海，渡向一衣带水的邻邦。

神田区的怒吼

一九一七年九月间，周恩来到达日本东京，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一起租了一间当地日本居里的小房子住下来。十月里，他进入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补习大学的功课，以后又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去旁听。除了学习，他还详细地考察日本社会的现状。

日本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像一个戴着白帽的少女。朝霞一样灿烂的樱花遍地开放。美丽的琵琶湖、壮丽的加马河都使人心醉如痴。可是，勤劳的日本人民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正过着贫困的生活。军国主义分子天天在疯狂叫嚣并且对中国大肆污辱。这一切都使周恩来愤怒、痛苦。他来日本是为了寻求挽救祖国的真理，可是日本的现状又使他陷进新的苦闷：解救中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就在这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俄国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到了日本。周恩来看到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介绍，和“过激党”（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赤军”（指列宁缔造和领导的红军）这类新名词，后来来到京都，又看到京都大学经济系主任河上肇教授主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他的心开朗了，仿佛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看到了一线光明，一个新世界的曙光。

周恩来在东京开始检查自己的思想，发现自己过去认为“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错了。因为他知道了军国主义“就是扩张主义”，也是“一定要被推翻的”。他决心每天花十三个小时去学习，要求自己：“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就要“随着世界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年轻的周恩来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了，他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他一到日本就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和“天津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刻蜡版，印传单，向旅日华侨宣传，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反对中国军阀政府出卖祖国。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把革命的苏俄当成敌人，遭到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加上日本神田区乐板警察局长在演说中肆意污辱中国，更使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同日本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这之前，五月六日，为了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要求，中国留学生在神田区的中国餐馆集会。周恩来为大会起草了抗议书，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污辱，抗议国内军阀的卖国行为。他们还向旅日华侨进行爱国宣传。日本政府派警察包围了学生的集会，逮捕了学生领袖。

中国学生汇合起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游行示威，又一次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中国学生就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馆召开抗议大会，决定集体回国，以抗议日本政府的暴行。

周恩来参加和领导了这次斗争，逐渐下决心早日回国，去参加一天天高涨起来的国内的革命斗争。

雨中游岚山

周恩来准备从神户乘船回国。

他从东京出发，路过京都，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当时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上还只是一个新的萌芽，但他已经在阴云密布的黑暗世界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一个新世界的曙光。一天，他在蒙蒙春雨中，游览了京都著名的风景区——岚山。

雨中的岚山美丽极了。一排排青翠的苍松，在细雨中更显得碧绿。在这绿叶的缝隙中常常有粉红色的樱花露出脸来，仿佛是年轻美丽的姑娘在对着山石间的泉水，照镜梳妆。薄薄的雨雾，像烟、像云，又像轻纱一样，缠绕在绿树红花上。雨过云收，薄雾中透出一线阳光，使景色越发娇妍。

年轻的恩来登山远眺这湖光山色，沉思默想，觉得这自然的风光里也包含着某种哲理。朦胧的雨雾正像纷乱的世界，让人感到昏暗，感到渺茫，而那穿云透雾的阳光，正像照亮自己心灵的真理。

他思索着，浏览着，一股诗情袭上心头。

后来，他写下了四首诗，来描述自己的心境。下面是其中的两首。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雨中两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萧萧雨，雾朦胧；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其二雨后岚山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制人的学说。
登山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在这两首诗中表露了他在迷茫中寻求到马克思主义的喜悦，表现了他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慨，抒发了他对未来的信心。

带着这样的心情，他从京都到了神户，登上航船，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中国五四运动的前夕，告别了樱花盛开的日本，回到生他养他的亲爱而又充满苦难的祖国。

一张发黄的名片

一九一八年七月，函馆商业学校的教师元木省吾因事从东京下关乘火车去香川县。他座位对面是一位英俊的中国留学生。

车开得很快，车窗外的田野、树木飞速地闪过。元木省吾看看对面的这位中国青年，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股深沉思索的目光，就同他谈起来。

交谈中，元木省吾发现这位中国青年的日语讲得很好，还具有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丰富知识。两人又用英语交谈。元木省吾惭愧了，因为自己连日常用的单词都忘了，而这位青年却说得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他们又用写汉字的方法交谈。他们的话题很广，谈到了天津，谈到了中国文学名著，中国的字典，还谈到了中日友好。当元木省吾称赞了中国之后，这位中国青年“显得非常自豪”。最后，两人互通姓名，交换了名片，希望彼此常常通信。回家以后，元木省吾把这次美好的相逢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

那青年就是周恩来。他的名片上写着：“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周恩来翔宇”，校名是周恩来亲手用钢笔写上的。这张名片一直在元木省吾的笔记本里收藏着。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元木省吾和夫人芳子非常高兴，他们凝视着这珍藏了五十四年的发黄的周恩来名片，心飞到了北京，多想再看看这位已经成了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呀。可惜，元木省吾不久就病重，不能动身了。他多次嘱咐他的夫人，一定要保存好这张名片，“将来有机会务必交给周总理。”元木省吾逝世以后，芳子夫人一直盼望着访华。实现元木的遗愿，谁知周恩来总理也不幸逝世。芳子噙着热泪说：“没想到名片还没交到周总理手里，他就离开了我们。”从这时候起，芳子夫人更加珍视这张名片，更加珍视两国人民的友谊。她说：“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但我愿继续为日中两国友好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她还表示，准备把这张发黄的名片交给她自己的儿子保存，让这张珍贵的名片成为中日友好的见证，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台印刷机

一九一九年七月，天津市南市区荣安大街的协成印刷局里，来了一位英俊的青年。他冒着盛暑，和工人一起排字，亲自校对稿件，搬运纸张，折叠报纸，然后和工人商量如何排版，又同印刷工人一道印刷，印出了一张张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就是这份报纸的主编、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周恩来。

这报纸是怎么办起来的？

周恩来一九一九年六月回到天津，正好遇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点是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大游行。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重新分配殖民地和瓜分弱小国家的“分赃会议”。中国由于参加了战胜的一方，所以也算一个“战胜”国。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派了代表出席会议，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秘密侵略条款“二十一条”。可是“和平会议”不但不理睬中国的合理要求，反而要把德国从中国山东抢夺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爱国运动的浪潮很快地席卷了全中国。六月三日，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大罢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商人也先后停止营业实行罢市。从六月三日以后，五四运动成为全国全民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

周恩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回到南开母校的。不久，他以南开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且积极筹备出版学生联合会的会报，亲自写了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号召青年革除一切旧思想，创造新世界。这份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道理的报纸，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周恩来受同学们的委托，担任了这份报纸的主编。

这份报纸原来每三天出一期，很快地改为日报，对开一大张，共四版，发行量很大，最多时每天两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这样，印刷就成了问题。为了让报纸能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周恩来索性把办公室搬到协成印刷局旁边的一间小楼里，编改完稿件以后，立即到印刷局里去，和工人们一道工作。

周恩来在排字房排版，一字字校对清样，又亲自上机印刷。工人们看见这样一位平易近人、吃苦耐劳、热情谦逊的“洋学生”，都非常敬爱，一到休息时间就围在他身边，提出各种问题向他求教。他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询问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愿望。

夜里，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常常围在周恩来身边，在昏黄的灯下听他讲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为什么做衣服的不衣穿，盖房的没有屋住，磨面的没有饭吃？”他问大家，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放着光。

“唉，咱们工人命苦哇！”有人叹息。

“不，不是命苦，世界上也没有命运这个东西。是资本家的剥削，把工人兄弟们逼到了穷困的地步。”周恩来说。

“剥削？”工人们睁大了眼睛，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对，是剥削，资本家剥削了大家。”周恩来用各种生动的比喻，解释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工人们听着，眼睛里闪耀出觉悟的光芒，眼前现出一片光明，好像昏黄的灯也亮起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们不再认命了。

周恩来用真理启发了工人，他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这都是在协成印刷局那架古老的印刷机旁发生的事。

如今，这台印刷机成了历史的见证，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向后代默默他讲述周恩来的事迹。

营救代表

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目叫《黑暗势力》的文章。作者在文章里满含悲愤的感情向群众呼吁：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

“山东学生游行，被军警捕去三百多人，关在第一师范，听说还要枪毙几个。

“北京大学学生被捕，现在警厅发出布告，连他们的事实，都不许报纸登载。

“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

“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

“要有准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是时候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周恩来。

这篇文章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它揭露的是“山东惨案”。

山东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受害地区，反日爱国运动也特别高涨。一九一九年八月初，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山东镇守使马良，凶暴地镇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山东学生，把学生押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礼堂里，听他的“训话”。他竟然无耻地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不饮水思源，宣称“学生没有爱国的资格。”学生们起来同他辩论，他就把一个姓吴的女生绑起来毒打。他还解散了救国团体，枪杀了回教救国会的三位领导人。

惨案的消息传开，引起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的愤怒。反动军阀政府不但不严惩马良，反而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加紧镇压，北京大学学生的请愿示威也被镇压，许多同学被捕。

面对这种情势，周恩来义愤填膺，在山东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发表这篇文章，号召群众起来斗争。

这篇文章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广大群众内心的怒火。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赴京请愿。

八月二十三日清晨，北京、天津的代表二十五人，到北京总统府门前递请愿书，抗议山东惨案，要求严惩马良。

这时候，天津的爱国团体领导人，特别是学联和《会报》编辑部的领导人，都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叮……”，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学联副会长一把抓起耳机：“北京学生会！请说罢，怎么样？……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马上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反动军警和便衣侦探捕去全部代表二十五人的消息，使人悲愤。

人们在电话机旁默然坐立，心潮起伏。

周恩来看了看大家，沉着地说：“用不着惊慌紧张，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我们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要紧的是营救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的话，使大家振奋。立即召开了《会报》编辑部的临时会议。周恩来作了请愿情况的报告，指出当前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进一步

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第二天，天津街头处处响起叫卖声：

“学生会报号外！号外！”

“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被捕了！我们要起来反对，要搭救代表哇！号外，号外！”

天津愤怒了，金汤桥头，海河之滨，到处是抗议的怒吼，一批一批的群众要求进京请愿。二十五日，天津组成几百人的请愿队伍奔赴北京。二十六日，京津两地共三四千人，列队向总统府进发。反动军警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反动政府拒不接见代表。代表们就不分昼夜坚持斗争。

留在天津的周恩来立即和女校学生代表郭隆真赶到北京，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代表的工作。他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一个个电话打到“总统”徐世昌那里：“不释放被捕代表，学生们绝不撤退！”天安门前，请愿学生怒吼着：“祖国万岁！”“自由万岁！”“不释放被捕代表誓不罢休！”烈日和暴雨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斗志。京津两地警察厅前，几千学生日夜呐喊。全国各地的抗议电函，像支支利箭射向徐世昌的心窝，弄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时候，山东省的议员们也给他拍来了火烧火燎的电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溃决，何以收拾。”意思是说，防备群众的舆论，应该远远超过防备洪水的暴发。一旦动了众怒，全国哗然，可怎么得了哇！徐世昌见了这电报更为心焦。

在周恩来等人机智周密的部署、指挥下，四面八方的进攻，全国舆论一致谴责。徐世昌害怕了，动摇了。八月三十日，他不得不释放了捅去的全部代表。

学生们高唱着爱国歌曲，胜利归来了。

新的觉悟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车里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到北京请愿的天津男女学生代表们。这些凯旋的战士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经受了息难考验的战斗友谊和沸腾在他们心里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打破了当时男女互不接触的界限，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车窗外，闪过祖国的原野。庄稼熟了，金黄的谷穗，一丛丛在秋风中摇曳，好像在向这些青年斗士招手。

车厢里，代表们谈兴正浓。他们由进京请愿斗争的胜利，谈到联合起来斗争的必要。身体强健、热情活跃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

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热烈的反响。一个男同学说：“依我说，‘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干脆加入天津学联，学联的阵容不就更强大了吗？”他的提议得到女代表们的一致同意。

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原来有两大主力。一是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一是以直隶（河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他们过去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形势的发展，把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课题提到面前了。代表们在飞驰的列车中热烈地议论着。

周恩来一直在倾听着代表们的议论，渐渐地，他心里有了一个明确的主张。他站起来，沉静地说：“如果这两大主力合在一起，那就不但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做法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好！至于具体的办法，我建议：第一，除了两个组织合并以外，还要把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几个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向各界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

他的话仿佛一缕阳光照进大家心里，使大家情绪开朗；又像把大家引导到高山之巅，使大家放开了眼界。郭隆真等人高兴地拍着掌说：“好，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

一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积极地筹划起来。他奔忙于两个组织之间，和各种观点的同学们交换意见。经过一个星期的充分酝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二十人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两个组织各有十人参加，男女平等。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温暖的秋阳照耀着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照耀着神采奕奕、分坐在会议桌两边的十个男青年和十个女青年。他们当中有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总统当面论战的勇士；有断指写血书赢得群众支持的英雄；有面对广大群众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有在反动军警的镇压下面不改色的中帼豪杰。他们都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令人激动的事迹。今天他们聚集到一起，将要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样，去开辟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站起来，眼睛里放着光，用压抑不住的激动声调说：“大家所殷

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

“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在庄严的气氛中，社员们彼此互相介绍，郭隆真特别介绍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让敌人头疼的演说家邓文淑（就是后来的邓颖超）。

周恩来接着说：“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觉悟社正式诞生了。

觉悟社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他的成员中，后来有不少人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觉悟社像一朵迎凤斗雪的红梅，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冬夜绽开了。它预示着革命高潮的春天就要到来。

省署前的怒吼

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已经进入南开大学读书。可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习，从事革命活动。十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福建省福州市开枪打死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造成福州惨案。周恩来参与领导了天津调查、焚烧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企图压迫中国反动政府，侵吞中国山东省的利益。北京反动政府竟然准备同意。这就引起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对“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更大浪潮。在天津，直隶省长曹锐害怕学生“闹事”，就命令教育厅长提前放寒假，迫令学生提前回家，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瓦解和镇压学生运动。

怎么办？

周恩来和觉悟社的中坚分子们决定组织学生同反动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在天津法租界一个叫“维斯礼堂”的地下室里，觉悟社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斗争的部署。

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可能要流血，要牺牲。可是每个人都争着打头阵。经过研究和周恩来的说服，终于决定了斗争部署：一月二十九日召开大规模的请愿大会，由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人出面领导，由邓颖超、刘清扬等留守指挥部接应；由谌志笃领导学生会的地下工作，另一名社员负责联络工作。

布置妥当了，大家立即分头准备。分别的时候，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周恩来等几位挺身而出的战友身上。周恩来拉着战友的手，充满信心地微笑着：“放心，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这一夜，天津分外的冷。寒风聚集着阴云，黑暗的夜空像一口无边的大锅扣在人们头上。在寒冷寂静的街道上，几个热血青年正为挽救中华民族而奔波……

黎明，天上飘着雪花。各学校的队伍，为了防备反动军警的镇压，分成三五人一小组，在约定的时间里，奔向同一个集合点：天津东马路青年会。

凛冽的西北风卷着晨雪扑向人群。人们沉默着，等待着总指挥部的号令。

讲演队长邓颖超向聚拢在道路两旁行将出战和助威的人群，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传单像雪片似地飞舞着，口号声一阵阵，像大海的波涛。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爱国热情在他们心头燃烧。

下午两点，出发的时刻到了，斗争的火山爆发了，周恩来穿着单薄的青布棉袍，外圍罩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褂，站在一家商店的高台阶上。他乌黑的头发在雪后的寒风中飘动，两道浓黑的剑眉显得格外严峻。他宣布了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请愿主张，要求大家严守秩序，然后跳下台阶，和郭隆真、于方舟等代表，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面。在他后面，无数的旗帜，无数的脚步跟上来，像大海的怒潮，涌向金汤桥畔的直隶省公署（河北省政府）。

市民们纷纷涌来，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呼口号，鼓掌助威。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激动地用拐杖跺着地，颤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意不可欺呀！”几位老太太用衣袖擦着眼泪说：“这些孩子可真是好样儿的，有他们，咱们中国亡不了，亡不了！”

挺身在前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天津学生请愿游行大军在寒风中涌到金汤桥畔，包围了省公署。

在省公署一间华丽的会议厅里，省长曹锐正心慌意乱地擦着头上的汗珠。警察厅长杨以德，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惊肉跳地站在角落里。曹锐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奴才，杨以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平时，两个人经常互相欺诈，像狗一样相互撕咬。今天，面对革命学生，他们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曹锐听着门外一阵阵口号声，眼里露出凶光，哆嗦着手指头指着杨以德：“你，你，你给我把警察全调来，全调来。……嗯！”

省公署门前，学生大军摆开了雄壮的阵容，周恩来等四位代表离开队伍，走向公署大门，要求面见曹锐，同他进行说理斗争。

曹锐哪里敢见学生代表呀！他急忙命令关闭大门。学生正要冲进大门，“哐啷”一声，大门关上了。代表被挡在大门之外。

“开门！”“我们要见省长！”学生们怒吼着。

大门边上一个小小的旁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蜡黄脸的人钻出来：“什么事，什么事？”

周恩来从容地走到他面前：“我们是天津学生代表，要面见省长，陈述我们的爱国主张。”

“这个……”蜡黄脸呲着牙说：“我是刑副官，有事对我说……”

话音未落，学生们怒吼了：“你没资格！”“共诛国贼！”“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争山东救福建！”“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炸雷般的口号声震破了他的肝胆。他打个寒颤，连忙说：“好，好，就去传达，就去传达！”缩肩拱背地钻进旁门。

二十多分钟以后，他回来了，狡黠地看看周恩来，皮笑肉不笑地说：“省长有病。不过大家既然来了，省长可以带病接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必须退到辕门（外门）外去。”

“辕门内外有什么分别？让我们立刻进去。”代表们反驳他。

“那，我再去回话。”副官又走了，半小时以后又回来，说：“代表可以见，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

学生们拒绝退出去，双方僵持了。

天色已近黄昏，代表们还不能进去。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倘若这么僵下去，队伍的斗志可能涣散，敌人可能会乘此下毒手。周恩来思考着，必须寻找打开僵局的办法。他忽然把眼光投向大门底下的门槛。那时候，大木门下都有一条一尺多高的横木门槛。警察们慌慌张张地关上大门，却忘了上门槛，留下了这一尺多高的门槛洞。周恩来心头一动，立刻招呼郭隆真等三位代表到大门前，用手一指门槛洞：“你们看！”代表们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从这儿进去！”

周恩来立即召集各校学生指挥，对他们说：“政府做贼心虚，不敢大敞仪门（内门），我们被拒于门外，不能申述大家的要求。现在只有从门槛空儿进去，才能打破僵局，开展斗争。我们进去以后，你们要在外组织好队伍，以应付意外的变化。”一个同学说：“哎呀，这样进去太危险。”周恩来坚定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纵然发生他事，也在意料之中。”同学们都被他这种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他们拉着代表的手深情地嘱咐

着：“今深入虎穴，望君等珍重！”

周恩来第一个俯身从门槛下进入大门，代表们也都跟了进去。

刚进入大门，门洞后立即窜出几个狼狗般的警察，劈头就打。周恩来、于方舟急忙抵抗，用身体护住两位女代表。那个蜡黄脸副官又来了，假惺惺地喝退警察，让代表们在两厢兵棚外室坐等，他去通报。

周恩来观察着四周，发现大问旁的墙头竖着一架高梯，是警察用来观察墙外动静的。他立刻爬上高梯，从墙头向外一望。啊，愤怒的人群依旧如潮，口号依旧如涛。他为战友们的斗志而激动，大声说：“代表们都已进来，诸位可耐心等等，各校指挥维持好秩序，如果没有圆满结果，我们誓死不归。如一点钟之后仍不见归来，就是失败了。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另寻办法，不获成功，誓不罢休。”

正在忧虑代表们安全的同学们，听到了周恩来坚定的声音，看见他英气勃勃的面容，都激动得流下泪来，表示一定要坚持战斗，做代表们的后盾。

可是，凶残的反动政府，早已布置了屠杀的计划。军队、警察、保安队、预备队埋伏在省署四周，只待曹锐、杨以德一声令下，就扑向手无寸铁的爱学生。

反动官吏还在应付代表们，周恩来敏感地察觉到卖国贼的圈套。他想，必须马上出去，组织另外的斗争。他刚要和另外三位代表商最，门外突然传来揪心的呼喊声，像松涛呜咽，像江河咆哮。周恩来心头一震，立即冲向大门口，可是，早已埋伏下的军警扑来了，四位代表都被逮捕了。

门外，惨绝人寰的镇压开始了。

西辕门、东辕门同时审出两队军警，一队持刀，一队拿枪、木棍和水龙，向学生们庄来。学生们先是慌乱地后退了两步，但是马上就镇定下来，手挽起手做然挺立着。他们向警察大声宣传：“我们请愿是为了救国，爱国无罪。”“警察也要爱国”，“别打爱国学生”……

突然，“哗……”，警察用救火的水龙向学生们喷来凉水。那正是数九寒天呐，学生们的身上，衣服上，都结起了薄冰

鬼头刀举起来了，枪托、木棍打下来了。

为了救国而奔走呼号的男学生浑身是血地倒下去了；为了反抗侵略而走上街头的女学生头破血流地扑在地上。爱国青年滚烫的热血呀，淌在海河之滨，洒在金汤桥畔……

反动警察们两个架一个，把周恩来等代表押往营务处。沿途，军警把路人赶往道旁，围性学生，阻断交通。一时间街道肃然，观者如堵。周恩来和代表们一起，沿途大呼：“同胞万岁！”“学生万岁！”“祖国万岁！”“打倒卖国贼！”街道两旁的群众都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第二天清早，士兵们用水龙费劲地洗刷着省署门前的街道。爱国学生的鲜血早已凝成晶奎的冰块，像花朵，像一颗颗红心，又像不灭的火焰，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向天津、向全中国的人民控诉呼唤！

智斗杨梆子

杨梆子就是天津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头子。北京反动政府嫌原任厅长张如桐镇压革命不力，特别换上他来对付天津的学生。这个大字不识、残忍阴毒的家伙，制造了“一二九”血案，逮捕了周恩来等学生代表，软硬兼施，想让周恩来屈服，没想到在智勇双全的周恩来面前他一次次地失败了。

杨梆子企图用既不审讯、又不释放的“拖”的办法消磨被捕革命者的意志。这阴谋早已被周恩来看穿。那时候，和周恩来同案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几人。周恩来就想尽办法组织他们一起斗争。

一次，周恩来写了很多纸条，趁晚上杨梆子对犯人“训话”的时候，悄悄地传给每个难友。回到牢房，大家打开纸条一看，见上面写着：“质问警察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

第二天，杨梆子背着手大模大样地巡查牢房。没想到，每个监房都发出了厉声的责问：“警察厅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什么不公开审判？”这可使杨梆子大伤脑筋。他知道周恩来在群众中最有威望，想从他那里探探虚实。他走到周恩来的牢房，周恩来不理他。杨梆子凑到跟前，刚要说话，周恩来手一扬，递给他已经写好的一张小纸条。他接过来横看、竖看，正看、倒看，还是看不懂。他不识字啊，可又不能丢了“厅长”的面子，哼哼唧唧地说：“好，很好。我回去考虑。”他回去找秘书一念，跟别人的质问一样，气得他干瞪眼。

杨梆子要报复了。

二月底一个下午，周恩来等代表被召到警厅花园的一个会议厅。杨梆子先是“训话”，满嘴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能忍能让，才算君子。只要各位说老实话”，一拍胸脯：“嗨，本厅长保准不难为大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接着，他发给大家一人一张毛边纸：“各位，省署交下几个问题，只要答得好，提前释放。”

大家打开纸一看，见上面印着二十一个问题，有什么：

“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组织？”

“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何人发行？在何处印刷？”等等。

周恩来看看题目，微微一笑，提笔一挥，交了回去。别的代表也都提笔作答。杨梆子高兴了，以为这回可算计策得逞。等到收回“试卷”，让秘书一念，他脸都气青了。原来周恩来的回答是：“不知道！”接下去还有两句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那龙飞凤舞的字迹，杨梆子虽然不认识，可每一勾一撇，都像铁钩、铁棒，撕扯他的心，敲打他的头。别的代表的回答，也是对他的一番驳斥，他气得跳脚骂了半天。

两个月过去了。警察厅依然拖着。

周恩来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和大家商定了斗争办法，决定四月二日起个体绝食，要求即日移送法院。

四月二日到了，全体被押的革命者拒绝进食。狱卒慌了，连忙报告杨梆子。

杨梆子这些天正在发愁。原来，觉悟社在邓颖超等带领下向全国各地揭露了天津“一二九”事件，全国各地抗议、声援的电报，信件如雪片飞来。

曹锐、杨梆子之流，已经陷入人民愤怒的大海。

这时候，又听说被捕代表绝食了。杨梆子呆若木鸡，翻了半天白眼。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叫狱卒把被捕人员代表找来谈判。

周恩来等五位代表来了。杨梆子死皮赖脸地劝代表进食，没想到周恩来等人向他提出了最后通告：“限三天内速即开庭公审，否则全体人员绝食自毙，以示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坚决态度。”

杨梆子慌了：“我侍诸位不薄哇！凡能成全诸位的我都成全，何必绝食呢！”“归法院不好哇，我不赞成。我这儿好歹总可以替大家想法子。我没成见呐！……”

代表们不理他这套，坚决表示：“我们的要求如不答复，大家绝不进食！”

代表们绝食的消息，飞过了监牢的高墙，传向社会。觉悟社留守指挥部作出决定，留校各校学生代表，自愿签名，前去替代被捕代表绝食。邓颖超、谌志笃带领各校二十四名男女代表，奔往警厅。

杨梆子正坐在屋里犯愁，忽听警察厅外人声鼎沸。一个警察跑进来：“厅长，厅长，坏啦！学生们又围上来了，说是要替换代表绝食！”

杨梆子傻了眼。他头一回碰到这种事，迂饿饭也有人自愿代替，他无法应对革命学生的行动。门外，一阵阵口号声叫得他心急如焚，监牢里，绝食代表的指斥，又使他心乱如麻。万一绝食者朋个好歹，那天津市的工人、学生、职员，连商人都会对他群起而攻，如何是好？

警察厅内外，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绝食和替代绝食，支援代表的斗争，坚持了三天。杨梆子终于垮了，只得答复代表，保证一两天内移送法院代表们含着热泪彼此握手，欢谈，庆祝初步的胜利。

四月七日晚，被捕两个多月的代表，分乘六辆汽车移往检察厅。

这时候已是春天，晚风中夹着微微的暖意，吹拂着代表们的头发。他们在汽车上高呼着“学生万岁！”“同胞万岁！”在天津群众敬仰的目光中，奔上新的战场。

在铁窗里

天津尽管是北方，春天降临的时候也有绿树红花；顽强的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牢里也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周恩来等二十一位代表从警察厅移送到检察厅以后，立即先发制人，赢得了在狱中看书学习、互相来往的权利。这二十一位代表来自学校、新闻、工商各界，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于是，周恩来和于方舟等人一起起草了“公共读书法”，取各人之所长，补各人之所短，互教互学，举办了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在敌人的牢房里办起了一所“大学”。这是当时天津最革命、最有成效、最生气勃勃的“大学”。

当曙光照进铁窗的时候，二十一位代表分住的五间牢房，就开始了沸腾的学习生活。有琅琅的读书声，有抑扬顿挫的朗读外语声，有激昂的演讲，也有倾心的交谈。晚上，不是难友们的“同乐会”，就是专题演讲会、讨论会，或者是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勉励会。

从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六月七日，周恩来给全体难友讲述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传。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到经济学，作了系统的介绍。在反动派的铁窗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很少见的。

除了学习，周恩来还组织大家制定了生活管理制度，开展各项活动，来提高难友们斗争的士气，使大家生活得乐观、活泼。四月二十八日是个屈辱的日子。一年前的这一天，巴黎和会强行通过把青岛划归日本，引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此一周年之际，周恩来为难友们作了青岛被占始末的报告。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周恩来又向难友们作了五四运动重要意义的报告。

他们还唱歌，说相声，演京剧、话剧，猜打谜，说笑话，进行象棋围棋比赛、智力测验和幻术表演。五一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来庆祝。以口吉替代乐器，用铺板代替舞台，吸引了不少警察来看。周恩来还亲自参加演出了两出话剧，一出是表现越南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救国镜》，一出是揭露上奈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连那些出身贫寒的警察们看后都受了感动，说以后再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了。

这样的铁窗生活，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弥补了极端贫乏的物质条件。革命的友谊把不同经历的受难者联结在一起。而作为组织者，周恩来的热情像通红的火苗温暖了每个难友的心，以至于有的人宁愿坐牢，也不离开这可爱的坚强的集体。

难友中有位年龄最小的中学生小陈，他因反抗警察的镇压而受伤，入狱后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越来越重。周恩来一面组织大家轮流看护他，一面和检察厅交涉，要求释放小陈到外面医治。并设法告知小陈的家属。通过请爱国知名人士出面具保，小陈才暂时出狱治疗。

两个月以后，小陈的病好了，又回到监狱里来。他一回来，大家为他召开了欢迎会。周恩来勉励他和大家一道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知识，炼身体，保持旺盛的斗志，乐观的精神，来适应长期困难复杂的斗争。

法庭上的斗争

夏天到了，天津的七月酷热难忍。周恩来和其他二十位代表的心，也像盛夏的骄阳一样，激动得仿佛要燃烧起来了。经过天津各界人民和被捕代表的坚决斗争，反动当局终于不得不公开审讯被无理关押了半年之久的代表了。

七月八日，是审判厅开庭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这次将要“审讯”所谓犯“骚扰罪”的周恩来、郭隆真等人。

这一天，觉悟社的社员们全部出动，到法庭上声援被捕代表。天津市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纷纷聚集到法庭门口，要求“旁听”。五百多义愤填膺的学生和群众冲破了警察的阻拦，涌进法庭，一霎时，座无虚席，过道、门外院内都挤满了人，连窗棂上也坐满了“听众”。

开庭了。主审法官怪出副威严的架势一拍惊堂木，嘶哑的嗓子吼着：“带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

周恩来等迈着坚毅的步子，精神抖擞地走上了“被告席”。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身上。钦敬、渴慕、鼓励的眼光给了代表们巨大的力量。周恩来望望大家，深邃的眼睛里洋溢着必胜的信心。

主审法官拖着长腔宣布被告人的“罪状”：“省署请愿聚集数千人，有周恩来等四人，不听副官拦阻，由门槛闯入，当被送警察厅拘留。在警察厅拘留期间，不服约束，凌辱官长，经警察厅转请省长，送交检察厅依法惩办……周恩来，以上起诉是否属实？”

周恩来轻蔑地一笑，手扶栏杆，大声地质问法官：学生们本纯真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权益，究竟犯了什么罪？学生们请愿，推举我们为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条王法？当局派军警，施暴行，对学生棍棒交加，造成血案，这又是哪条法律的规定？无理拘禁代表，不审讯，不释放，拘押半年之久，又依据了法律的哪一条？

这一连串质问，如利箭，似钢刀，法官张口结舌：“你，你，是我审问你，还是你审问我？”旁听席上“哗”地腾起一阵哄笑。

周恩来侃侃而谈，作了长篇发言。把法庭强加在代表身上的“罪名”逐条驳斥。法官无言以对，低头装作看桌上的案卷，不敢正视满庭愤怒的人群。

旁听的群众情绪热烈，一会儿齐声鼓掌支持周恩来的发言，一会儿又同声大笑，讥刺反动当局，还不断发出“嘘，嘘”之声，嘲弄法官。

法官如坐针毡，狼狈不堪，只好草草休庭。

七月十七日，开庭宣判。前来为代表们助威的人群不仅挤满了法庭院内，连门外的马路上也比肩接踵，水泄不通。

开庭了。一个衰老到连说话都没气力的审判长，满嘴漏风地宣读了“判决书”。

“判决书”一方面死要面子地硬说代表们有“罪”，另一方面又理亏心虚，宣布判定短期拘禁，又用非法拘禁的日数同“刑期”相抵，由法庭宣布“期满”释放。

“代表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人们立刻欢呼起来，把坚贞不屈的被捕代表们围住，争相握手祝贺，胜利欢欣的喜泪流洒在一起。

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以天津市民的名义，把闪闪发光的纪念章佩在代表胸前，纪念章上刻着“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群众们为代表戴上大红绸花，

分送到九辆汽车上。

在人群的欢呼中，周恩来等人满怀激情地去参加天津各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

聚会陶然亭

陶然亭是北京一个幽静的公园，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一定记得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在它古老的亭子里有过一次热烈的聚会。

这一天，天津的觉悟社和北京四个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曙光社的青年二十多人，在一起商讨爱国运动今后的方向，并且请了李大钊来指导。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常常到学生、工人、群众中讲演，受到广大青年的爱戴和尊敬。他曾经应觉悟社的邀请，到天津同觉悟社全体社员见面，给了他们很多指导和鼓励。一年后的今天，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的这次聚会上，他又应邀参加，青年们当然非常高兴。

古老的陶然亭外，树木高耸，浓荫蔽日，一声声蝉鸣，仿佛为这次聚会助兴，亭子里，青年们的心热过炎日，他们倾心交谈，热烈争论，深入思考，爽朗大笑。陶然亭也好像忽然年轻了。

邓颖超代表觉悟社发言，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状况和一年多来活动的经过。

周恩来发言了。经过狱中斗争的锻炼，他更加沉着和坚定。他说：“前几天，觉悟社开了年会，总结了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且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产生的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他的话得到各团体代表的赞同。

最后，李大钊讲话。他鼓励和支持青年们的革命志向，并且指出各团体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以求内部的团结一致。今后各团体还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他又恳切地希望青年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他的话给青年们燃烧的心灵上又添加了新的燃料。会后，青年们立刻行动起来，五个革命团体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向全中国宣告：我们集合在“改造”的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到民间去！”

觉悟社的社员们，在革命真理的指引下，纷纷走向社会，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大道。

周恩来，这位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年轻革命家，为了进一步探索革命真理，决心到法国去。

再见了，祖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因为缺乏劳动力，到中国来招募工人，很多中国青年就借此到法国去，边做工边读书，这就是“勤工俭学”。由于法国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和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俄国相距不远，又是巴黎公社的祖国，在那里便于探求十月革命的新思潮，所以，“勤工俭学”运动受到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李大钊、毛泽东、吴玉章都热心地组织这个活动。一九二〇年前后，在中国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到法国去的。为了筹备出国事宜，筹措资金，他曾经在南京他六堂伯周嵩尧和表兄陈式周家里逗留了一个来月，随后来到上海。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清晨，法国邮船“波尔多号”起碇离港，在迷离的晨雾中沿黄浦江顺流而下，驶向大海。

周恩来手扶船栏杆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即将离去的祖国的疆土，心潮像江水一样起伏。透过薄薄的晨雾，他凝视着外滩上栉比鳞次的高楼。这些耸入云霄的洋房中，有英国的大英银行、渣打洋行，美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荷兰的荷兰银行，法国的中法银行……十二个国家的国旗插在中国的土地上，像吮吸中国血液的蚊蝇的嘴巴，周恩来看着这些，周身发热，江面上的寒风也不能吹冷他胸中的怒火。

轮船快要驶进大海，一艘艘外国舰船在江面上横蛮地驶过，掀起混浊的波浪，一艘千疮百孔的破渔船，被浊浪掀翻，中国渔民在冰冷的江水里挣扎……周恩来紧紧攥住船舷的栏杆，愤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船驶进大海，祖国的土地渐渐模糊了。他挺直了身躯，面向祖国的大地，默默地同故土告别：“再见了，祖国！为了你的解放和强盛，我一定披肝沥胆，献出一生！”

海燕在他头顶飞舞，又掠过浪花向空中窜去。他仰望着这些自由的水鸟，决心要学得改造中国的真理，在革命的风暴中翱翔。

轮船载着他，经西贡，过新加坡，穿马六甲海峡，绕过槟榔屿，到达锡兰港。在这里，他看见了睡卧在街头的流浪者身上布满蚊蝇，就像身体被盖上一层黑布。他看见只盖着一张芭蕉叶入睡的贫民，也看见了殖民者的高楼大厦。殖民地悲惨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他心里。

轮船驶过印度洋，来到非洲的吉布提，然后进入红海。在这闷热的海面上，他看见了红色的山、红色的海、红色的天空。看见了清晨和傍晚红色的霞光，看见了被这霞光照花了眼睛的鱼，飞跳到甲板上。从红海前进，船驶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意大利，轮船向北直行。法国到了，“这里是马赛港。”

周恩来从马赛登陆，改乘火车，很快地到达了这一个多月航程的目的地——巴黎。

哦，你好啊，巴黎。

在欧洲的岁月

巴黎，号称“世界名都”。在这里，曾经建立过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但是，这里也是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一个罪恶的都市。

巴黎的凯旋门既看见过无产阶级的英勇奋斗，又看见过资产阶级怎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年轻的革命家周恩来一到巴黎，就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作服，投身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他住在巴黎东南的布洛瓦。不久，又去了德国柏林。一九二三年回到巴黎，住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戈德弗鲁瓦旅馆十六号小房间里。为了指导留法学小和华工们的斗争、学习，为了建党建团的活动，他奔走于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之间，生活极不安定。他随身带着一个汽炉子，经常烧点开水泡面包充饥。他常常吃不到菜，卷心菜是他主要的菜肴。他总是穿着一件油污的工作服，只有星期和上学校听课的时候，才换上一套法国平民穿的普通西装。这西装太小了，以至裤腿遮不住脚踝，上衣袖子连手腕都掩不性。一九二三年二月，他穿着这套衣服，在住所门前拍了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他的生活费用，主要依靠他在工厂做杂工的收入。因为他要常常往来奔走，因此无法固定在一个工厂做工。他还常常给国内报刊写稿，得到一点微薄的稿费，也常常送给了更困难的同志和朋友。他在宫庶的欧洲过的是真正无产者的生活。

就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还是利用一切时间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到工人区去进行社会调查。他在法国雷诺汽车工厂做过工，在德国的工业集中地鲁尔区对工人劳动条件进行过考察。他逝世以后，法国和西德的报纸都曾经发表文章，记述他当时的情况。一九二一年他还到英国进行考察，写成《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的始末》，发表在当年五月天津的《益世报》上。

就这样，他在工厂做工调查，在图书馆看书，在大学旁听，在颠簸的火车和摇晃的轮船上学习、写稿。在欧洲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极端贫困的生活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少年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当时，远在海外的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也在积极筹划建立共产主义的党团组织。

一九二一年年底，周恩来同赵世炎一起，为这个即将诞生的旅欧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组织而积极活动。

一九二二年六月，巴黎西门外布伦涅森林的一个广场上，二十多个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的优秀分子集合在一起，经过三天的会议，宣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三人当选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巴黎南部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同国内联系。同年，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已加入共产党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样，周恩来就在一九二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他还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当旅欧总支部成立并且同国内党中央、团中央建立了联系之后，周恩来非常兴奋地说：“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在共产主义这面大旗下，英勇奋斗，鞠躬尽瘁。

旅欧支部决定创办一个内部刊物《少年》，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负责编这个刊物，并且和邓小平等一道刻蜡版、油印。周恩来常常为《少年》写稿。他明确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在广大留法中国学生和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号召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的团结，一方面也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他便到近郊的大学城、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留学生中那些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分子的真面目。他还常常请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头面人物来参加旅欧支部召开的会，在会上同他们当面辩论。他那富有说服力的演讲，燃起青年们心头的革命火焰，他的演讲词传遍巴黎华工区和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使那些反动分子陷入孤立，一大批进步青年靠拢在党的周围。

周恩来一方面抓住党团员学习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一方面又负责选派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等学校去学习。每选好一批青年，他都亲自从巴黎护送到柏林，替他们办好手续，送他们启程。

周恩来就这样兢兢业业地为党团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正像一位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老共产党员所说“恩来全身都是聪明。”而他全身的智慧，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忠贞的友谊

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巴黎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里，坐着一位三十五六岁的中国人。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宽阔的双肩、丰厚的胸膛、挺直的腰身，处处显露出威武的军人气概。浓密的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的前额上已经开始布下细细的皱纹，这是多年驰骋疆场刻下的印记。他时而沉思地望着闪过眼前的异国土地，时而同身旁另一位中国人轻声热烈地交谈。他讲一口乡音很重的四川话，语气刚毅、坚定，显然是位豪爽、勇敢的人物。这就是以后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几百万反动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不朽功勋的人民军队总司令、世界闻名的统帅朱德。坐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好友孙炳文。

他们正乘车由巴黎赶往柏林，去寻访一位青年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

朱德望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他走过的坎坷道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他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里。一九〇九年，他考进了云南讲武堂。在这里，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一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就参加了辛亥云南革命军起义，率领一连人攻打清政府云南、贵州总督衙门，活捉清朝总督李经羲，立下了战功。以后，在数不清的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他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云南护国军，担任旅长。一九二一年起任昆明陆军宪兵司令和警察厅厅长。但是，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陷入苦闷：灾难深重的中国，依旧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哪里才有救中国的真理？他在苦闷和追求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眼前豁然开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毅然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回家乡担任师长的邀请，到上海、北京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他先去上海，又到北京，都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又返回上海，终于找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他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急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情。可万万没有想到，陈独秀却给他火热的心上浇了一盆冷水。陈独秀说：像你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这时候，孙中山劝他回家乡重整旗鼓，或者去美国留学。他都拒绝了，一心要奔往欧洲，奔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就这样，他和好友孙炳文一道来到了巴黎。他急切地四处打听消息，终于知道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住在柏林。

他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登程赶往柏林……

柏林到了。

朱德和孙炳文找到周恩来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会不会依旧是陈独秀式的一瓢冷水？

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身材挺拔、面貌清秀、两眼有神的青年。他紧握住朱德的双手，热情地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帮忙吗？”

朱德的疑虑立即烟消云散。他激动地述说了自己生平的经历和革命志愿，表达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愿望。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讲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他们在那间柏林的小屋里整整长谈了一夜。

周恩来坚信朱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介绍他入党。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和孙炳文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此后，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周恩来和朱德风风雨雨在一起，互相关心，彼此信赖，肩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我回来了，祖国。”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廖仲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两党在广州共同创建了一所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廖仲恺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一位合适的干部担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于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周恩来被调回国内。

那时候，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而且是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当时，两党商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这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种形式。周恩来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旅欧支部，并被选为负责人的。）他以卓越的工作在欧洲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当他要离开法国的时候，两党的革命同志都依依惜别，同他合影留念。

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秋天的骄阳下，周恩来踏上了阔别四年之久的祖国土地。接着他来到广州。在高高的棕榈树下，火红的木棉花前，他激动地对同志们说：“我回来了，请给我工作吧！”可是，同志们却希望他和邓颖超的婚礼早日举行。

周恩来把急需办理的事情办完，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才在中共两广区委所在地和邓颖超举行婚礼。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相识，在残酷的考验面前结下战斗的情谊。伟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凝成他们不渝的爱情。两位革命战士的结合，开始了他们携手前进的斗争新篇章。从那时候起，他们把自己的爱情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到达广州以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后来陈延年担任委员长，周恩来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还在黄埔军官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很多人称他政治总教官），那时他才二十六岁。

他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还在师生中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不少师生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他每天早晨步行到码头，然后坐船去黄埔，晚上再赶回广州指导两广区委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

他在军校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课程，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根本区别。他讲得生动活泼，联系学员实际，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每次讲课连军校的教职员、工人也跑来听，大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当时，他表面上假装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他当了军校校长以后，安插亲信，结党营私，企图把军校变成他培植个人势力的场所。他在军校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这个被人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的家伙，一九二五年初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专门干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坏事。蒋介石把周恩来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看作眼中钉。王柏龄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命令“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林振雄殴打“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纠纷要求惩办凶手。王柏龄自以为有蒋介石撑腰，共产党人奈何不了他。谁知道，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却下令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全校革命师生拍手称快。

王柏龄又气又恼，就偷偷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

周恩来指示共产党人蒋先云等，把王柏龄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一条条详细开列出来，在全校公布。那时候，反对国共合作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连国民党左派也不能容忍。因此，告示一出，全校进步师生同声谴责，王柏龄威信扫地，整天耷拉着脑袋，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孙文主义学会”也元气大伤。蒋介石虽然心中像着了火一样难受，但是在广大群众的愤怒面前，在革命浪潮之中，他毫无办法，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第一只手”被年轻的周恩来砍掉。

“抓反革命，要有充分证据”

一九三一年冬天，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员会的一个女同志，奉上级的命令，拿着上级写好的名单到下面去“抓反革命”，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她兴冲冲地回到汀州，打算向省委汇报。

她走进屋刚要说话，就看见屋里坐着一个陌生人，穿着便衣，脸很瘦，眼睛倒很有精神。她仔细地看了看他。

陌生人朝她笑笑，和气地问：“这位同志干什么去了？”

“抓反革命！”

“抓反革命？好啊！”陌生人两只大眼盯着那位年轻女战士：“你说说，是怎么抓的？”

女战士头一歪：“就这样抓的嘛！”

“嗯，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

“他……”女战士答不上来了，心里着急，“你是谁呀？这么刨根问底的？”

那人听了扬起头哈哈笑起来，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有感染力，引得屋里其他的同志都笑起来，到后来连那位女战士也尴尬地笑了。

一位同志笑着说：“他就是咱们党中央的周恩来同志，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刚从上海来，准备去江西瑞金，路过这里。”

女战士一听，高兴地双手一拍：“哎呀，您就是周恩来同志啊！”

周恩来看着她，和蔼地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李坚真，广东人。”女战士回答。

周恩来说：“土豪劣绅，一定要斗，但是一定要把成份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冤枉。不能光靠一股冲劲。分清敌人和人民，才能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懂吗？”

小李点点头，心里像点起了一盏明灯：干革命原来不能只靠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抓反革命也要首先弄清他是不是反革命。党的政策多重要啊！

小李看着周恩来同志，心想：“多好的领导人呐。他对同志那么和蔼，看问题那么准确。那两只眼睛啊，好像一下子看到了你心里。可他多么瘦哇，准吃了不少不少的苦……”

夹头发的推子

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中央苏区，当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主席，红色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党和红军的中央机关也在那里，因此中央根据地又叫中央苏区。后来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周副主席。

有一天，周副主席要理发，请来小理发员陈友才。周副主席亲自搬来凳子，坐好，笑着对小陈说：“只要理短洗净就行了。”

小陈想给周副主席理得好一些，可谁知道，偏偏理发推子出了毛病，有点夹头发，好几次夹得周副主席不由得皱起眉头。

“坏了，准得挨批评！”小陈心慌了。越慌，推子越不听使唤。小陈急得浑身是汗。周副主席看看他，笑了，亲切地说：“不要紧，大胆理下去吧！”他还不住地同小陈拉家常，小陈紧张的心情消失了，多怪，这时候，推子又听使唤了。

理完发，周副主席站起来，拍拍身上，摸摸头，笑着说：“理得不错嘛！谢谢你！”又拉着小陈的手说，“回去把推子修一修，别影响了工作。”

小陈望着他的笑脸，想到自己从前在老板家学徒时候的屈辱生活，更加感到周副主席的慈祥、和蔼，下决心好好练手艺，更好地为同志们理发。

教红小鬼识字

“红小鬼”可不是红颜色的“鬼”，而是红军的小战士。他们一个个勇敢、活泼，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爱他们，就亲昵地叫他们“红小鬼”，犹如说“革命的小机灵”。后来，“红小鬼”这个称呼，就成了很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名词，专门指那些从小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今天的很多领导同志，都是当年的“红小鬼”。

范金标就是当年周副主席身边的红小鬼——警卫员。

他报到的那天，周副主席问他：“小鬼，你是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一九三一年。”范金标小声说，他还有点扭捏呢。

“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呐？”

“我家里很穷，要打土豪、分田地！”范金标看周副主席总是笑眯眯的，胆子大起来，说话声音也大了。

“光是打土豪、分田地，这很不够哇，我们参加红军，扛起枪，是要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对对，解放全中国！”范金标笑着大声说。他想起来了，指导员讲课的时候讲过的。

周副主席摸着他的肩膀，微笑着：“小鬼，你识字不识字呀？”

“没上过学，不识字。”范金标低下了头。

周副主席一拍他肩膀：“这是旧社会的罪恶，剥夺了穷人上学的权利。现在你当了红军，就有条件上学了。你学了文化，就能读读马列主义的书，也就懂咱们共产党为什么闹革命，懂得咱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说着，周副主席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说：“你看，这两个字就是‘革命’。咱们当红军，干革命，就是这两个字。记住，革命！”

范金标看着这两个字，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跟这两个方块字联系着，就认真地念着：“革命！”

从此，范金标就跟周副主席学习文化，每天认三个字，念了又写，写了又念。周副主席反复地教他，还给他改作业。一开头，他写的字总也不好看，头和身子分家，歪歪扭扭的，他不好意思给周副主席看。周副主席说：“才学写字嘛，写得不好难免。别不好意思，熟能生巧，慢慢进步嘛！”

有这样的好老师教，学习能不努力吗？一年以后，范金标就会读书写字了。

周副主席教过的红小鬼可多啦，像前面说过的那个理发员陈友才，后来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的丁振愈、曾棋样、魏国禄等等，都跟周副主席学过文化。周副主席是他们的好老师。

掩护理发员

一九三四年，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对蒋介石“围剿”的斗争。当时，仗打得很激烈残酷，红军的生活越来越苦。有一段时间，从总部首长到伙夫，每人每天一律发半斤粮食。大家用灯芯草编成小袋子。每天早上装上半斤米，分三餐吃，大家叫它“布包饭”。

周副主席也是每天一份“布包饭”。他看到身边的红小鬼，一个个都处在长身体的年纪，就常常让出一些饭给他们吃，他对这些红小鬼真是疼爱极了。

有一天上午，周副主席叫过理发员陈友才，说：“小陈呀。给我理理发吧，又长了！”

陈友才高兴地走进屋子，给周副主席理发。理完了，他正在收拾工具，忽然听到外面呜呜地响，还有轰隆轰隆爆炸的声音。陈友才推窗一看，哎呀，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不得了，飞机正瞪着大眼朝这间屋子冲来，陈友才一转身就喊：“副主席，快进隐蔽所！”

周副主席一把抓住陈友才的手：“快，跟我一块儿去隐蔽所。”

“不不，我去勤务排。”陈友才说。

周副主席不由分说拉起陈友才就跑，等进了隐蔽所，陈友才一看，隐蔽所太小，他怕自己再进去，周副主席活动不方便，又扭身跑出来想再跑回理发的房间去。周副主席又把他拉回来，自己站在隐蔽所门口用身体挡住他。就在这时候，轰隆一声，敌机扔下的炸弹响了。刚才周副主席理发的那间房子被炸塌了。

陈友才看看炸塌的房子，又看看周副主席，热泪夺眶而出。他哭什么呢？

他从小没有父母，到理发店学徒又受尽打骂。如今，参加了红军，周副主席处处关怀他，怕他吃不饱，把自己的布包饭分给他，还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怎么能不哭呢？

周副主席笑着瞧瞧他，替他抹抹泪水：“哎，红小鬼是不兴哭鼻子的！”

陈友才看看周副主席，又笑了，含着泪笑出了声。

挑水泡

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军队一天天减少。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向我国华北进攻，于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由江西北上，到北方去开辟新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这就是震动全世界的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唱着悲壮的歌由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路上，天天跋山涉水，行军打仗。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丁振愈、曾棋祥都是十六七岁的红小鬼，哪能不累呀？可是他们为了照顾好周副主席，保卫他的安全，总是前前后后地跑着，谁也不说一声累。

周副主席对他们可了解啦，每天一宿营就问他们累不累，脚上打泡没有，催他们赶快烧水烫脚，然后又叫他们早点休息。而他自己呢，在小油灯下看文件、处理工作，常常到深夜。

有一天行军，丁振愈脚上起了很多水泡。他生怕周副主席知道，因为那就会被迫休息，不能照顾周副主席了。正好，医务人员巡诊来了。丁振愈赶紧把脚伸过去，心想：“快点治吧，趁副主席不在！”

唉，谁知道偏偏这时候周副主席来了，一下子就瞧见了。他走过来说：“小丁，把脚伸过来，我给你挑泡，黄水流出来就好了。”

丁振愈一听，赶紧把脚缩回来。让副主席给警卫员挑水泡，像话吗？到底是谁照顾谁呀！

周副主席看看他，笑笑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嘛，给你挑挑水泡有什么关系？”

丁振愈拗不过，只好把脚伸出来。周副主席左手托着丁振愈的脚掌，右手拿着根针，像位老妈妈，慈祥地、小心翼翼地挑着水泡。丁振愈的心里好像点着了一盆火，烧得全身热乎乎的。长途行军的疲劳，一下子全消失了，浑身添了无穷的力量。

红军要保卫学校

长征队伍来到湖南省通道城，红军总部驻扎在一所小学校里。

第二天，周副主席到部队去指导工作，他刚出门，迎面走来几个人，说有事想和他商量。周副主席一问，才知道他们就是这所小学校的教师。

周副主席微笑着问他们：“有什么事，请讲吧！”

教师们说，两天前就听说要来军队，学生全吓跑了。没想到来的是你们，你们纪律严，作风好，处处为百姓做好事，和别的军队不一样，大家又都回来了。

“那好哇！”周副主席说。

“我们想继续上课，可是……”教师们犹疑着。

“可是怎么样呢？没关系，请讲吧！”周副主席诚恳地说。

一位教师说：“可教室都让你们住上人了，我们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让出几间教室来。”

话刚落音，周副主席立刻喊来号房子的管理员，严肃地问他：“同志，你号房子的时候，考虑到学生上课没有？”

“总部人多，这里房子少哇！我，没考虑到。”管理员嗫嚅着：“反正我们只住几天，没多大关系。”

“同志，”周副主席更严肃了：“这是关系到人民军队和群众关系的大问题，怎么能说没多大关系呢！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严格执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爱护群众的利益，要保卫学校。为了我们住下来而影响学生上课，这对不对呢？”

“不对。”管理员红着脸说。

“不对就要改。”周副主席命令说：“现在你去传我的话，动员大家马上把教室统统让出来，给学生上课。”

管理员马上去执行命令。老师们也满意地走了。

周副主席又和管理员一起，研究了警卫团到别处设营的方案，然后才到部队去。

第二天，学校开课了。校园里又响起琅琅的读书声。课间，一首师生新编的歌谣飞出了校园，飞遍了通道城：

“红军好，
红军把白狗子打败了；
和咱群众心连心，
军民团结一家亲。”

搓稻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国民党反动派指示地方势力扰乱破坏，造谣诬蔑，强迫群众把粮食、生活用品搬到深山里，连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企图割断红军和人民的联系，把红军饿死。

有一天，宿营以后，红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些稻谷。但是，没有舂米的工具，总不能吃带皮带壳的谷哇！怎么办？大家走了一天的路，十分疲劳，有的干脆不吃了，倒头便睡。

周副主席立刻召集干部开会，他急切地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舂米，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搓出来。”会上决定，每人都要想法弄出够吃三顿的米来。

决定一传达，大家都动起手来。周副主席让警卫员魏国禄给他找来两片瓦，也领了点稻谷，自己在瓦片上搓起来。

魏国禄对周副主席说：“首长，您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接组织规定，搓够每人吃三顿的米就是了。”

周副主席一边不停手地搓，一边反问他：“为什么？”

“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嘛！”魏国禄觉得自己有充足的理由。

可是周副主席说：“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当搓哩。”他又换了温和的口气：“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么能不搓呢？”

魏国禄没话了，只好让周副主席搓米。

大家听说周副主席也在搓米，整个村子的部队全动起手来，有用瓦片对瓦片搓的；有用石头对石头搓的，搓得手上起了血泡，还是搓呀搓。

两个多小时以后，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打破了敌人困死红军的阴谋。

没多久，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的事实，经过那些见过红军的老乡传播，逐渐颂扬出去，老百姓都纷纷从山里回村，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毒计和编造的谣言，就像一阵灰尘一样，被风吹散了。

一个金戒指

这是红军在遵义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军委总司令部住进贵州军阀柏辉章的房子。警卫员魏国禄给周副主席收拾卧室。房里乱糟糟的，家具东倒西歪，一看就知道，这个军阀逃跑的时候，一定慌张害怕，狼狈不堪。

长征以后，红军第一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一定要让周副主席住得舒服一点，魏国禄就和战士们仔细地打扫房前屋后。忽然有人报告，在灶门口和后墙的小竹林下面发现了不少烟土（鸦片烟，毒品）和银元、火腿，大家收拾得更仔细了。铺好了被褥，清扫地上的乱纸、杂物，突然发现一个黄澄澄的小圈圈在地上滚动。这是什么呀？警卫员们都是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谁也没见过这东西。魏国禄捡起来，往手指头上套套，竟然戴进去了，觉得实在新鲜。

周副主席办完公，休息了。魏国禄回到警卫员的宿舍，伸出手来让大家看这黄圈圈。有人知道，说这是戒指。有人说这是黄铜的，有人说是黄金的，争论不休。范金标说：“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一试就知道了。”

大家立即搬来炭火盆，把这戒指放在炭火上烧，烧了老半天，夹出来放凉了，擦去灰土，嘿，依旧黄澄澄地发亮。没错儿，是真金的！

第二天清早，魏国禄给周副主席送洗脸水，刚要往回走，被周副主席叫住：

“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

魏国禄满不在乎地回答：“懂！当了这么几年红军还能不懂？”

“懂得很好，那你执行得怎么样呢？”周副主席严肃地问他。

魏国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吞吞吐吐地：“我，我没什么呀！”

周副主席指着他的手，严肃地说：“没什么？你手上的那个东西是哪来的？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

魏国禄这才恍然大悟：“哦，您说这个。这是昨天晚上打扫房子的时候，在地上捡到的，觉得好玩，戴在手上玩的。”

周副主席换了温和的口气：“同志，这房子是大军阀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他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应该全部属于贫苦的人民呐！”

魏国禄听着，脸红了，明白自己违反了纪律。他一出周副主席的房间，立刻就去找指导员，把金戒指交了公。

让担架

从长征出发以来，周副主席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可是他始终和战士们一样行军。一到宿营地，顾不上休息，立即打开公文包批阅文件、电报，要不就是和总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开会。他一天天瘦下来。党中央关怀他，从遵义出发的时候，特地批准给他一副担架。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一次，总是冒着冬天的风雪，戴一顶破斗笠，和战士们一起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部队行军到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天将拂晓，连日的阴雨渐渐停息，人们疲乏地前进着。忽然从路旁的树林里传来了呻吟声。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警卫员们赶紧跟过去。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只有二十岁左右，平躺在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咬着牙，闭着眼，两条腿不住地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

周副主席蹲下去，摸摸他的头，叫魏国禄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自己慢慢地给他喂水。受伤的战士喝过热水，似乎好受了一些，慢慢坐起来。原来，他是红三军团三支队的战士，头一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他右腿膝盖处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轻轻地抚摩着他的伤处，问：“很疼吧？”

伤员看着他慈祥的脸，摇摇头：“不疼。”

“不疼，能走吗？”

伤员看看自己的伤，坚强地说：“能走。”

他抬腿想站起来，可怎么也立不起来。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说：“同志，你伤势过重，怎么还说能走呢？”他搀着伤员，回头叫着：“魏国禄，叫担架来！”

魏国禄叫来担架，周副主席把那伤员扶到给自己预备的担架上，又把一床毛毯盖在伤员身上。他的动作是那么轻，手是那么柔，那么稳，生怕触动伤员的一点皮肉引起疼痛。他像一位最爱护儿女的妈妈一样关怀战士。他深厚的阶级感情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受到感动，眼里噙满了泪花。

伤员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一直流着泪盯着周副主席。

担架要走了，那伤员抹了一把眼泪，拚尽力气，大声说：“首长，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周副主席亲切地摆摆手，要他好好养伤。

周副主席关切地望着那担架走远，又大步地踏上行军的道路。

“饭撒了是小事”

红军在毛主席指挥下，机动灵活，又由云南折回贵州，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当时，情况瞬息万变，战斗也越来越频繁。每次行军，敌人都派飞机追踪侦察，有时候还要扫射轰炸，所以部队常常在夜晚行军。

有一天，部队破例在白天行军。行程四十公里，要赶到土城场宿营。到下午三点多钟，离宿营地还有十几公里，战士们已经很疲乏了。宣传队员们在路旁设起鼓动棚，说快板，喊口号，鼓舞大家再加一把劲。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敌人由山上冲下来，吆喝着、狂叫着奔向中央机关的队伍。情况多么危急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指挥红军战士向敌人反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打退。红军又连夜前进。

贵州的天气，常常是阴晦的。这天晚上，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红军战士们就在背包上拴一条白毛巾，一个个跟着前边若隐若现的白印子前进。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饭也没吃一口，但是为了赶快甩掉敌人，仍然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赶路。黑夜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警卫员范金标走在前面。魏国禄和挑着周副主席文件箱的桃夫落在后面。魏国禄手里还提着周副主席的饭盒。里面放着出发时就装好的一餐饭，可是周副主席只顾指挥战斗和行军，一口也没吃。魏国禄心里着急，他想赶到前面去，一休息就给周副主席吃饭。他跑起来，没跑多远，摇晃了一下，绊在一块石头上，饭盒子飞出老远，三层饭盒分了家滚到各处。他急坏了，弯下身子摸呀摸呀，好不容易把三层饭盒都摸到了，可里面的饭撒了个净光。他的嘴、手、腿全摔破了，可他的心比身上的伤还疼。周副主席那么劳累一天没吃东西，仅有的一点饭也让自己撒光了，心里能好受吗？

休息的时候，已经深夜一点了。魏国禄一瘸一瘸地好不容易赶到周副主席身边。范金标一见他，高兴地说：“可来了。快，快把饭给首长！”

“我，我，”魏国禄像犯了罪一样小声说：“摔了一跤，饭撒光了。”

范金标急了：“哎呀，那怎么办？”

周副主席走过来：“怎么了？你们说什么？”魏国禄难过极了，鼻子一阵阵发酸，低着头走到周副主席身边：“我，摔了一跤，把您的饭撒光了！”说着，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周副主席一听，急忙弯下腰：“摔得怎么样？能不能走？”他一看见魏国禄摔破的腿，连忙说：“哎呀，饭撒了是小事，瞧你摔得这样子。”又回过头来：“范金标，快去找卫生员给他上药！”

卫生员给魏国禄上完药，魏国禄心里还在难受，副主席总得吃点东西才成啊！他想起背包里还有一点锅粑，就试着问：“副主席，我还有点锅粑，您是不是吃一点？”

“有锅粑？很好，拿来吃一点。”

周副主席津津有味地吃着锅粑，魏国禄的心又是难过，又是欣慰。

教警卫员当排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丁振愈来到周副主席身边当警卫员。

这个小战士又机灵又勇敢。刚来的时候，写个“丁”字还歪歪扭扭，费好大力气，跟周副主席学习了几个月，就能写家信了。他高兴，周副主席更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写得满好嘛。就把这信寄回家去，也让你家里人高兴高兴。”

长征以后，碰到打仗，他就心里发痒，一个劲儿要冲到战场上去。遇上敌机轰炸，他不但掩护首长，还帮助别的同志疏散部队，一点儿也不怕头顶上的飞机瞎叫唤。

周副主席看出来，他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

一九三五年二月，部队要过乌江了。周副主席有一天忽然对丁振愈说：“丁振愈呀，你跟我工作快半年了，我看你很勇敢，不怕死，到连队里当排长，带兵打仗去吧。”

“当排长？”丁振愈可从来没敢想过指挥别人打仗，连连摇着手：“我干不了，干不了！”

“我看你干得了。”周副主席说：“不过，要当好一个排长。带好三四十个人，也不容易呀。”

“那……”丁振愈犹豫着，他可不愿意离开周副主席，虽然他也特别想到战场上杀敌人，可当排长他又有些胆怯。

周副主席看出他的心思，就对他说：“当排长注意这么四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不可能直接给你讲，总是通过师长、团长、营长传达给你，所以，工作上要服从上级指示，不打折扣，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命令。二，要好好学习，政治、军事都要学，打仗不能光死打硬拚。指挥战斗要灵活机动。你知道什么叫灵活机动吗？”

丁振愈说：“不知道。”

周副主席打了个比方：“敌人的机枪响了，上级命令你把它干掉，怎么去？你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开阔地，一条是壕沟。你从哪条路去？”

“壕沟。”

“对，灵活机动嘛，虽然开阔地也许离敌人的机枪更近点。可你还是要迂回过去。三，要和全排同志搞好团结。遇事不要随便决定，要和大家商量，多听群众意见。决定不了的问题，就向上级请示。四，要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死。要爱护同志，关心战士生活。”周副主席微笑着看看丁振愈：“你在这儿就很关心我。关心战士就像你关心我一样。要和大家打成一片……”

丁振愈点点头，记下了周副主席的嘱咐。

丁振愈按照这四条去当排长，后来果然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十个鸡蛋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军进军云南，来到了马龙县。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像疯狗一样前面堵、后面追，一心要把红军消灭掉。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部队奋勇作战，斗争艰苦极了。在马龙县的一个村子里部队大休息，好养足精神，继续行军。

周副主席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吃上饭。警卫员魏国禄急坏了，一心要给周副主席买点东西吃。可是村里的老百姓都让国民党兵连骗带吓赶跑了，一个人也看不到。

魏国禄和另一个战士走遍了全村也没遇上一个老百姓，实在没法子，就走进空荡荡的老百姓的屋子去找吃的东西。没走几家，就找到了两碗苞米饭和十个鸡蛋，这下子魏国禄可高兴了。

可是屋里没人，怎么付钱呢？先让周副主席吃上饭再说。两人一商量，赶紧跑回休息地。

饭做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端到周副主席面前。周副主席问他们：“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买的！”

“对，是买的！”

他看看这两个小战士，不大相信：“买的？给了人家多少钱？”

两人不吱声。

“没有给钱吧？”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说：“老乡屋里没人，把钱放在屋里又怕不保险，只好先回来，想让您吃上饭再说。”

周副主席立即严肃起来：“不行。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赶快送到哪里去。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违反革命纪律，要好好检讨。”

两位小战士难过地低下头。

周副主席换了温和的口气开导他们：“咱们是工农红军、人民的子弟兵，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牢牢地记住：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群众宣传，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两人听了这番话，又难过又不安。把东西送回去吧，周副主席还饿着肚子呢；不送吧，又违反了纪律。

这时候，范金标走过来悄悄拉一下魏国禄的衣角，朝副主席恳求地小声说：“首长，我们写个条子向老乡说明情况，多留点钱放在装鸡蛋的篮子里，好吗？”

周副主席想了一会，才勉强同意了。

条子是这样写的：“大伯、大娘：中国工农红军路过此地大休息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志没吃早饭，想到你们村子里买点东西吃。在村子里走了几圈没有见到一个人，来到你们家里，我们拿了两个碗苞米饭、十个鸡蛋，这是违反了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向你们赔礼道歉的！现在给你们留下此条，还有一块银元，作为买苞米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

周副主席把条子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这才说：“好，你们赶快送去吧。”

魏国禄刚要走，周副主席又叫住他：“等等，送了条子，再把这饭和鸡蛋给总部其他首长送一些去！”魏国禄这才高兴地走了。

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大渡河上的一座桥。这桥既不是石头的，又不是木头的，而是十三根悬空的铁索，每根有饭碗粗，一个铁环连一个铁环，从东岸拉到西岸。九根铁索吊在下面，铺上木板当桥面，左右两边各两根铁索当桥栏。这种桥走上去就晃动，脚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胆小的人，一走上桥就要发晕的。桥两岸是高耸的山峰。桥头的石碑上刻着两句诗：“泸定桥边万重山，高耸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长征到这里。国民党反动派把桥面上的木板全都烧光了，对岸还有重兵把守，机枪封锁。红军先头部队挑选了二十二名勇士，攀着光滑的铁索，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桥头，夺下了泸定桥。这就是威震世界的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周副主席来到泸定桥边的时候，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才铺到铁索上面的木板很不牢固，连马匹都不敢走。还有一匹军马掉到河里，被漩涡激流卷走了。

周副主席听说这情况，着急地问：“人有没有损失？”他嘱咐渡河的指挥人员，要部队严守秩序，听指挥，保证安全。牲口最后过桥，还要蒙上眼睛，或者找适当的地段让马匹游水过去。

周副主席过桥的时候，叮嘱小警卫员们要小心，眼睛看对岸，不要向下看。

警卫员魏国禄走到桥上，不经心地向下一看，哎呀，桥下浪花翻腾，波涛汹涌，波浪声就像狮虎咆哮，他紧张得连步子都迈不开了，总觉着晃晃荡荡的桥，马上就要把他晃到河里去。他抬眼看了看周副主席，只见周副主席泰然自若，双眼看着前方，迈着平稳的步子向前走着。魏国禄立刻有了勇气，学着周副主席的姿势朝前走去。

到了桥中间，一块木板裂开了。周副主席弯下腰，亲自用手把木板重新铺好，边走边修，终于过了桥。

周副主席过了桥也不休息，立刻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齐到泸定城里检查，然后又回到桥头，迎接毛主席过桥。

靠在树上睡一夜

人睡觉总要想找一个地方，哪怕是很小很小的地方，躺下来才行。可是有一次，周副主席竟站着靠在树干上睡了一夜。

那是红军强渡大渡河以后，向四川天全县进军途中的事。

为了避免和国民党军队硬拚，红军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原始森林里，树木遮天，到处湿漉漉的，脚下是腐烂的树叶，一踩就冒出一股股臭水。还有野猪、野羊窜来窜去，再加上老天总是捣乱，没完没了地下雨，看不见一丝阳光，行军真是困难极了。特别是晚上，人站在对面都看不清楚，掉了队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周副主席生怕小警卫员们丢了，就拉着他们的手向前走，又怕他们困了，就不停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经过一座不知名的高山，天下起暴雨来。山坡上的杂草、烂树叶、泥水淤积得根深。道路难走极了。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沟里，非得让别人使劲往外拉不可。队伍走了一整天也没有走下山来。傍晚，部队就地宿营。

这“营”怎么“宿”哇？山坡上站满了人，连一块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没有。

吃饭怎么办？周副主席吃了一点让雨水泡成稀糊糊的“干粮”，喝了点雨水。

睡觉怎么办？几个警卫员发了愁。

周副主席笑呵呵地说：“你们不用为我发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休息去好了。”

“那，您怎么休息呀？”

“我怎么都可以。就靠这棵大树休息不是满好吗？”

“那怎么行？”

“为什么不行？”副主席乐呵呵地指着坐在泥水里，靠在大树上休息的同志们：“大家都行，我自然也行。”

他又督促警卫员们快找地方休息去。然后，他自己就靠在大树上站着“睡”了一夜。

那棵不会说话的大树哇，你还记得吗？一九三五年夏天，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靠着它站了整整一夜呀。

在病中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来到四川省卓克基、毛儿盖一带，马上就要进入草地，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休整。

是该休整了。从长征开始，半年多来，周副主席白天和战士们一道行军，晚上又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有时候还接连几个日夜不休息，他的身体一天天瘦下来，胡子显得更长更浓密了，只有那两只充满智慧的眼睛，仍然炯炯发光。

在毛儿盖休整，几个警卫员就动开了脑筋，一定得给周副主席搞些好吃的，让他补养一下身体。他们走过了一切能走的地方，找了一切能找的门路，可是除了青稞麦和豌豆苗，别的什么也没有。警卫员们气坏了，嘴巴撅得老高。撅嘴也撅不出好吃的东西呀，没办法，只好劝周副主席多休息吧。

可是，周副主席说休整比不休整还忙，天天开会，开完会就处理一摞一摞的文件、电报。警卫员们心疼得很。

有一天晚上，周副主席开完会回来，在路上还不住地询问魏国禄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嘱咐他：“草地是个千里无人烟的大草原、气候变化无常，你们不但要做好物质准备，还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吃苦。”

回到住地，他连饭也不想吃，只喝了一杯开水，就埋头在微弱的灯下，摊开文件办公了。过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又要喝一杯开水。魏国禄一听他的声音和往常不一样，心里有些慌：“您是不舒服了吧？”用手一摸他额头，惊叫起来：“哎呀，首长在发烧！”小魏急忙请来医生，一量体温：三十九度五。大家都急坏了，邓颖超同志更是焦急，一直守护在副主席身边。

第二天，周副主席体温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望他。毛主席急得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 能不能回来？”

傅连 是红军的卫生部长，医术非常高明，可是他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部队南下，回不来。听说一支队还有位姓戴的医生，医术也很高明，毛主席马上命令打电报把那戴医生请来。

戴医生来了，经诊断，周副主席得的病是肝脓疡，要常常发高烧的。戴医生吩咐警卫员从山上搞来雪水给副主席冷敷。直到第三天，周副主席的体温才逐渐下降，神志也清醒了一些。

毛主席每天来看望他。第四天，毛主席见他能坐起来说一会儿话了，非常高兴。一位首长开玩笑说：“这种条件下生病，能好了，真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大家都笑了。

周副主席刚能坐起来就要办公，让人把文件、书报拿给他。警卫员们深深知道，周副主席特别爱学习，不读书不看报，对他来说简直受不了。可是他身体还没好哇，大家把邓颖超同志请来一道劝他。周副主席没办法，只好少看些书，但是还要给警卫员们讲革命故事，讲革命道理，讲当时的国内外大事。

周副主席病还没全好，警卫员魏国禄又病了，周副主席让人搀着来看望魏国禄，又亲自叫来医生，看着给魏国禄打针、吃药。魏国禄的病好了，出发进入草地的时候，周副主席一定要魏国禄骑他的马，自己步行，仿佛他比魏国禄更健康似的。

半碗青稞面

周副主席的病还没有痊愈，红军就进入了大草地。

大草地茫茫无边，全是齐腰深的水草。水草下不是盘根错节的草垛，就是深深的烂泥潭，一不小心踏进泥潭，眨眼就会被淹没。草地的天气怪极了，从早到晚，一天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季。一会儿万里无云，烈日晒得皮肤痛，一会儿又冷雨凄凄，接着又是鹅毛大雪，冻得人牙齿打战。

在这杳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即裸大麦）作军粮。开始，每到宿营地，红军战士就用脸盆煮一碗青稞面，算作一餐，一日三碗。后来，一天只能吃两碗，再后来，一天只能吃一小碗青稞面了。指战员们饿得全身发软，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健康人尚且如此，病中的周副主席自然更加难受。但是周副主席坚决执行命令，绝不多吃一点青稞，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

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眼含热泪把仅有的一点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带上。

战士们天天用一点点青稞搀在野菜里熬汤喝。有一天，战士吴生开躲在人群外，蹲在地上呕吐，周副主席看见了，就走过去问他：

“你病了吧？”

“没，没有。”

“没有病怎么吐呢？”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野菜太苦，吃下去头昏脑胀，全身无力……”

周副主席知道吴生开一点青稞面也没有了，就让警卫员魏国禄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青稞面给吴生开两碗。他看着吴生开蜡黄的脸，鼓舞他：

“这就是革命。我们今天吃点苦，将来，人民就可以不吃苦。为了革命，我们还要准备吃大苦。”他要吴生开坚持下去，走出草地，还要他骑上自己的马。

吴生开感动地流着泪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党，跟着您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作的帐篷当然抵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警卫员们都到他办公的帐篷里去休息。大家怕影响他办公，不肯去。他冒着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大家只好走进他的帐篷，和周副主席一起背靠背坐到天明。草地的寒风吹冷了战士们的肌骨，可周副主席的深情却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地仍然无边无际。战士们的青稞面吃完了，路上的野菜也吃光了。总部命令，把军马杀掉吃肉。人多马少，马肉也很快吃光。于是，红军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下了命令，把他珍存的一点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

魏国禄急了：“那，您吃什么？”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着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就会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

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搀上了一点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是一点点青稞面，这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他自己的生命啊！大家默默地发誓，“只要我还没有停止呼吸，爬也要爬出草地去！”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这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摧不垮的铁的红军。

在党小组里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长征来到两河口地区，进行休整。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选了支部委员会，各党小组也要选举新的小组长。

周副主席所在的党小组，有总部的负责人张云逸和几个参谋，还有警卫员。张云逸提议选警卫员魏国禄当党小组长。周副主席微笑地看着魏国禄说：“很好，我赞成。”

魏国禄脸红了，心想：“上有副主席，下有参谋。我这个小警卫员怎么领导他们？”连说：“不行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

“大家选你，就相信你一定干得了，”周副主席动员他：“我们既然同意你当小组长，就一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

事情到了这地步，魏国禄只好点头答应：“我试试看吧。”

小组讨论今后的任务，周副主席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要保证没有一个同志掉队，能够走到抗日最前线去。因此，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保证一个同志都不掉队”就成了小组长征中的主要任务。这任务胜利地完成了，这个小组的确没有一个掉队，大家都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有一天，周副主席问魏国禄：“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小组会呢？”

“开过啦！”魏国禄不经心地说：“我看您很忙，没通知您。”

“唉，那怎么行？”副主席严肃起来：“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是你的不对呀！”

周副主席又耐心地解释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一定要通知我。”

魏国禄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每次开小组会，他都通知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尽一切可能来参加，碰到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就向小组长请假。每次开会，他都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

长征胜利以后，有一天周副主席问魏国禄：

“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有交吧？”

“交了，我替您交了五分钱。”

“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您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大事，我代您交不是一样嘛！”魏国禄觉得自己挺有道理。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周副主席说：“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用明澈的眼睛注视着魏国禄，好像说：“我的同志，你懂了吗？”

周副主席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党员。

过后河

后河是草地上的一条河，本来并不宽。但是周副主席过后河的时候，正好下着倾盆大雨，使后河水深流急。这时候，又突然从右前方窜出一股敌人的骑兵，情况多么危急呀！幸好陈赓团长率领的干部团及时赶到，赶跑了敌人。

周副主席带病冒着大雨指挥部队过河。他先叫人下河去试试水深。试水的战士走到河中间，齐胸的水流差点儿把他冲倒，脚下的淤泥又直往下陷，副主席赶紧叫他上岸。

陈赓赶走了敌人也回到河边。部队得赶紧过河呀！这么多人在雨中等候，要是敌人再来怎么办？周副主席立即动员大家解绑带结成绳子，派会游泳的战士带着绳子的一端游到对岸，然后让部队顺绳而过。谁知绳子结得太细了，刚过了第三批人，绳子就断了。副主席又命令赶快结一条粗绳子，每次少过一些人，部队才顺利地渡过后河。

周副主席一直冒雨站在河边。部队快过完了，他也挽起裤腿要和战士一起过河。这怎么成呢，水深流急，他又生着病呀！警卫员们急坏了。陈赓团长也急了，一把拉住副主席，说：

“首长，你不行啊！”

“可以嘛，大家都能过去，我也可以过去。”

陈赓团长焦急地说：“您有病啊！”

“没关系！”周副主席说着就要下水。

陈团长又拉住他，严肃地说：“不行，别的事我绝对服从首长，这一次得听我的。”接着又恳求说：“首长，您还是坐上担架吧。”

大家一致劝说、拦阻，副主席无法，只好坐到担架上。

刚到河对岸，就听见那边有人叫，一看，原来是十几个“红小鬼”，他们年龄太小，即使有绳子也过不来。周副主席连忙说：“魏国禄，去，你骑上牲口把他们接过来。”

魏国禄骑马回到河那边，小鬼们高兴极了，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抱住牲口的脖子，有的拉住牲口尾巴，扑通扑通地过河了。一次过三四人，接连过了三四次，才把他们全部接过来。

红小鬼过河以后，围着周副主席问长问短，有的流着泪说：“首长，谢谢您啦！”

周副主席拍拍他们的肩膀，鼓励说：“你们都是小英雄，加加油，走过草地就是胜利！”

这些英雄的红小鬼们，带着周副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挺起胸膛踏上了征程。

牛肉面儿

在进入草地之前，在毛儿盖，红军供给部费了很大劲找到一点牛肉，煮熟烤干，研成末，做成牛肉面儿，交给警卫员魏国禄，让他给生病的周副主席吃。

进入草地头天晚上，警卫员给副主席用开水冲了半碗牛肉面，副主席一边吃一边温和地说：“有青稞炒面吃就可以了，就那么一点点牛肉面儿，留着最困难的时候再吃。”以后，魏国禄只要想给周副主席拌一点牛肉面，周副主席就说：“留着吧，到最困难的时候再说。”

“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哇？”魏国禄心里想。草地上野草丛生、遍地沼泽，阴雨绵绵，飞鸟绝迹，部队连青稞也吃不上了，吃野菜，煮腰带汤。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周副主席还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工作。一休息，他就跑到东，跑到西，检查工作，然后回到帐篷里，坐在包袱上，伏在文件箱上，批阅文件、电报，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还有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比现在，比这里更困难？”魏国禄想。可是他不敢违反周副主席的指示，只有在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情况下，才能给周副主席冲上一点点牛肉面儿。

有一天行军，一个小战士倒在路边草丛中，周副主席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同志，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那个小战士睁了睁眼，强打着精神回答：“不，首长，我，我没病。”

“那，你为什么不能走了？”

“我，两天，没有，没有吃东西……”

“噢！”

“我，全身无力，眼，发黑……”

周副主席立即对魏国禄说：“你把牛肉面给他一碗！”

“什么！”魏国禄有些犹豫，这比金子还贵重的牛肉面，简直是周副主席的生命啊。

“这，这儿总共也没有几碗。”魏国禄吞吞吐吐地说。

周副主席看出了魏国禄的心思，就跟他商量：“是啊，不多了。可总不能看着我们的同志饿死在路上啊。你说对吧？”

“那，当然！”

“这就对喽！快倒一碗给他，再弄点开水来，让他吃了同我们一起走。”

周副主席端着一碗黄澄澄的牛肉面，像照顾孩子一样，温和地对小战士说：“吃吧，吃了好走路。”

“不不不，”那战士挣扎着坐起来：“您留着吧。我吃了，您就没有吃的了。”

周副主席很严肃地说：“吃了再说嘛。你饿得都不能走路了，为什么不吃？”

那战士在副主席和同志们一再劝说下，才用水拌着吃了半碗牛肉面，剩下的，周副主席让他留着下次吃。

周副主席又让他骑上自己的马。那战士坚决不肯，向副主席敬了一个礼：“谢谢首长，我可以走了。”

周副主席看着他的背影，露出了微笑。

偏方治大病

走出草地以后不久，警卫员魏国禄得了疟疾。他怕周副主席知道，又要照顾自己，就故意落在队伍后边走。

那天，他勉强走了一段路，离宿营地还有五六公里，又发起高烧，就迷迷糊糊地躺在路旁的水塘边。隔了一会儿，他好像听见有什么动静，睁开眼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帮当地的反动分子拿着武器正朝他走来。他一下子清醒了，立即拔出驳壳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咱们的大部队经过这里，那帮坏蛋才呜哩哇啦地跑了。

魏国禄被同志们搀回宿营地。周副主席正着急地等着他，见了他又心疼又有气：“你呀，怎么病了也不讲？”

过了一会儿，周副主席端来一碗山芋，嘱咐他：“吃点东西，好好休息，明天骑牲口走，不准再跑到后头去！”

魏国禄的疟疾好容易治好了，脚又生了病，肿得像馒头，走一步就疼出汗来。周副主席又让他骑马，还常常亲自把他扶到马背上去。

魏国禄骑着马，周副主席在旁边走着。一路上还说笑话。讲故事。魏国禄在马上看着周副主席那病愈不久的清瘦的脸，常常要难过得掉泪，好几次从马背上滚下来，非要周副主席骑马不可。周副主席每次都把他连劝带扶，重新扶上马背。

魏国禄的脚病刚好，又害起眼病来。眼睛又红又肿，看不清东西。那时候，连洗眼睛的硼酸水都没有。魏国禄怕眼睛瞎了再也不能打仗，急得直哭。

周副主席安慰他：“小鬼，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个偏方，你弄点猪肝来，不要放盐，用清水煮熟了，连水一起吃；再搞点盐开水，晚上睡下后，用干净棉花沾盐水往眼上敷。”

魏国禄盼望眼睛快好，就双管齐下：白天吃猪肝（那时候部队已经能找到猪肝了），晚上用盐水敷。嘿，还真有用，不几天就好了。魏国禄高兴地对周副主席说：“副主席，您知识真渊博，这两个偏方治了我的大病！”

“还可以再穿一个冬天”

周副主席有一件羊毛夹袄。那是过草地前在毛儿盖做的。这是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和范金标的杰作：把两件单衣服缝在一起，中间放上羊毛，就成了一件羊毛夹袄。不用说，针脚粗了一点，线也不够细。可是这一针一线都透着小战士对革命领袖的爱，所以周副主席特别珍爱这件羊毛夹袄，穿着它走过了草地，完成了长征，一直穿着它走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部队驻在陕北瓦窑堡。

战士们住进宽敞明亮的砖窑洞。这种窑洞可好啦，一面靠着土坡，一面向阳，窑顶用砖砌成圆拱形，里面冬暖夏凉。窑洞里还有泥土砌成的炕，炕洞里烧着木柴，整个炕暖烘烘的，睡在上面舒服极了。南方来的战士们都觉得挺新鲜，不住地探问当地的老乡，这暖烘烘的炕是怎么砌的。陕北的老乡们同江西苏区的老乡们一样，对红军就像对自己的儿女那样亲。他们拿出了自己的一切供应部队。部队的伙食变好啦，能吃上肉了。战士们领到了新棉衣，新棉鞋，穿戴起来，圆鼓鼓的，一个个都像小胖子。这比长征的时候他们穿的破羊皮坎肩，短裤头，不知强了多少倍。

可是，唯独周副主席还穿着那件羊毛夹袄。这件立了大功的衣服有的地方已经破了，露出白花花的羊毛。

天气一天天更冷了。树上的叶子已经让寒风吹光。周副主席还没有要领新棉衣的意思。魏国禄沉不住气了，去找供给部的同志，打算问问他们，应不应该照顾一下首长。

供给部的同志非常为难地说：“给了他几次，他就是不要，我有什么办法？”

不要？怎么度过西北高原上这寒冷的冬天？不行，魏国禄回来找副主席商量：“您那件夹袄都破了，怎么过冬？我们都穿上了新棉衣，您也领套穿吧。”

周副主席上下摸着自己的夹袄，说：“不要了。还可以再穿一个冬天。”

“唉，这衣服都坏了啊！”

“那，就请你们找人帮我拆洗一下，破的地方补一补。”周副主席看着魏国禄说：“前线的战士，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候，还要打仗，可是他们并没有都穿上棉衣呀。”

魏国禄没办法了。

警卫员们看着副主席冒着寒风去开会，深夜里冒着寒风回来，心里都挺难过。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先斩后奏”，跑到供给部领了一套棉衣。供给部的同志们吃惊地问：“怎么？首长同意了？”

“没错儿。”魏国禄他们抱着棉衣跑回来。

周副主席一见新棉衣就批评了这几个机灵鬼一顿，逼着他们送回去。

供给部的同志“幸灾乐祸”地说：“怎么样，不行吧？看你们几个人也办不了这件大事嘛！”

魏国禄捅了这个同志一拳，撒腿跑出了供给部。

“杀不杀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春天，周副主席亲自送警卫员魏国禄去红军大学学习。组织上又派给他一个新的警卫员刘九洲。这小鬼十三岁就参加红军，这时候才十五岁。他又勇敢又机灵，自然，也免不了有点孩子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早，天还没亮，刘九洲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屋里灯光通明，心想，一定出了什么大事，首长们不是开了一夜会，就是早早又起来工作了。

他走到门边，听见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在屋里又说又笑，就一头闯进去想听听是什么好消息。

周副主席一见是刘九洲，就笑着说：“哈，小鬼，蒋介石被捉住了，你知不知道？”

蒋介石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哪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不想惩罚他？可怎么捉住他的？难道派了一个突击排到他老窝去，把他逮住了？刘九洲一时间懵了，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周副主席。

邓颖超（那时大家都习惯地称她为邓大姐）走到他跟前，笑着说：“问你呢，蒋介石被捉住了，你知不知道？”

刘九洲连连摇头。

周副主席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了一夜会，你还不知道！”

“不是我值班！”刘九洲还在发愣。

邓大姐说：“小鬼，是这么回事，蒋介石到西安，让张学良、杨虎城打我们；他们不愿打内战，昨天把蒋介石捉住了！”

“噢！”刘九洲明白了，高兴地叫起来。

“你说，蒋介石捉住了，杀不杀他？”周副主席紧盯着他问。

好不容易把这个大坏蛋捉住了，当然该杀，刘九洲心想。可是他一看周副主席、邓大姐那期待他回答的神色，这小机灵立刻猜到，这问话里准大有文章。他眨眨眼睛，一摇头：“不杀。”

周副主席眼睛放着光彩：“为什么不杀呀？”

为什么？这可没想过。刘九洲毕竟是个红军战士，略微一思索，回答说：“优待俘虏嘛，毛主席的政策，缴枪不杀！”

周副主席、邓大姐哈哈大笑。

刘九洲不知道自己回答得对不对，可看出周副主席、邓大姐没有一点责备他的意思，也跟着笑了。

“好！”周副主席笑着说：“杀了蒋介石就不能使内战停止，就无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啦。”接着，又给刘九洲讲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处理当前局势的方针。刘九洲听了，觉得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顶风冒雪

张学良将军和他的部队都是东北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大城市沈阳进攻，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结果，十几万大军，一枪未放，从沈阳撤走了。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张学良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反共前线，和红军作战，屡战屡败。张学良和他的官兵远离沦陷的家乡，面临全军覆没的处境，强烈要求抗日，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打内战的政策极为不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又被派到西北，同杨虎城的西北军一起围攻红军。一九三六年四月，周副主席曾经在延安（当时还被国民党军占领）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非常敬佩周副主席，表示坚决不再打内战了。后来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红军进攻。两将军知道，如果和红军开仗，自己的军队必然上崩瓦解。如果不打就要披蒋介石调往南方，实行“改编”，前途也不妙。他们几次三番苦苦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根本不听。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人民的支持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这次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捉住了蒋介石怎么处理他呢？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呢？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关系到祖国命运的大事情。

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去乘飞机。

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住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呼地吹，天冷极了。周副主席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冒着漫天大雪赶往延安东郊机场。

那一天，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已经同日寇协同起来，组织了“讨逆军”，向西安进兵，准备取代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

矫健的骏马呀，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周副主席在长征中几次生病，长征以后又有繁重的工作，他是多么瘦弱呀！可是为了祖国的前途，他不顾一切在风雪中赶路，两天走了一百多公里，赶到了延安。

十六日，飞机起飞了，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这架飞机上。

“周恩来在西安！”

为了解决西安事变，周副主席在西安住了六十多天。

那是情况万分复杂、斗争非常尖锐的两个多月呀！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对于抓住蒋介石以后该怎么办，当时并没有明确的主张，他们的高级官员们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的部队呢，不少官兵为了出一出闷气，非要杀掉蒋介石不可。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还有一伙反动分子故意叫嚷：“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到处挑拨离间，企图把水搅浑，弄得局势不可收拾。

这时候，亲日派的“讨逆军”一天天逼近西安，日寇也配合进攻，要消灭张、杨和红军；另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的英、美等国，也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在加紧活动。

这是多么复杂的局面啊！

要从这一团乱麻一样的局势中理出头绪，把各方面的意见统一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上来，周副主席得花多大的气力呀！

周副主席穿一身布军装，扎着士兵的腰带，今天同张、杨会谈，明天布置红军保卫西安，给张、杨军事上的支持；今天到东北军、西北军官兵中演讲，明天又接见西安社会名流，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疑虑；今天开群众大会，向市民们演说，明天又到各抗日团体作报告。每天深夜还要听代表团的汇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多少艰难危急，经过他的处理都化险为夷。

在那个局势动荡、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西安人民一看见他瘦瘦的身躯，炯炯的双眼，就有了力量。那时候，西安人民中流传着一句话：“不要紧，周恩来在西安！”这意思是说，有中国共产党，有毛主席，有他们派来的代表周恩来，中国就不会亡，前途就有希望。

有一天，周副主席在一所中学里演讲，听众越来越多，树上、墙头都站满了人。他那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演说，不断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场的一些爱国的国民党人也感动得流下眼泪。

校门外一个过路人问：“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站在墙头听讲演的一个人回答他：“嘘，轻点，周恩来将军在演讲！”

那位过路人长舒一口气：“呵，中国有救了，周恩来在西安！”说完也挤进人群里去。

“真令兄弟敬佩！”

在西安，周副主席天天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谈话。他分析国内外局势，指出，国民党当中已经分裂出一部分爱国力量，英美等国同企图独吞中国的日本有矛盾，因此，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是行得通的。

两位将军十分赞赏周副主席。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可是他们的部队里，还有不少人思想不通。

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武装闹事。他们说：“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

周恩来副主席决定自己去说服他们。

同志们看着他熬红了了的眼睛，担心地说：“这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不好谈呐，谈不好就……”

周副主席累得声音都有些嘶哑，他说：“你们不必担心。他们也是出于爱国心。何况，蒋介石流氓成性，他们吃过他的亏，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说罢，周恩来副主席只身来到这群军官中。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副主席，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大声说：“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副主席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安静下来。

“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南京方面会怎样？日本人会怎样？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会怎样？各位想过吗？”

大家答不上来。周副主席就启发他们：这次捉住蒋介石。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呢，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

他长时间的耐心解释和分析，终于说服了那群军官。刚才大叫大嚷的那个暴躁的军官说：

“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十年内战，他杀了多少共产党！真是血海深仇哇！但是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

说完，他站起来，双脚跟“咔”地一碰，向周副主席敬了一个军礼。

“可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气死了！”

蒋介石被逮起来以后，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要拿他怎么办。他听说周恩来来到了西安，心一下子凉了：完了，落在共产党手里，定死无疑。

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副主席会见了蒋介石。

唉，蒋介石那“领袖”派头一点也没了：脸色灰白，出气不匀，低着头，弯着腰，瘫坐在沙发上。

周副主席对他说：蒋先生落到这个地步，是谁的过错呢？完全是你自己。你违背孙中山先生遗嘱，背叛革命，十年内战，把人民打入血海，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你如果能识大局，立即实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张、杨两将军自然可以放你回去。否则，你将成为千古罪人。

听着周副主席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蒋介石能说什么呢？只好一言不发。

在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经过坚决斗争，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可是他还要拿架子，只口头答应，不在协议上签字。很多人怕他反悔，周恩来副主席说：“斗争要有个策略，签字是个形式，可以适可而止。他要反悔的话，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他自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大家高兴地说：

“全国联合抗日，可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亲日派气死了！”

“对！说得好！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不高兴的事，我们偏要做；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高兴的事，我们偏不做！这样我们就能把事办好。”周副主席高兴地回答大家。

蒋介石被释放了。张学良将军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没有私人怨仇，主动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副主席听说，立即赶到机场劝阻他。可惜，他赶到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起飞了。张学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扣留了。后来，杨虎城将军也被蒋介石杀害了。

劳山遇险

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停留两个多月后回到了延安。

一九三七年五月，为了进一步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又要去西安。

那个时候，红军只有几辆旧卡车，周副主席只好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卡车上坐着警卫班和随行人员。

汽车开出延安城，向西疾驶，过了三十里铺，向劳山开去。劳山是黄龙山的支脉，在延安以南三十多公里。山并不高，但是丛生着茂密的树林。这里有一股三百多人的国民党武装土匪，经常残杀抢掠邻近村庄的群众，偷袭红军。

汽车刚过山卡，进入谷地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车上的人顿时警觉起来。军委参谋处陈有才参谋问：“什么响？”

警卫员刘九洲说：“像鞭子响。”

一个同志反驳说：“鞭子，这山里有人放羊吗？”

话音没落，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司机中弹，汽车不能开动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周副主席沉着坚定地下达命令：“快，下车，散开，还击！”

警卫班和所有人员立即跳下汽车，分散在汽车周围，猛烈回去敌人。周副主席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敏捷地拉开车门，跳下汽车。敌人从左边、前边、后边三个方向，以步枪、机枪的密集火力向周副主席和红军战士射击，还不住地投手榴弹。一时，黄沙四起，硝烟弥漫。这次跟周副主席出发的战士只有二十五个人。敌人呢，比红军战士多七八倍。红军战士三面受敌，地形也极为不利。而且周副主席又有重任在身，不容许同这股敌人纠缠。于是，孔石泉参谋掩护周副主席，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转移到三十里铺去了。

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强大的火力，继续向红军进攻。英勇的红军几乎全部牺牲。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听到枪声，判断周副主席可能遇到了伏击。毛主席知道了，极为关切，立刻派出骑兵队急驰劳山增援。可是援军到达的时候，这股匪徒已经逃走了。原来他们从牺牲的陈有才参谋衣袋里发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名片，错把陈参谋误当成周副主席，又怕红军增援，就急忙跑了。

这次劳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四人，其他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当烈士的遗体运回三十里铺的时候，周副主席俯身凝望着每位烈士的遗容。他紧紧攥住陈有才烈士的手，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受了重伤的警卫员刘九洲被抬过来。副主席轻声问他：“九洲，怎么样？不要紧吧？”

这个机灵勇敢的小战士，这时候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副主席立刻转身命令：“迅速送九洲去延安医务所！”

第二天，周副主席又到医务所去看望刘九洲。处在昏迷中的刘九洲听见副主席不断地向医生询问他的情况，深受感动。

刘九洲的伤好了，又欢蹦乱跳地回到周副主席身边。

有一天，周副主席老是望着刘九洲，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刘九洲有点慌，忙问：“副主席，有什么事吗？”

“九洲啊，”周副主席沉重他说：“咱们就要去汉口了，要去看看有才他们的坟呐！你知道他们的坟在哪里？”

刘九洲愣愣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念牺牲了的战友，也为周副主席的深厚情意所感动，哽咽着说了句：“据说在大东门外宝塔山下。”就说不下去了，悲痛地跑出门去。

“两路红小鬼会师”

这是周恩来和孩子剧团的故事。

孩子剧团是一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中失去父母、失去家庭的流浪儿组成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抗日宣传，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地痞流氓的气。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又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包围，沿着苏北平原，经过河南、湖北，一九三八年一月来到当时抗日战争的后方——武汉。

那时候，周恩来副主席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代表的身份驻在武汉（八路军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协议改编而成的）。

孩子剧团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就是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家。他们多兴奋啊。

周副主席听说他们来了，非常高兴，立刻委托邓颖超同志去看望他们，还给他们送去办事处的同志们凑起来的钱。

二月九日下午，周副主席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乘一辆大卡车来到孩子剧团的驻地——洪益巷培心小学，接孩子们去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专门为他们举行的联欢会。

八路军办事处的红小鬼们，早就站在门口迎接了。卡车一到，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红小鬼的手拉着孩子剧团演员的手，一起来到二楼的会场。哎呀，会场的墙上贴了那么多醒目的鲜艳的标语：“欢迎孩子剧团的小战友！”“欢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孩子剧团！”“小孩子、大孩子，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得多好哇！会场当中，还挂着许多五彩缤纷的绒线绢带，四面墙上挂满了英雄的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图片。孩子们一张张看着，心里激动极了。

大家坐下，喝着热茶，像亲兄弟一样谈着。

忽然，人群安静了，一个身穿灰军装，身材挺拔、英姿勃勃的中年人，满脸微笑地走进来，后面还有几个同行的人。这是谁呀？怎么这么面熟？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介绍说：“孩子们，这就是你们日夜想见到的周恩来同志。”孩子们齐声欢叫起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文学家郭沫若，当然，还有孩子们喜爱的邓颖超妈妈。

周副主席来到孩子们中间，向大家问长问短。

小演员们唱起了歌：“流浪儿，流浪儿，流落在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

周副主席眼睛湿润了，难过地走出人丛。

孩子们都巴望着周副主席讲话，好听听他的嘱咐。周副主席答应了大家的要求，站到孩子们面前。他说：“今天是两路红小鬼会师。一路是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路是从上海出发，为了抗日，走了几千里来到武汉的工人子弟的红小鬼剧团。希望你们两路红小鬼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学习打日本鬼子的道理，学习打日本鬼子的方法，搞好抗日宣传工作。”

孩子们热烈鼓掌，手都拍疼了。

周副主席接着又深情地说：“我送给你们三种精神，这就是，发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一手打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孩子们频频点头，牢牢记住周副主席这珍贵的赠言。

从那以后，孩子剧团经历了无数艰苦斗争的考验，一直活跃在抗日宣传的前线。在这些斗争中，周副主席始终关怀着他们，给他们勇气和力量。

和气的“老板”

一九三九年初，周副主席由重庆出发，到各战区视察工作。

那时候，周副主席还担任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后改组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所以，各战区的国民党官员都得在表面上恭恭敬敬地接待他，向他汇报情况。

周副主席来到江西省上饶县。国民党司令部请他吃饭。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让人伺候惯了，席间总是有副官给他们递碗、盛饭、斟酒、点烟。周副主席谢绝了来侍候他的国民党副官，自己动手盛饭，弄得那些国民党大官非常尴尬，只好让那些副官走开，也自己动手盛饭。

这件事对那些受惯了欺压的国民党下级官兵影响很大，他们羡慕地对警卫员刘九洲说：

“刘副官，看你们的‘老板’多和气呀！你们多么平等！我们这儿，唉！”

这位和气的“老板”，不但感动了国民党下级官兵，还感动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呢！

那是周副主席到了浙江省天目山的时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都来迎接他。

这山上有座寺庙，大极了，光是出家的和尚就有一万多人。他们听说周副主席要在这里开大会，作报告，都排队来听。

周副主席对和尚非常和蔼，对他们说：

“你们虽然出家做了和尚，但你们也还是中国人，你们也应该和全国人民一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丢失的国土，我们一定要收复，日本侵略者一定会被我们驱逐出去。”

这番话感动了和尚们，他们心悦诚服，用寺院最隆重的宴撰招待周副主席和同行的人。他们向周副主席表示，一定要团结抗日。

周副主席一路视察，和气的“老板”的名望和事迹也就传播了一路。

云岭十七天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副主席到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住了十七天。

新四军，是红军长征以后由留在南方备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的。叫“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当年北伐战争中威震全国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新四军的军部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南昌成立，以后搬到安徽省东南部泾县的云岭。

新四军成立以后，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应当东进苏南（江苏省南部），直逼京沪（南京、上海），渡长江北上，进入华北，以便和江北的八路军相互呼应，并肩战斗。可是，当时在新四军的一位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国民党，不敢跨出国民党划定的区域一步。结果，新四军虽然作出了很大成绩，改变了江南地区的抗战局面，但是丧失了不少发展革命的好机会。

周副主席这次来，就是要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

他在新四军军部俱乐部作报告，分析形势，讲了统一战线

中的各种问题和党的方针，明白生动、深刻易懂，引起阵阵掌声和笑声。这个报告他讲了整整十个小时。

开完会，他又看望驻在云岭的所有的部队。有个团的驻地离军部有七八公里，他也骑着马翻山越岭去看望。

晚上，他不断地找各位领导人谈话，解释党中央的方针。十七天中，他没有一天得闲。

三月十五日，他离开新四军军部，那天，天气很好，明媚的阳光，照耀着翠绿的田野，江水清澈见底，小鱼欢快地游着，云岭到处是欢歌笑语，生气盎然。军部门前，大家围在一起，同周恩来副主席依依惜别。为了留念，周副主席和大家一起照了相。

周副主席这十七天没有白白辛劳。他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新四军从两万人迅速发展到九万多人，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另一支主力军。

在绍兴老家

周恩来生在江苏省淮安县。可是，他的祖父是由浙江省绍兴县搬到淮安去的，绍兴是他的祖籍，那里还有他的不少亲属。

周副主席离开新四军军部，三月底到了绍兴。这下子，警卫员刘九洲可高兴啦，心想，副主席好不容易回到老家，可以让他好好歇两天，保养保养了。

谁知一进绍兴城，副主席就对他说：“咱们到小馆子里吃点儿东西再回家。”

“到小馆子里吃？”刘九洲吃惊了，心想：“到了老家，倒要去普通的小馆子里吃饭。再说，您也不是普通人呐！”

周副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家乡的面味道很不错，你尝尝就知道了。”

他带着小刘到一家很小的馆子，吃了最普通的绍兴面条。这就算回到老家啦。

他回到自己家里，定出了规矩，不允许惊动任何人，不允许家人办酒席，自己也不出去赴宴，一日三餐都吃家常饭。

他在家住了三四天，一天也没歇着，更没有好好“保养”。刘九洲的心思白费了。三四天里，他在大善寺和诸暨枫桥开了两个大会。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团结抗战的方针，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会后，大家都说他的话使“迷途的航船找到了灯塔”。

除了开会，他还听取党的地下组织的汇报，指导他们的斗争。好容易有了点空闲，没有出门工作，刘九洲想这回该休息了吧？他推门一看，周副主席正在提着毛笔写大字呢！他写了许多题词，送给家乡的父老亲人。比如：“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前途光明。”他给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题词，要他们学习鲁迅精神，和日寇作拼死的斗争，收复沦丧的国土。他号召妇女们学习女英雄秋瑾的革命精神，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战斗。他还给表妹题了词，要她“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希望她继承家乡女英雄秋瑾的革命气节，为浙江女儿赢得新的光荣。

周恩来就这样在老家度过了四天。

送警卫员上党校

警卫员刘九洲是个苦孩子，十三岁参加红军，从小没读过书，文化水平不高。虽然跟周副主席学了点文化，可是干起工作来，总觉得知识不够。他很想到延安党校去学习。周副主席虽然有点舍不得他走，可还是要人给他开了封介绍信，准备一有机会，就送他回延安学习。这封信刘九洲一直装在口袋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重庆，一天，刘九洲给周副主席送报，副主席问他：“这报，你看过啦？”

“看过了，我也会写简单的信了。”小刘说。

副主席听了，高兴极了。邓颖超同志听了也很高兴。

刘九洲拍拍上衣口袋，对邓颖超同志说：“我那封介绍信还在兜里呢！”意思是希望她有机会转告周副主席，送他去延安学习。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周副主席就召集大家开会，欢送一位姓何的医生和刘九洲去延安。

去延安学习，本来是刘九洲的愿望，但是一旦真要离开周副主席，他又难过起来，一串串的泪珠扑簌簌地掉下来，一幕幕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惜别、感激、留恋之情交织在一起。

周副主席讲话了，他讲得热情而又深沉。他说：“我们今天欢送九洲同志，我本来打算要他和我长期一起工作……他是个苦孩子……他要求学习，很对。组织上同意他的要求。”他望着刘九洲，严肃地说：“再给你一个任务，就是一路上要照顾好何医生一家。你要好好读书，努力提高文化知识，多锻炼身体，成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刘九洲这时候激动极了，他站起来向周副主席大声保证：“我一定好好读书学习，更好地为革命工作……”

周副主席双眼紧紧盯着他，走到他面前，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支金笔，递给他。刘九洲双手抖颤着接过这支凝集着副主席心意的笔，刹那间，他觉得自己肩上增加了千斤重的担子。他从周副主席的目光里看到了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深切期望。

刘九洲到延安党校去学习了。毕业以后，他成了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指挥员。

小报童

报童，就是送报、卖报的孩子。这里说的是《新华日报》的小送报员。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一张报纸。因为它说实话，宣传真理，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它，国民党反动派却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总想破坏它。他们给《新华日报》定下了“只准印、不准卖”的禁令，指使特务控制的“派报工会”扣留《新华日报》，不分配给报贩发送。警察、宪兵、特务还在大街上驱赶、抓捕购买和阅读《新华日报》的进步人士。《新华日报》就组织了自己的送报队伍，想尽一切办法把报纸送到群众手中。

《新华日报》的送报员，都是些十几岁的苦孩子，有的是失去父母的孤儿。这些小报童受到周副主席亲切的关怀，在党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教育帮助下，一个个又机灵又勇敢，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也拿他们没办法。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印有周恩来副主席题词的《新华日报》，大部分就是这些勇敢的小报童们送出去的。他们一早就起来，从报社的营业部领来报纸，有的裹在行李里，有的放在箩筐里，躲过军警的检查，把一张张报纸送到订户家里。有的报童还勇敢地跑进国民党官兵的宿舍里，从门缝里给他们塞进一张报纸，往墙上贴一张报纸。报纸上周副主席的题词，就像炸弹一样，在这些国民党官兵的心里爆炸啦。

国民党当局气坏了，派出许多特务殴打报童，扣留报纸，捣毁营业部的门窗。

二月四日，国民党又派出一帮特务逮捕殴打报童，扣留了报纸。周恩来副主席在当天傍晚亲自把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找来，一起到曾家岩附近扣留报纸的现场，让他亲眼瞧瞧特务是怎么扣留报纸、殴打报童的。在事实面前，张冲只好认错。经过交涉，报童取回报纸，周副主席把剩下的报纸当场散发给周围观看的群众，周副主席在寒风黑夜中，挺立在街头两个多小时才走。这场斗争，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声威。

还有一次，一个报童被特务抓起来，周副主席亲自打电话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反动当局只好把这个报童释放。

小报童们在《新华日报》社里的救亡室（俱乐部）里学习文化，学习革命道理，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周副主席称赞他们是“报童军”。

后来，许多小报童都到了延安，在革命大熔炉里成长为人民的战士。

话剧《屈原》的上演

革命文学家郭沫若和周恩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郭沫若非常尊重周副主席，对于“周公”（这是当时进步人士对周恩来的尊称）的意见总是心悦诚服。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民政府”准备请郭沫若当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主管抗战的文化工作。郭沫若开始不大愿意，因为表面上这是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当官”，而且要给反动的“政治部长”陈诚当部下，实在觉得别扭。周副主席亲自找郭沫若谈话，讲了好些道理，还指出他的一些毛病，郭沫若高兴地接受了。事后郭沫若对人说：周公有最博大的胸怀，他的话不能不听的。

郭沫若在第三厅工作，办了许多促进革命文化的事情，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郭沫若写了不少历史题材的戏剧，借古讽今，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本质，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写出新剧本《屈原》以后，读给周副主席听，周副主席又仔细阅读了剧本，还和专家们一起详细讨论，说这是个好戏，他还

到剧场看排练，对剧中屈原的一段独自“雷电颂”非常欣赏，说这是郭沫若借古代爱国诗人屈原之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反动派的控诉，好得很！他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朗诵“雷电颂”。他听了好几次，然后对演员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作者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人民的心声，在剧场里一定会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

果然，《屈原》的演出，成了山城重庆的大事，引起很大轰动。周副主席十分高兴，叫同志们多买几张票，让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轮流去看。看完了戏，周副主席还召集大家开座谈会，讨论这个戏的政治意义。《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宣传这个戏演出的成功和意义。

在周副主席的支持下，《屈原》的演出打破了山城沉寂的气氛，抗日空气又逐渐浓厚起来。

“共产党的车跟不上！”

曾家岩五十号，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的驻地。周副主席就住在这里。这地方又称周公馆。

周公馆可不是个平静的地方。

这里背靠嘉陵江，是座三层小楼。一楼和三楼是代表团的同志住，二楼却住着一帮国民党特务。周公馆旁边的巷子里就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公馆”，和周副主席住室的窗子遥遥相对。那儿还停着许多汽车，只要代表团的汽车一开动，特务的汽车就紧紧跟上。就连五十号的传达室也有一半是中共代表团的，那另一半呢？也住着国民党特务。

这还不算，周公馆周围还有许多“开茶馆的”、“修鞋的”、“卖烟的”，全是国民党安插的特务、暗探。

周副主席就住在这样一个虎狼窝里。

但是，一切监视、盯梢，都不能束缚住代表团的活动，周副主席带领大家同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粉碎了特务们的一切阴谋。

大家都为周副主席担心，他更关心同志们安全。每个同志外出工作，他都亲自叮嘱要提高警惕，甚至该穿什么衣服、走哪条路、派谁去接应都安排得极其周密，而且每次都要等到外出的同志平安归来，他才放心地去工作或休息。

他和大家一道商量，研究出许多甩开特务的巧妙办法。

有一回，一位朋友想见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请这位朋友把汽车开到公园旁边一条僻静的公路上等着。

周副主席坐着汽车出了周公馆，特务的汽车马上像苍蝇一样叮上来。

周副主席的车先是慢慢地在公路上跑，快到约会地点的时候，汽车猛地加足马力，飞一样地冲下山坡（重庆是山城，马路顺山而筑，常有上坡下坡）。特务的汽车没有准备，一下子被甩在后面好远。到了约定的地点，周副主席跳下车，跨上等在那里的朋友的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代表团的汽车又慢慢开动了，特务的汽车喘着气追了上来。车上的特务松了一口气，紧紧盯着前面。代表团的汽车开到了重庆有名的国泰大戏院门口，停下来，司机哼着曲子坐在车里，好像在等戏院散戏。特务们也就傻等着，咱们的周副主席呢，早和朋友在安全地点谈起了重要的事情。

这类事常常发生，特务们整天被搞得晕头转向。后来，一个特务对咱们的同志说：“唉，周先生真厉害！你们共产党的人，我们跟不上，连你们共产党的车，我们也跟不上！”

病人变医生

一九四二年春天，周副主席得了重病，必须住院动手术。在重庆这个特务横行的地方住院，能保证安全吗？大家都非常担心。

周副主席说：大家放心，虽然国民党反动派仇视共产党，可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坚决抗日的，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抛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只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医院里进步的医护人员，就能避免发生问题。

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批准周副主席住院治疗。

一九四二年六月，用副主席住进中央医院。这医院在离市中心三十公里的歌乐山，非常僻静。

果然，特务们跟踪而来了。其中有的还给看望周副主席的各界人士，暗地登记、照相，还有人专门跟踪他们，而且一批特务竟然穿上白大衣冒充医务人员，潜入病房周围。在周副主席病房外面的外科办公室里，就经常有这么几个家伙，像狗一样整天蹲在那儿，竖耳朵、瞪眼睛地窥听动静。连医生护士都冷眼瞧着这帮坏蛋。

这帮家伙自以为可以吓住人，谁知探望周副主席的人越来越多。当医护人员知道了这位和蔼可亲的病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的时候，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想尽办法。冒着受迫害的危险，找机会接近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炬，谁碰到他，稚的心就会被他点燃，也冒出火花来。

接近过他的医生护士，从他身上看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品质。一位医生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发表评论说：

“共产党的官就是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国民党的官吏，甭管大小，全是作威作福的老爷，谁敢接近啊！看看人家周先生、周将军，人家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堂堂的中将啊！哼，国民党报纸天天骂共产党，全是骗人的……”

医护人员对特务们由害怕转为憎恨，想尽办法支开他们，找会同周副主席交谈。他们询问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也问抗战的形势。

“周先生，您说，八路军在日本鬼子占领区怎么能呆得住呢？”

“依靠人民群众啊！”周副主席回答，接着向他们详尽他讲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边区人民怎样开展大生产运动，争取丰衣足食，打破日本和国民党的封锁；八路军、新四军怎样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像鱼和水一样，不可分离；还谈到白求恩大夫，启发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周先生，真要感谢您。听了您的话，使我们明白了好多道理！”医护人员一次次地这么道谢着离开病房，又一次次地进来再听他讲解。

他的病房成了课堂，他这个病人变成了医生，给这些医护人员医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糊涂病。

有一天上午，一位年轻医生走进周副主席病房，看看没有别人，就急忙递过一封信，信上说：由于您的指教，我更加向往延安，向往边区，希望能实现我的理想——去延安。

动手术那天，陆军医院的王厉耕主任赶来了。他是位有正义感的医生，在周副主席精神的感召下，他精心地主持这次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

就这样，周副主席这位病人，在住院期间治好了很多人头脑里的病，使

他们变成有理想的、向往革命的人。

“我没有给家里寄过钱”

这是周副主席和另一个警卫员彭海贵的事。

彭海贵十四岁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上过马列学院。一九四四年四月到周副主席身边当警卫员。一九四五年，他又跟部队到了东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年来，一直不了解他在江西老家的父母的情况，心中十分惦念。

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这二十年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父母。两位老人长期不知道儿子的下落，突然接到这信，多高兴啊！他们赶紧请人给写了封回信，把家乡闹土改、分田地的事全写了，最后说：“海贵，几年间，你给家寄的钱，全收到了……”

彭海贵一看信，吃了一惊：“我没有给家里寄过钱，怎么家里会收到我寄的钱呢？”

这可是怪事，他不由得思索起来。

他想起来了。西安事变后，一九三六年底或者一九三七年初，他在西安曾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可是怕父母受到反动派的迫害，没有讲自己是红军战士，只是说自己在做买卖……可是那次自己没寄钱去呀！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特务横行，他没有再给家写信，更没有寄过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想啊，想啊，终于想起来这么一件事。

他刚到重庆的时候，有一次周副主席跟他闲谈。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彭海贵的家乡。

“你家里有什么人呐？”周副主席问。

“有六十多岁的父亲，还有继母。”

“生活怎么样？”

“很苦哇！”“你成家了吗？”副主席又问：“要是成了家，就把父母接出来吧！”

“我没成家。”彭海贵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四岁……”

周副主席“哦”了一声，就沉思起来。

那时候，周副主席可没说寄钱的事啊。

彭海贵赶紧到处打听，终于证实了：这钱的确是周副主席让寄的。他要工作人员从救济费中拨出一笔钱，每年给彭海贵的父母寄去，当时用的是一个化名寄出，也没写寄钱的地址。

彭海贵知道了真情，感动极了。一位党的领袖，是这样关怀着普通战士的父母哇！

纺线英雄

“小小纺车吱扭扭地转，
摇起那纺车纺线线，
组织起来好啊，力量大无边，
边区闹生产，打碎敌人封锁线……”

这是抗日战争后期，流传在陕甘宁边区的一首劳动歌曲，歌唱的是一九四三年边区火热的大生产运动。

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派了二十多万军队封锁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老百姓一样吃野菜、黑豆、榆叶面。缺油、少盐，也没有布匹、医药。

怎么办？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难关。

这时候，周副主席刚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用受过伤的右臂学习纺线。

那时候，纺线用的是小小的纺车。人双腿盘坐在车前，一只手摇着纺车轮子，一只手捻着棉花条，在旋转的锭子上抽出细细的棉线来。这是一项又累人、又细致的工作，通常是老太太和年轻妇女们干的事。

可是，那时边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纺线，才能有织市的棉纱。周副主席一带头，那些在战场上杀敌的战士也摇起纺车来。哈，这些舞刀弄枪的英雄汉，一开始侍弄这纺车还真不容易呢，粗壮的大腿一会儿就坐麻了，粗大的手指头捻不住棉条，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又缠到锭子上，捻出来的线粗细不匀，简直像又松又软的绳子。

周副主席纺线可是个行家。他摇起王震（八路军三五九旅的旅长，著名的将军）送给他的纺车，“嗡嗡”地跟唱歌一样，右手一拉一送，捻出来的线又匀又长又细，常常引得不少人来参观。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枣园举行了一次军民纺线比赛。呵，那场面可真够气派，各单位选上来的纺线能手集聚一堂，二百多架纺车排列成行。枣园礼堂前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周副主席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是比赛的选手。周副主席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大家互相学习吧！”

人群安静下来。忽然，一声令下：“开始！”两百个车轮转起来，“嗡嗡”就像是巨大的乐队在演奏，一条条细长光洁的线儿连绵不断地纺出来，线穗子越来越粗，像是一个个成熟的白萝卜结在每架纺车上。

周副主席不慌不忙，有节奏地转着车轮，捻着棉线。

比赛结束了。周副主席纺出的棉线被评为头等线，和任弼时纺的棉线一起送到了农业展览会。周副主席还被评为“纺线英雄”！

这位纺线英雄纺线线的故事，到今天还在陕西人民当中流传呢。

一顶降落伞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上午九点，一架军用飞机由西安起飞，穿过云层、雾海向重庆飞去。

周副主席就坐在这架飞机里。他是去参加预定在三十一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闭幕会的。

政治协商会议是经过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斗争，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以及各界的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周副主席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十一日以前赶到重庆去。

飞机上还有周副主席的随行人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还有一个刚满十一岁的小姑娘叶扬眉。她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虏，在监狱里英勇不屈地斗争了五年。由于共产党的斗争，全国人民的声援，很快就要恢复自由了。小扬眉就是到重庆去迎接亲爱的爸爸的。她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和小弟弟，高兴得在机舱里又唱又笑。

飞机飞到秦岭上空，突然震动起来。原来强大的冷空气团包围了飞机，机身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冰雹打在机身上噼啪乱响，飞机经受不住这突然加上的重量，直往下掉。高高的秦岭，耸入云霄，飞机再往下掉，就要撞在山峰上，情况危险极了。

周副主席走到驾驶舱询问驾驶员，鼓励他们沉着驾驶。

机长命令：扔掉舷梯、水桶，减轻飞机的重量。大家立即动手，把机上多余的物件扔下。

机长又命令：扔掉行李、物品。周副主席立即指挥大家把行李杂物扔下飞机。

可是飞机仍然无情地下降、下降……

机长命令：全体乘客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

周副主席立即对机长说：“飞不过秦岭就返回西安。要沉着、冷静，一定要克服困难，渡过险关。”

大家都在背降落伞，突然听见了哭声。

谁在哭？哦，小扬眉。为什么？哎呀，她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

要是飞机突然出了事故，大家都要跳伞，小扬眉怎么办？

这时候，周副主席在摇摆的机舱中，几步就走到小扬眉身边，迅速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给小扬眉背上。他，把生的希望送给了孩子，自己去迎接最大的危险。

他搂着扬眉安慰她：“扬眉，不哭不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

同志们一看，都提出意见，说，降落伞还是让周副主席用吧，扬眉身体轻，可以拴到别的同志身上。可是周副主席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搂着扬眉，坐在她身边。

飞机终于飞出了云层，阳光融化了机身上的冰层，飞机平稳了。它载着含泪而笑的小扬眉和她敬爱的周伯伯，回到了西安。

血染较场口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了。国民党在表面上答应要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民主与和平，这两样中国人民盼望了多年的东西，好像就快得到了。多少年来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前途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这希望立刻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地毁灭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集合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派出了大批特务埋伏在会场里。

会议一开始，特务们就大喊大叫地冲上主席台，一声喊：“打！”主席台上，会场里特务们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多位民主人士。

周副主席听到消息，不顾自身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的警卫人员心情紧张极了，一直紧跟在他身后，要是有一个特务敢下手，卫士们就决心牺牲自己，保护周副主席。可是周副主席一点也不害怕，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

他愤怒的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窝蜂地溜走了。

周副主席又赶到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各界人士。十二日，他和邓颖超等人带着中共代表团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慰问信及鲜花、水果，再次去医院慰问。李公朴先生忍着伤痛对周副主席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要更坚强起来。”

较场口大血案一下子撕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面具。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周副主席在会上痛心地说：“特务分子这样为所欲为，继续闹下去，人民的自由怎么能够得到保证……”代表们一致推举他为代表，去当面质问蒋介石。

第二天早晨，中共代表团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周恩来先生亲启”。周副主席打开信封，一颗子弹掉在地上。信上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周副主席哈哈一笑，说：

“好啊！那我不客气地收下吧！”

说完，他立即上车去找蒋介石，当面对他提出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话，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涉水过河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的一天，周副主席和美国、蒋介石的代表，乘汽车由武汉出发，向正北方向一百多公里外的宣化店驶去。

那天正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周副主席坐在吉普车里，望着蒙蒙雨雾，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宣化店。

宣化店，是中原解放区的中心。蒋介石一手在“和平”“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签字，一手下令二十万大军围攻宣化店。中原解放区正处在危急之中，很多战士连草鞋也穿不上，赤着脚同国民党军队交战。

经过激烈的斗争和交涉，终于成立了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到宣化店去视察。

车过黄陂县，正逢滂水洪汛到来，河水猛涨，汽车不能过河。天又渐渐黑了。美蒋代表心里高兴：“能晚去一天，就让共产党多倒霉一天。”

三人小组在河边的村庄宿营了。

周副主席在老乡家吃了一顿菜粥，就去找老百姓了解过河的问题。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一块吃过自己带来的罐头食品，就打起桥牌来。

在河边上，周副主席身边围了一群老百姓。

“河水明天早晨能退下去吗？”他问老乡们。

“看来一下子还退不下去。”老乡们争着说：“等等吧，水退了再过河！”

“不行啊！”周副主席说：“我们有急事，要赶快去宣化店，大家看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过河？”

一位老大爷说：“人嘛，过得去；汽车，过不去。”

“要是多找些人，把车抬过去行不行呢？”周副主席又问。

老大爷围着汽车转了转，点着头说：“车子倒是不大，可以试试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出了不少主意，不少人自告奋勇，答应明天一定去抬车。

原来，这地方曾经来过八路军，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一直温暖着群众的心。他们知道周副主席是共产党的代表，刚才还和老百姓一起吃菜粥，和那些远远离开群众自己吃高级食品的官儿们有根本的区别。周副主席又对他们讲了好多革命道理，老乡们听得出神。

第二天黎明，天气晴朗，村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健壮的小伙子们光着脚、挽着裤腿，正在议论抬车过河的事情。

河水有半人深，水流很急，周副主席的随行人员已经赤脚走进冰凉的河水里。

“尊敬的周将军，”美国代表指着涉水过河的战士：“我们，怎么过河呢？难道和他们……”

“是啊，周先生，”国民党代表也说：“这么过河……”

“哈哈，”周副主席笑起来：“这种情况我们在长征的时候是常见的。”说完，也和战士一样，脱下长裤，赤脚走进河水里。

战士们看着美蒋代表为难地站在河边的样子，笑了：“他们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吧。”

周副主席走到河中心，招呼小伙子们抬车过河。二十几个人抬一辆吉普车，借河水的浮力，喊着号子，在周副主席的指挥下过了河。

美蒋代表呢？所有当官的都是让老百姓背着过河的。

周副主席站在河岸，向对岸的乡亲们招手告别，汽车又向前开动了。

周副主席到了宣化店不久，在他亲自部署下，中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就秘密转移，胜利突围了。这下子可把蒋介石气坏了。

“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周恩来副主席一九四六年住在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

这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政协决议，宣布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第二天，周副主席在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代表团会议室里，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记者来得非常多，很多人只得挤在门口、窗外和院子里。

周副主席站在一张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向中外记者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的罪行，说明中共中央坚决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谋术实现真正和平的主张，还发表声明，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一个记者提出问题：“假如国民大会通过对冲共下讨伐令，中共中央何以自处？”

周副主席用炯炯的眼光瞥一下那个记者，泰然地一笑。

“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嘛！抗战前是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都经过了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他停了一下，看看发问的记者：“假如你是替我们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你，不要紧。”

很多记者松心地笑了。

周副主席又说：“一切靠自力更生，譬如说，我们这次回延安去，要吃饭，就要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只要我们永远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永远有事做，有饭吃，永远有新的活力，永远有新的希望。”

当时，不少人最想知道周副主席和人民军队能不能回到南京，什么时候回来。

周副主席坚定地说：“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果然，他讲了这活不到三年，人民解放军就胜利地占领了南京，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抬担架

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同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激战。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轰隆隆的炮声在几十里外中央机关驻扎的山村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下午，伤员陆续从前线抬下来。毛主席立刻指示机关工作人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给伤员裹伤换药，烧水煮饭。周副主席站在一个山坡上，检查安置伤员的工作。他查看了每一副担架，慰问了每一个伤员。

忽然，他看见有副担架放在村口，急忙走过去，轻声地问伤员：“同志，你伤着哪儿啦？”

“唉，大腿打坏了。”伤员说。

“疼得厉害吧？”周副主席疼爱地说：“不要难过，到了医院，过几天就会好的。”

伤员紧盯着周副主席，心想：“他是谁呀，这么面熟？”

周副主席对担架旁边的老乡说：“请你赶快把他抬走吧！”

“唉！”那老乡叹口气，指着躺在树下的一位农民说：“这担架是我们俩抬的。他病了，剩下我一个人。村里的人都支援前线去了，找不到人……”

周副主席一听，马上叫警卫员扶那生病的老乡去医务所。他自己走到留下来的老乡面前，说：“来，咱们两个抬吧，快抬到前面的村里去，别耽误了时间！”

“同志，你？恐怕抬不动吧？”那老乡有点犹豫。

“能，能抬，走吧！”周副主席说着，催促老乡，一同抬起了担架。

担架抬走了。道路上净是炸弹坑，很不好走。周副主席怕伤员再受痛苦，尽力地把担架端平，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伤员在担架上仰望着他，心里很不安。

机枪连的战士们赶来了，争抢着抬担架，换下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离开担架的时候，握着伤员的手说：“同志，你们打了胜仗，意义很重大。你们负伤是光荣的。安心养伤吧，不要着急。”

伤员看着他走远，悄悄地问战士：“他是谁呀，好面熟！”

战士说：“我们政委。”

“不，你骗人，他像是周副主席。”

战士笑笑，没有说话。那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用了化名，要保密呀。

到了前面的村里，放好担架，战士要走了。他趴在伤员的耳边悄悄说：“同志呀，实话实说吧，你猜对了，方才抬你的确实是周副主席！”

伤员一听，猛地坐起来，抱住战士呜呜哭起来：“哎呀，真是他呀！你回去给我捎句话，就说我永远忘不了他。我养好伤，马上回前线，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雨夜塌窑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陕北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在取得节节胜利，解放北平的日子不远了。

西柏坡村也在黄土高原上，人们也住在窑洞里。

河北省的七月，正是雨季，大雨连着小雨，下了几天。一天深夜，忽然在雨中传出一声轰隆隆巨响，接着有人大喊：“窑洞塌了！窑洞塌了！”

窑洞塌了两孔。里面住着四个人。战士和乡亲们都赶来抢救。天黑极了，工具又少，一时使不上劲。电工来了，安上电灯一照，哎呀！半壁土崖差不多全塌下来，把两孔窑洞深深地埋到土山里去了。

“糟了糟了！”有人说：“人压在这么厚的土里，挖出来也没有多大活的希望了。”

忽然，一个高亢的声音响起来：“希望不大也要挖呀！挖下去总比不挖要有希望呀！”

大家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他从旁边拿过一把铁锹，小心地挖着土，又对大家说：“我们的同志压在土里，咱们能忍心离开这里吗？”

他的话教育了大家，各种工具都挥动起来，人们急切地盼望救出自己的战友。

周副主席发现挖上的面积太宽，就对行政管理处长说：

“这样不行，你去把最强的劳力组织一下，先挖一条深坑进去，打通空气。”又转身问大家：“谁清楚下边床铺的位置？赶快朝床铺方向挖！”

在他的指挥下，抢救工作有秩序了，进程加快了。忽然，最前面挖土的同志停住手，一下子扑在地上不动了。

“什么事？”周副主席忙问。

“好了好了，有希望了！里面有声音哩！”扑在地上的同志说。

周副主席也跳进沟里静静地听了一下，转脸对大家说：“同志们，埋住的人还活着，赶快挖！”

大家干得更快了。不一会挖出一块床板，发现下面有个同志被压住半个身子。撬开床板，原来是四川人石振扬同志。他被大家架出来，看见浑身泥和汗的周副主席，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是您救了我！”说完，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大哭起来。

“别难过！”周副主席安慰他：“是大家救了你。我们送你去医院，过几天就会好的。”

接着又抢救出受了重伤的沈占彪。可是，最后挖出的两位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

浑身泥和汗的同志们，为牺牲者低下了头。

“同志们，我们救活了两位同志，这是我们的胜利。”周副主席说：“还有两位同志没有救活，我们感到非常沉痛，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细雨还在飘着，好像为死难的战友哭泣。同志们走做了，周副主席却又挨门挨户检查大家住的窑洞去了。

情深谊长的毛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品里，有一条缀满了补丁的普通红色毛毯。它凝结着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之间大海一样深厚的战斗情谊。

这条毛毯原来是一位革命烈士生前赠给朱德总司令的纪念品。朱总司令带着它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带着它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带着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斗争多么残酷；在长期征战和行军生活中，朱总司令忍痛丢掉了很多东西，却一直保存着这条毛毯。看见它，就会怀念起那些牺牲了的革命烈士。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发生了，周恩来副主席常常顶风冒雪奔波在西安、延安之间。朱总司令就把这珍贵的纪念品转送给周副主席，让他用来挡风御寒。

一九三七年五月，周副主席从延安到西安，在劳山遇险，遭到国民党匪徒的袭击。周副主席亲自指挥大家奋勇作战，后脱险来到我军驻地三十里铺。在红军的骑兵部队赶到的时候，匪军气急败坏地在毛毯上乱砍了十几刀，然后仓皇逃走。这条刀痕累累的毛毯经过洗涤、织补，又回到周副主席手中。

抗日战争爆发了，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为了欢送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周副主席又郑重地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总司令。

这条历经战火的毛毯，铺在太行山区人民的土炕上，温暖着人民的老英雄朱总司令。人民热爱朱老总，常常把土炕烧得暖暖的。有一次，这条毛毯在土炕上被烤了一个大洞。朱总司令又让人把它细心缝补好。

这条带着刀痕火伤的毛毯，一直陪伴朱总司令到全国解放以后。

现在，它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后人参观，去细细体味它每一条毛线里包容的战友的深情。

“制度要大家遵守”

一九四九年末，周恩来已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有一天，他到前门火车站送别客人。返回途中，临时决定去北京医院看望一位朋友。

汽车开到北京医院西大门，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出来拦住汽车，不让开进医院。

周总理的卫士何谦赶快上前解释：“周总理要到医院看望一位朋友，事先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快让进去吧！”

传达人员还是不让进，坚持要看证件。何谦有些生气，心想：“总理多忙啊，你还在这儿耽误他的时间！难道你还不认识他？”正要批评他几句，没想到周总理已经下了车，走到传达室窗口。

周总理掏出证件递进窗口，温和地说：“同志，我是周恩来，要去医院看个病人。”

传达人员一听周总理的话，看过了证件，又后悔，又紧张，赶快站起来，嗫嚅地说：“啊，实在，对不起，……”

周总理连忙和蔼地说：“同志，不怪你。你做得很对嘛。”

传达人员红着脸，惭愧地说：“太对不起，您……”

何谦嘟哝了一句：“你呀，太死板，连总理都不认识……”

离开医院的时候，何谦还有些生气。周总理对他说：“那位传达同志做得对呀！他不认识，不能怪他。”

“他也太不灵活了！”

周总理耐心地对何谦解释：“我是总理，政府的规定，我更应该遵守嘛！制度就是要大家都遵守，越是领导人越应该带头，谁也不能特殊！”

童友重逢

周总理有位表姐叫龚志如。童年时代，两人曾经在一起读书。后来，她信奉“上帝”，可是“上帝”并不爱她，从一九四八年起她就失业了。解放后，她在上海一个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

一九五二年秋天，突然来了位工作人员，用汽车把她接走，说是有位中央首长要见她。

“是谁呢？”她想：“难道是他？”

汽车停在一个院子里，她一下车，就看见周总理和邓颖超从门里走出来迎接她。她又惊喜，又窘迫，一时间竟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动了。

“志如姐，”周总理走上来搀扶她，幽默地说：“哟，你怎么比从前矮啦！”

原来，龚志如比周总理大三个月，小时候，她曾经和大鸾表弟比过高低，身量比他还高呢！四十多年以后，当年的大鸾表弟这句欢迎词，立刻使她觉得轻松了许多。

她说：“总理好，邓大姐好！”

“我们这是家庭聚会，你还叫我七弟；她比你小，叫弟妹……”

总理和邓颖超搀着她走进客厅。

总理问到姨外婆和表舅龚荫芬，问到他们晚年的遭遇和后代的情况。他们说起童年的生活，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闪过，他们像孩子一样笑着、说着，一直说到天黑。

吃晚饭了。桌上摆着四碟菜，完全是家常饭，只是为了迎接客人，加了一个炒鸡蛋。

边吃边谈。总理问表姐的工作，夸赞保育员的劳动。

“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表姐叹着气对表弟说。

“谁说没有？”表弟反驳说：“我们有十个！”表弟妹也说“是的，十个！”

“十个？”表姐不懂。

“是的，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挺不错！”

表姐惊呆了。没想到当年的大鸾表弟，今天的政府总理，还收养了这么多别人的儿女。可自己呢？这几十年走的是什么道路？

她忍不住了，向表弟倾诉自己的身世，激动地流出了泪水。她曾经反抗过旧家庭，曾经想跟着表弟走进新生活。但是她失败了，向旧社会妥协了，最后只能把解脱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

“我走错了路。”她擦了擦泪水，结束了自己的话。

周总理递给她一个削好的苹果，鼓励她：“现在不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了吗？很好嘛！人没有生而知之的。个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他已经在进步的道路上边出了第一步。”

龚志如点着头。忽然，她想起一件要紧事：“总理，我有一件事，不够忠诚老实。”

“什么事呀？说说看。”总理说。

“我隐瞒了年龄——六岁，现在怎么改呢？过去证书都是这样填的！”

总理哈哈笑着，站了起来：“那是旧社会嘛，为了吃饭嘛，改过来不就

行啦！”

龚志如这才轻松起来。总理又同她谈了许多问题。龚志如好像头一次听说这些真理，她叹口气说：“我得好好学习呀！”

“我们都得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当了总理的表弟说。

回到家里，龚志如说什么也睡不着，平生的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际闪过。有痛苦，有悔恨，有忧伤，有欢乐……最后，她在美好的遐想中进入了梦乡。

当然，如今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可在她生前，曾经好多次给人们讲述她和表弟的这段重逢的故事。

“只能在这一点上特殊”

北京市一一中学坐落在西郊圆明园废墟上。它的前身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战争岁月，许多革命干部投身火热的斗争，不少人英勇牺牲，自然顾不上自己的子女。党组织就把烈士和干部子女集中起来，办了一所学校，和部队一样过供给制的生活。解放了，学校迁到北京，自己动手修建校园，依然过着供给制生活。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两点多钟，两辆汽车开进校园，停在教室楼前。一个人走下车，环视了一下学校的建筑和周围绿油油的稻田，他的双眼在浓眉下闪着光。一个同学认出来了：“啊，周总理！周总理来了！”他高声喊起来。

喜讯立刻传遍校园，同学们朝教室楼奔去，谁不想挨周总理近一点呐？狭窄的楼道挤满了活泼的少年们。

“别挤，总理的手受过伤！”警卫员的话提醒了大家，同学们立即向后退了两步。

廷晓是个高个子同学，他望着周总理和邓妈妈，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周总理看看他，笑了，他也一笑，气氛立刻轻松活跃起来。

“廷晓是我们学生会副主席！”同学们介绍着。

周总理朝廷晓伸出手，笑着，“噢，副会长。今年多大了？”

“二十。”

“上几年级了？”

“初中三年级。”

“上学晚。”周总理沉思地说，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一个月十元钱吗？”

“是！”廷晓回答，心想，周总理了解情况多具体。

“每月还给你们钱花吗？”周总理问。

“发两元钱。”同学们说。

“衣服呢？”

“衣服也发。”

“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同学们又做了回答。

“哦，单衣两套十七元，棉衣十二元，加上伙食费，那就是说，每个月每人平均是十四五元呐！”周总理一边说，一边推开高一（二）班教室的门看了看，又回头看看同学们，提出另一个问题：

“你们这里有没有工农子弟？”

“没有。”孩子们想也不用想，马上回答。这是干部子弟学校哇。

“你们说说，和工农群众的孩子在一块好不好？”

同学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时没人回答。他们觉得周总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应该认真想想。周总理望着廷晓，廷晓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答不上来。不少人为他着急，小声议论起来。

过了一会儿，还是周总理打破了沉默，他坏视大家，提高了声音：“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一向认为，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同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你们也应该这样做。”

他抬起右手，加重了口气：

“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细心的孩子从周总理抬起的右手袖管里看到，那只受过伤的右臂上白布衬衣的袖口精心地补着一圈补丁；身上的深色外衣，已经旧了，脚上穿的是一双普通的布鞋。

“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总理问孩子们：“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胃’字吗？就是胃字出头。”

接着，周总理就给同学们讲了“八旗子弟”的故事。他们的父辈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为清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子东游西逛。后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他们毫无办法。只好投降。

“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总理说：“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

总理深情的教诲，印在孩子们脑海里，许多人至今还牢牢记着。

冒雨借书

北戴河是离北京不远的休养胜地。这里有浩瀚无边的大海，峰峦叠嶂的群山，宁静平坦的街道，舒适幽雅的屋宇。每年夏天，都有无数游人来这里同浪花戏耍，在美丽的小镇里度假。

度假自然离不开读书，所以，北戴河文化馆有一个挺不错的图书室。小王是图书室的管理员。

八月的一天，一早就下着大雨，来图书室借书的人自然不多，小王在空荡荡的图书室里隔窗望着外面的风雨。

电话铃响了。小王拿起听筒。打电话的人要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几本书，说是要研究一个问题。小王抱歉地告诉他：“这几本书按照规定不能外借，您如果需要，可以到图书室来看。对不起。”

对方只好把电话挂上。

图书室里寂静得让人感到无聊，外面的风雨是那么大。“不会有人来借书了吧？”小王想着。

忽然，图书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人带着风声雨水走进图书室。他手里的雨伞流着水，挽起的裤脚也已经湿透。他把雨伞放到墙边，微笑着向小王走夹，请求这姑娘把世界地图和几本参考书借给他看看。当小王把书捧给这位同志的时候，她的双眼吃惊地瞪圆了：

“啊，您，您是周总理！”

周总理朝她微笑地点点头。

小王的心里又后悔又难过，她喃喃地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是您要借这些书。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在大雨里跑来借书，耽误您宝贵的时间。”

“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总理笑着回答她：“有一套制度，这样很好。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情。”

周总理说完，就拿起书坐在桌边认真地查阅起来。

小王看着敬爱的总理那专心读书的身影，心潮就像外面的风雨，更像风雨中起伏的海浪。

周总理查阅过资料，站起来，同小王握手告别，勉励她说：“一定要做好图书馆的工作呀。”

周总理冒着风雨而来，又冒着风雨走去。美丽的北戴河将永远记住这件平凡的小事。

新中国的代表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升上蓝天，飞向印度尼西亚。可是刚刚飞到公海上空，突然“轰隆”一声响，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十一人，连同机组成员，都不幸牺牲了。原来，这是蒋介石特务的阴谋破坏。他们事先在飞机里安了定时炸弹，企图暗害去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总理。由于周总理先去缅甸访问，没乘这架飞机，他们的罪恶目的没有达到。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引起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愤怒。但是亚非会议还是按期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了。

四月十七日，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

“周恩来”这个名字，这个新中国的代表，仿佛是块巨大的磁石，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报道：“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

周总理率领代表团一出现，群众就兴奋激动起来，欢呼、鼓掌、握手都不能表达他们的热情，有好多次，成千成万的人情不自禁地跑到街上，跳起舞来。

有一次，下午三点钟左右，一辆飘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会场，这是周总理的汽车。顿时，街头的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从四面围过来。警察手拉手组成了警戒线，竭力维持秩序，人们还是冲过了警戒线，挤到汽车边热烈鼓掌欢呼。汽车被挡住不能前进，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感慨地在他的报道里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新中国，为亚非国家的团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王秀兰家里

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工人杨师傅的妻子王秀兰是个家属模范。她对家属工作、居民工作可热心啦，谁家有事，都愿意请她出主意，帮忙。

她一生中有件最幸福的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一个傍晚。

这天，她领着邻居的孩子回到自己家门口，只见院子里围着一群人，孩子们爬在窗口朝屋里张望。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走进院子。一看，原来是公司的负责人谷正荣正陪着一位客人来串门。“这有什么好看的，”她心想：“这些孩子们连客人串门儿也没见过！”

那客人走进屋门，又走出来，轻轻地说：“这里有夜班工人在休息呢，我们到别处去吧！”

王秀兰走过来说：“不要紧的，他是我爱人，他歇他的。快进屋吧！”

客人听了她的话，轻手轻脚地进了屋。

王秀兰推推炕上躺着的老杨师傅：“醒醒，来客人啦！”

那客人连忙摆摆手：“别惊动他，工人生产很辛苦，不能耽误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

这客人真体贴人！王秀兰抬头瞧一眼客人，愣住了，惊喜地说：“哎呀，您瞧，我光顾忙着，没认出来，您是周总理。”

“客人”笑着点头，屋里的人也轻轻笑了。

周总理坐下，轻声问：“秀兰呐，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一九五二年。”

“你爱人也是党员吗？”

“也是。”

“那是革命家庭啦。”周总理笑了。王秀兰也激动地笑了。

周总理又问：“你们有几个孩子？”

王秀兰脸上飘起一丝愁云：“唉，有两个，解放前都病死了。”

总理连忙安慰她：“不要难过。你不知道吗？我们两家一样，都没有孩子。”他指指窗外，说：“外边那些孩子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嘛！”

王秀兰不住地点头。

周总理和她聊起家常来。吃水方便不？房子够住不？平常看得上电影吗？还有什么文化活动？周总理问得详细极了，连妇女们使用的针头线脑上哪儿去买都问到了，王秀兰想：这国家的总理简直就跟咱工人一样，咱的什么难处都知道哇！

谈到双职工和三班倒职工的孩子教育问题，周总理对谷正荣说：“老谷哇，要尽快成立幼儿园，不然孩子们怎么办？不要影响职工们休息和工作，也让妇女从家庭的小门走到社会主义的大门来。”

这时候，王秀兰才忽然想起，光顾了说话连碗水也没倒，赶快给周总理倒了一杯白开水。周总理一边喝着，一边说：“秀兰呐，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哩！”

“您可别这么说，向我学什么呀。”

“听说你做了许多工作，”周总理说：“街道工作也很重要、很复杂，关系到千家万户。”

王秀兰一个劲地点头。

周总理临走的时候，嘱咐秀兰向老杨问好，还一再说：“再到北京，千

万到我家做客。”

周总理走了。王秀兰叫醒老杨师傅，告诉他刚才周总理来过。老杨一听急了，埋怨秀兰：周总理来了，自己还睡大觉，多不恭敬呀，更可惜的是自己没能和周总理说上几句知心话。他心想，总理那么体贴工人，不让妻子叫醒自己，眼里止不住地掉下泪来。

周总理回到北京，凡是有人到鞍钢去，或是有人从鞍钢来，总要问问王秀兰，托人带去他的问候。过了五六年，他还说：“听说鞍钢的王秀兰病了，一定替我问问好啊！”

这就是王秀兰觉得最幸福的事，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大家听。

同升和鞋店

同升和鞋店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别看它铺面不大，可历史挺长，是家很有名的专门经售高档产品的鞋店。

一九五六年夏季的一天，天热得出奇。同升和鞋店门前支着布遮幔，挡住的人的阳光。店里顾客不多。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位顾客，到柜台前仔细地看各种型号的鞋子。

营业员一看，哟，原来是周总理。这么大热天，他亲自到鞋店里来了，他赶紧请总理坐下。

总理笑着摆摆手，说：“你们这里没有布鞋吗？”

“这里只卖皮鞋。”

周总理看了几种样式的皮鞋，发现比较瘦，虽然式样比较好，可是……

他打着手势说：“劳动人民的脚都比较肥大，许多人喜欢穿布鞋，商业工作要很好地为他们服务。……”

营业员和商店的领导人不住地点着头。

后来，这个商店就增添了布鞋，还和做皮鞋的工人师傅们一起研究，改进了几种鞋楦子，增加了皮鞋的样式。那些适合工人们穿的、比较吧的皮鞋也生产出来了。

周总理照相

中国照相馆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

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向总理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

周总理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

那战士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在总理亲切的目光下照了相。总理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

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总理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

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

“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

总理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

“啊，真对不起！”

“没什么！”

照完相，总理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接到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这张照片，在周总理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看，周总理多么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在上海少年宫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一天，上海市少年宫舞蹈室里，传来周总理开朗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欢歌笑语。

原来，周总理正在看小朋友们跳拔萝卜舞呢！

这是个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的舞蹈。

在舞蹈室的地板上“长”着一个通红通红的大萝卜。这萝卜真大呀，长着绿油油的叶子，开着好看的花儿。噢，那萝卜花是个小姑娘的脸，瞧她胖胖的脸，大大的眼，多可爱呀！

又一个小姑娘在乐曲声中出场了。她扮演村姑（农村姑娘）。她来收获萝卜了。她的小胖手东一扒，西一扒，摇了摇头。那些萝卜太小了，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她往这边一瞅，哎呀，这是真的吗？她揉揉眼睛，真的，这萝卜真大呀！

她瞅瞅萝卜花——那个小姑娘，萝卜花也看看她，两人笑笑。村姑要拔这萝卜了。

她抓住绿叶子，弯着腰，用力地拔呀，拔，就是拔不动。

聪明的村姑回身叫来两个小伙伴：一个小村姑，一个梳朝天辫的男孩儿。他们一块儿拔，萝卜动了动，可还是不出来。

他们三人一商量，又叫来四个伙伴。

七个人站成一排，一个抱着一个的腰。最前面的拉住叶子，“一二三！”他们一齐用力，哈，萝卜找出来了，可他们也全都摔倒了。

他们笑哇，跳哇，给萝卜掸土，理叶子，最后拖着大萝卜回家去了。

周总理真喜欢这个舞蹈。他的脚轻轻地打着拍子，萝卜拔不出来，他比孩子们还着急呢！萝卜一拔出来，他哈哈大笑。周围的人全笑了。

孩子们围在周总理身边，又说又笑，周总理摸着他们的头，连声叫好，说：

“你们这个舞蹈，说明团结起来力量大。”

这件事过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上海少年宫的一位同志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周总理在人群中认出了他，拉住他问道：“你现在还在少年宫里工作吗？那里工作怎么样？”周总理想了想，忽然笑了，又风趣地问：“孩子们是不是还在排‘拔萝卜舞’呀？”

周总理真喜欢这个舞蹈呢！

在肥光小学

安徽省肥西县肥光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们正在上课，教室的门忽然被轻轻推开了。孩子们都朝屋门看去。一位客人走进教室。这是谁呀？这么面熟，瞧他笑得多亲切，多慈祥！哎呀，这是周总理呀！是他，跟相片上的他一模一样！孩子们“刷”地一下全站起来了，用力地鼓起掌来。

周总理和正在上课的王老师握手，还跟同学们一样，问：“老师好！”王老师觉得幸福极了。

周总理又笑着摇着双手，让小朋友们坐下。小朋友们还是一个劲地鼓掌，谁也不坐。周总理对王老师说：“请老师下个命令，让同学们坐下来吧！”

王老师让同学们坐好，教室里安静下来。周总理点点头说：“学生听老师的话，很好。”周总理关心地问了好多学校的情况，从学习一直问到学生的生产劳动。

走出三年级教室，周总理又来到二年级的教室。同学们又跳起来鼓掌欢迎他。周总理笑着说：“小朋友们好，请坐下。”同学们还是不肯坐下。陪同周总理来的同志说：“学生还是听老师的话，请老师下命令吧。”

“对对，还是请老师下命令。”周总理点着头。

同学们都坐好了。周总理拿起一本语文书递给第一排的杨善芝小朋友，让她念念书上的生字表，还弯下腰，侧过头仔细地听着，看她念得对不对。周总理又翻开算术课本，让张世贵小朋友答一道应用题……

周总理到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遍了校园。一下课，同学们就围在周总理的身边，孩子们的笑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周总理要走了，同学们依依不舍地一直送到公路上，汽车边。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们要和总理照个相！”这正合孩子们的心意，大家一齐喊起来。周总理立刻转回来，愉快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同学们在公路的斜坡上排好队，周总理站在孩子们中间，记者同志举起照相机“咔嚓”一下，拍下了这珍贵的照片。

笑容满面的周总理，永远站莅孩子们中间。

快乐的游园会

一九五八年。有一天，北京市少年宫在景山公园举行游园会。

孩子们在美丽的公园里玩得愉快极了。忽然，一个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吹遍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激动了孩子们的心：“周总理也来和咱们一起游园了！”

他在哪儿呢？谁都想最先看到他。

有五个小朋友首先看到周总理。他正站在高高的景山上，在万春亭边，指点着山下的少年宫同少年宫负责人谈话呢！五个小朋友像小羚羊似地飞跑上山。周总理看到他们，也快步走下山来迎接。他们相会在半山腰，孩子们喘着气，笑眯眯地望着总理的笑脸，把小胖手伸到总理温暖的大手里。总理问他们的名字，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还在一棵白皮松下，和他们一起照相。

更多的孩子们看见周总理了。他们节目也顾不上看，游戏也顾不上玩，把周总理紧紧地围起来。

周总理一边和他们打招呼，一边劝他们继续参加游园活动。他自己也走到游艺室去看“钓鱼”。

这可不是真的在水里钓鱼，而是在屋里钓玩具鱼。几个小朋友手拿长竹竿，竹竿上拴着钓丝、鱼钩，要用鱼钩钩住玩具鱼的嘴还真得费点事呢，一点儿也不比钓真鱼容易。有的人看别人钓鱼比自己去钓还着急，一个劲儿给人家出主意。

周总理来了，站在孩子们身后，兴致勃勃地看着。孩子们发现了，就请总理也来钓。周总理接过鱼竿，甩出钓丝、鱼钩，眼看要钩住鱼嘴了，手一晃，又脱钩了。总理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礼堂里正演皮影戏。戏里的人都是用皮子剪刻的，由人操纵它们活动，然后用灯光把它们的影子照射到屏幕上，挺好看的，跟电影差不多，就是不用电影放映机。

周总理来了，他挤在孩子们中间，仔细地看皮影戏，戏里的人一扭一摆，说话尖声细气的，逗得周总理和孩子们一起哈哈大笑。

那天，总理看了好多地方，对少年宫的工作提了好多建议，才和孩子们告别。

普通劳动者

北京郊区有座十三陵水库，一汪碧水像蓝宝石一样镶嵌在群山之中。这个水库是人们用义务劳动修成的。周总理也来参加过两次呢！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用总理陪同毛主席、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劳动，一直到下午六点钟，才乘车回去。

第二次，周总理领队，率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同志五百多人，顶着烈日，踏着烫脚的沙粒来到工地。周总理高举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

工地负责人赶快迎上去，说：“我们欢迎首长们……”话没说完，周总理立刻认真地纠正他：“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都听你的指挥。”

劳动开始了。几十辆小推车跑起来，周总理和大家一起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水库大坝准备石料，往小车里搬石头。

总理弯下腰，一块一块地搬着。他的右臂受过伤，不能完全伸直，搬石头要左手使劲，遇到大石头，就得完全俯下身子，把石头抱起来。推车的同志看他累得满脸大汗，故意把空车慢慢地推回来，让他多歇一会。总理马上“抗议”：“快点吧，我们要窝工了！”

他装完这辆装那辆，人们稍不注意，他又抢着推独轮车。看他敞开衣襟，满脸汗水，推着独轮车走在不到一尺宽的木板道上，走得真稳呢……

后来，总理又和大家一起传递石头。他乐呵呵地把大石头称作“西瓜”，把小石头称作“香瓜”。传递石块的长龙里，一会儿传来：“嘿，来了个小香瓜！”“嘿，又来了个西瓜！”有的同志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将小块的传给总理，他接到手就提意见：“加快速度！来个大的！”数不清的大小石块，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很快像小山一样堆起来。

周总理的手被石块碰破，出血了。大家劝他去包扎一下，休息休息，他笑着说：“轻伤不下火线嘛！”

休息了。一队年轻人欢迎周总理带领的这支“老头儿”队唱歌。

“唱歌？”有人说：“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老了，不行啦！”

周总理站起来笑眯眯地说：“只是前二十年能唱，后二十年就不能唱？拿出延安精神来，唱一个！”

周总理挥起双臂指挥，愉快的歌声响彻工地。

下工了。周总理和大家同吃一个食堂的大锅菜（午餐是在工地上，同大家一起吃口干粮就一口咸菜，喝一口开水），和大家在一个几十米见方的浴池里洗澡，睡在同样简陋的平房里，一点也不特殊。唯一特殊的是，别的房间都熄了灯，他的屋里还亮着灯火，劳动一天以后，他还要坐在硬板椅上批阅文件。

周总理就这样和水库的建设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度过了一个多星期。

“不，没有我的份！”

一九五八年夏天，黄河中游连降大雨，洪水暴涨，浪涛像凶猛的野兽扑向郑州黄河大桥。七月十七日晚上，十一号桥墩被洪水冲走了。南北铁路交通立刻中断了！黄河两岸人民和铁路职工立刻投入了抢修大桥的斗争。

第二天下午，一架飞机沿着黄河低空飞来，在浊浪滔滔的黄河上空盘旋着，盘旋着。飞机里坐着谁呀？啊，是周总理视察来了。

飞机在郑州降落。周总理立即召开抢修黄河大桥的紧急会议。晚上十点开完会，周总理又登上列车前往黄河南岸的车站，视察抢修工地现场。

晚十一点半，周总理下车走进大桥局一处的大院。

消息立刻传遍了工地，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的修桥工人都涌进了大院，谁不想看看周总理呀。

周总理同刘鸿钧工程师站在院里谈修桥的问题。人们越聚越多，周总理看看大家，笑着招招手：“同志们，到前边来！你们睡觉了没有？”大家说：“没有！”周总理称赞说：“你们都是水上英雄。”

这天深夜，就在这个大院里，周总理又召开了有工人参加的抢修大桥的施工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大家笑着挥挥手说：“请大家发表意见。”

人们一时都愣住了。原来大家都等着他讲话呢，可是周总理却一定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还是肖传仁工程师“勇敢”，他头一个发言说：“我们最热烈地欢迎周总理！”周总理摆着手说：“我们都是自己人嘛，不要欢迎，还是开门见山吧！”

肖工程师说了自己的意见：从两头同时打铁轨桩推进抢修。周总理仔细地听着，不时地插话问一些问题。肖工程师讲完了，总理马上问大家：“你们都是搞桥的，有经验，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周总理一边听，一边记下来。

下雨了，有位同志怕把总理淋病了，赶紧取来一把伞打开给总理遮雨。周总理推开伞说：“不要，不要！你看大家不都在淋雨吗？”

雨越下越紧，周总理穿的那件浅蓝色短袖衬衫已经湿透了，可是他依然专心致志地听着大家的意见，还向大家讲了话。雨声中不断爆发出掌声和笑声。

周总理说：“修桥依靠大家，要同暴风雨和洪水作斗争，要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工农兵一齐干，尽快修复黄河大桥，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们！”他指指正在落着的雨说：“现在就是一个小考验！”大家都笑了。

修桥工人们保证十天内修复大桥，周总理高兴地说：“好，两个星期以后我再来看你们，参加你们的通车庆功会。”

深夜两点，他回到列车上，继续听取根治黄河的汇报。凌晨三点钟，他的车厢还亮着灯光，他正在反复思考黄河的事情。

周总理的视察，给了全体修桥工人巨大的鼓舞，他们日夜奋战，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修好了大桥，八月一日通车了。

八月五日下午，周总理又来到大桥。正在高空作业的通讯工李大楞看见周总理，摘下安全帽朝总理摇着，大声地喊：“总理来了！”

周总理仰起头，望着李大楞：“同志们辛苦了！”

“不累，干得正欢哩！”小李说。

周总理笑了，指着小李说：“注意，挂好安全带，小伙子。”

“嗯嗯。”小李点着头，又开始工作了。

周总理走上大桥，同遇到的每一个工人握手、问好，又踏着窄窄的便梯下到大桥钢梁底层去察看。他摸着修好的桥梁向周围的工人们说：“修的真不简单，谢谢你们！”

他回到桥面，步行到黄河北岸，观看了工程兵表演架设浮桥。他同每一个人打招呼，谈话。称赞大家的干劲。

接着，他又回到那天冒雨开会的大院，在炎热的太阳下向工人们讲话。从黄河泛滥的历史，讲到根治黄河的计划，他那渊博的知识，生动的话语，使大家都听入了迷，忘记了疲劳。

讲完话，总理坐在地上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不断地提醒身边的工人：“要吃饱啊，你年轻力壮的，要多吃才行。”

饭后，就在原地召开抢修大桥的汇报会，人们坐了个半圆形。

大家说，这次抢修胜利是毛主席正确领导、周总理现场直接指导的结果，周总理连连摆着手：“不，没有我的份，这全靠你们喽！靠全国人民的支持！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五路公共汽车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十点多钟，北京市一辆五路公共汽车由首站发车。车到天桥剧场，上来了许多乘客——大概剧场刚散场。

售票员一面售票，一面照顾乘客，车前车后地忙着。一位刚上车的乘客主动买票：“同志，买两张，到北海。”

售票员递过两张九分钱的车票，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容：宽额头，浓浓的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脸亲切的微笑。“啊，周总理！”售票员不禁喊出口来。整个车厢沸腾起来，人们一齐朝这边看，互相传告着：“周总理，周总理！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坐车呢！”

周总理慈祥地微笑着，向大家点头，又轻声问售票员：“小同志，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吧？”

售票员说：“不累！”还没讲完，乘客们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了周总理。

售票员马上走到司机同志身后，悄悄告诉他：“师傅，周总理在咱们车上。”

司机听后，一股幸福的暖流从心头涌起。他多么想回头看看总理呀！不，现在不能看。他两手紧握方向盘，眼神更加集中，极力使汽车开得又快又稳。周总理仿佛懂得司机的心情，悄悄走到他的背后，手搭在扶手杠上，注视着司机的操作。司机从驾驶室反光镜里看见了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心情非常激动，他想：总理在检查我的工作呀！车到北海站，售票员跳下车去，伸出双手搀扶周总理。周总理健步走下车，握握售票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又向司机招招手。

车开走了，人们看见周总理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秋风中走上人行道，走向中南海。

“啊，他多忙多累呀，还要和我们一道乘公共汽车！”人们在车里议论着。

“这不是第一次了。”有人说：“一九五四年冬天，他老人家坐公共汽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呢！”

原来，那次周总理为了了解职工乘车的情况，特地在傍晚下班乘客最拥挤的时候，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车，下了公共汽车又上有轨电车，在市区绕了大半个圈子。当时，车里人多，很拥挤，大家纷纷起来给总理让座，周总理客气地请大家坐下，自己一直站着，和身边的乘客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生活怎样，上下班在路上需要多少时间。大家都非常感动，说：“您工作那么忙，还和我们一样坐公共汽车，我们太过意不去呀！”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事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市内交通问题，增加了汽车线路，十字路口设立“安全岛”，职工上下班乘车更方便了。

车上的乘客知道了这些情况，心里更加激动，想到周总理刚才就在自己身边，觉得一股暖流涌满胸膛。

幸福泉

这事情发生在广东省从化温泉。

一九五八年底，周总理到这里休假。他太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唉，他哪里歇得住哇，“休假”十几天，他走遍了从化的农村、商店、学校和托儿所。

有一天，周总理和邓颖超步行来到温泉大队，视察了许多地方，还看了托儿所。

那时候，托儿所开办不久，暂时借的一个地方，设备比较简陋。

孩子们看见周总理来了，像群小鸟似地围住他，噘噘喳喳地又问好，又答话，没完没了。周总理拉住他们的小手，一个劲儿夸他们懂礼貌。

周总理到托儿所的厨房看了看，厨师正在做晚饭。

“孩子们一天吃几顿饭？”他问：“都吃些什么？”说着，用汤匙舀了一点孩子们的饭放到嘴里，品尝着：“唔唔，菜要再切细一点，让孩子们好咀嚼，好消化。”他嘱咐着。

厨师点点头：“放心吧，总理！”

周总理看过了厨房，又问到洗澡房：“孩子们有洗澡的地方吗？”

工作人员有些尴尬：“洗澡房眼下还没造。”

“那，老百姓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总理又问。

“有人在塘边用温泉水洗，有人把水提回家洗。”工作人员说。

总理听了，严肃起来：“一定要建些房子给群众和孩子们洗澡用。使老百姓都能很方便地用上温泉水！”

离开温泉以后，总理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他一再提出建议，还和邓颖超同志一起带头，各拿出一百元人民币，作为修建的费用。

“你们在温泉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国家领导人住，他们随时都可以用上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却很不容易用上温泉水洗澡，我和小超（邓颖超）都感到不安！”他对广东的同志们说。

他回到北京后，又派人来帮助解决修建浴室和幼儿园的问题。

在他的关怀下，幼儿园和浴室很快建成了。新建的幼儿园有课室、活动室、卧室、厨房，浴室有十八个房间，其中两间是专为孩子们设计建造的。

现在，群众在那里洗澡，消除疲劳。孩子们在温泉里嬉戏。大家说：这是周总理引来的幸福泉呐！

食堂里的笑声

“周总理来了！”

这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天津南开大学。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到南开大学来参观了。

午饭已经开过了。食堂里，炊事员正在议论这个消息，想不到周总理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微笑地向大家点头致意。

“你们的工作很忙吧？又在做下顿饭了？”说着，总理走进了厨房。

总理走到菜桶边，俯身望着：“中午的菜没有卖完？多少钱一份？”

炊事员说：“这是萝卜，五分钱。”

总理走到另一个菜桶旁边，问：“这个呢？”

“小白菜粉条，也是五分。”

总理看到笼屉里还有窝窝头（玉米面做的干粮），走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

“两分。”

“我买两个。”总理说着拿了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食堂中找了一个座位，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他招呼着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们：“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

炊事员急坏了。周总理这么忙，这么累，回到母校来参观，让他吃惊窝窝头、剩菜？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买一盘五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

炊事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给总理吃。周总理说：“哈哈，我就是喜欢吃萝卜。”说着大口地吃起来。食堂里一片愉快的笑声。

吃完饭，总理走进厨房，和炊事员一一握手道谢，亲切他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哇！”

他走了，炊事员们还反复地吟味着他这句话。

欢乐的泼水节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凤凰花开了，欢乐的象脚鼓敲响了，一个喜讯传遍了澜沧江两岸：周总理陪同外宾来这里欢度泼水节了。

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节日。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凶恶的山妖，不让人们种田、打猎，年年给人们降下灾祸和不幸。有三个美丽的傣族姑娘勇敢地走进山林，用柴刀同山妖搏斗。她们九死一生，终于杀死了山妖，她们的衣裙也被山妖的污血溅脏。除掉山妖的喜讯，召唤来大批乡亲，他们聚在寨前欢迎凯旋的姑娘，一盆盆清水向她们身上泼去，冲洗她们的衣裙，共庆胜利。这个故事流传至今，互相泼水就成了为亲人除灾免祸，迎接幸福和纯洁的欢乐仪式了。

那天早晨，周总理来到澜沧江边，一条条龙船飞驶过江面，一只只高升（升空爆响的花炮）炸响窜入空中。总理上身穿着对襟布扣的白衣衫，下身穿一条大腰身咖啡色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的包头布。这身地地道道的傣家服装，更激起了傣族群众的欢欣：“周总理和咱傣家心连心呐！”“周总理好！周总理好！”无数人向他伸出手去，向他问候。

周总理来到曼厅寨，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同人们一起在荔枝树下跳舞。

泼水开始了。周总理走到群众中去，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水，向群众泼洒，给人民祝福。群众也向他泼洒清水，祝愿他健康长寿。傣族的习惯，越是亲人和敬爱的人，越要多多向他泼水。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水碗，端来水盆，一边欢呼着，一面向总理泼水。清清的水呀，像是群众的心意、飞向周总理。

那时候，总理已经六十多岁了，警卫员怕总理受凉，赶忙撑起雨伞保护他。总理说：“不要紧的，快把伞收起来，到群众中去！”说着，也放下银碗，端起脸盆，把一盆盆溶合着深情和祝愿的清水泼向各族群众。

人们笑哇，喊呐，脸上是清水还是喜泪？看那一盆盆清水像滋润心田的春雨，洒向人间。一朵朵水花在空中飞舞，细小的水珠，在阳光下闪耀，组成一道道彩虹，把领袖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哦，多欢乐的泼水节呀，谁能忘记？

老周和二廷

河北省武安县伯延村有个老贫农张二廷。他虽然受了一辈子苦，却是个敢说敢做，从来不知道发愁的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周总理来到伯延村，住了六天。杏树园，庄稼地，村村户户，周总理走了个遍。从生产到群众生活，他都作了详细调查。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农民能吃上顿玉米糊糊，就算满不错了。周总理这六天，顿顿和群众一起吃大锅饭（那时候，农村还在办食堂），群众的疾苦全都看到，记下了。

有一天开座谈会，张二廷参加了。他是个心直口快的诚实人，有什么说什么。村里的工作，党的农村政策，他觉着哪点儿不好，就直接说出来。

周总理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咱们党历来提倡实事求是嘛！

座谈会开完了，周总理到张二廷家串门。一进院门，周总理就像招呼老朋友一样，大声问：“二廷，二廷，在哪屋住呀？”

张二廷一听：“哟，这不是周总理嘛！叫我的名儿就跟叫他的兄弟一样。”他赶紧跑到院当中，笑得眉毛眼睛挤到一块儿：“快，周总理，快到屋里坐。”

“哎，以后别叫我总理，”周总理说：“叫我老周就行啦。”

“那哪成，那哪成！”

“成！”周总理笑着说。二廷也笑了。

两人手拉手进了屋，坐在炕沿上，聊起了家常。“老周”和二廷聊得挺对心思，二廷也觉得可找到了一个说知心话儿的朋友，两人一直谈到很晚，还觉得没有谈够。

第二天上午，老周又一个人来了。推开二廷家屋门，亲亲热热地叫着：“二廷，二廷啊！”没人应声，进屋一看，二廷穿着衣裳在炕上睡觉呢。

老周轻轻地拍拍二廷的腿：“二廷，二廷，醒醒，累了吧？”

二廷迷迷糊糊地睁睁眼，一看：“哟，总，哦老周，你呀！”

老周说：“今天下午还开会，你准备参加，我给你送个通知。”说完就要走。

“哎哎，您再坐会儿，坐会儿嘛！”二廷说。

老周回过身来：“我不多打搅你了，休息吧！”说完，走了。

周总理喜欢这个诚实人，二廷喜欢这贴心的老周。几天里，两人常常聊天。

有一回，老周又上二廷家串门儿，知道了二廷头年才没了妻子，快五十的人，拉扯四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参加集体劳动，日子过得艰难。他心里挺难过，就跟二廷商量：

“二廷啊，四个孩子你都管有困难。要是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吧，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

二廷说：“咋不行！好是好哇，可你太忙啊，光国家大事就够你操劳的。瞧你这几天没明没夜地干，比我们做庄稼活儿还累呐，我可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老周要走了，最后一次去看望二廷。二廷眼圈儿里闪着泪花花，不住地说：“老周哇，得空儿就回伯延看看，啊？”

老周说：“有机会我一定来，如果我来不了，也一定打发个人来看看你。”从那以后，一年、二年、三年，一连五年，年年都有人从北京中南海老

周那儿来，来看望伯延村的张二廷。

第六年呢？唉，那不是“文化大革命”了嘛，周总理已经没法再派人来看他了。

张二廷呢，老是朝北望着，念叨着老周，祝愿这位贴心的朋友一切都好，都顺当。

小桂花

小桂花住在周家湾。周家湾在从庐山（江西省九江地区）到南昌的公路上，是个三岔路口。

小桂花是个挺有本事的放牛娃，多调皮的老牛都听她的话。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小桂花在家里帮大人舂完米，在门口玩耍。

太阳快要当头了，公路上开来几辆小汽车。小汽车开到她身边忽然停下来，从车里走出几位老伯伯。有一位老伯伯走到她身边，亲切地问她：“小朋友，到观音桥怎么走？”

小桂花抬头望着这位老伯伯，不由得一愣，好熟的面孔，哎，这不是周总理吗？

“小姑娘，你带我们到观音桥去好吗？”

“好！”小桂花还一直望着这位拉着她手的老伯伯。他是不是周总理？

“小姑娘，是周总理拉着你的手呢！”另一位老伯伯说。

“周总理，您真是周总理！”小桂花高兴地跳起来。

周总理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小桂花。”

“多大了？”

“十三岁。”

“读书了吗？”

“读过两年。”

“现在在家里干什么？”

“放牛。”

“啊，放黄牛，还是放水牛呢？”周总理笑着说：“要是放水牛，那你可以骑在牛背上罗！”

“不，我是放黄牛，骑不得，会摔下来的。”小桂花一本正经地说。

一路上，小桂花拉着周总理的手，说这说那，小嘴一直不停。

观音桥到了。周总理指指一座古庙：“咱们在这庙边上休息休息吧。”他拿起湿毛巾给小桂花擦擦手，递给她一个大苹果。小桂花吃着周总理送给她的苹果，心里可美啦。

等她吃完苹果，周总理又说：“咱们照张相吧，小桂花。”说着，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瞧，幸福的小桂花笑得甜甜，她还打着赤脚呢！

在回来的路上，周总理对小桂花说：“小桂花呀，我到你家去看看好吗？”

“好，好得很，我家就在前面！”小桂花快活得差点儿没唱起歌来。

周总理到了桂花家，见了桂花的爸爸

“老同志，小桂花给我们带路，耽误了她吃饭。”周总理说着，拿出糖果和饼干：“这点糖果就送给她吃吧。”

“爸爸，这是周总理呀！”小桂花说。

“谁？”桂花的爸爸拿着糖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周总理？那，快请坐，请坐！”急忙倒了一碗茶。

周总理坐下，端过这农家的粗瓷碗，喝着茶，和这位农民聊起来：“老人家姓什么呀？”

“姓周。”

周总理笑了：“你姓周，我也姓周，那我是到了家里啦！”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小桂花靠在周总理怀里，听他和爸爸谈家常。春耕、夏种、秋收，衣食住行，谈得多好哟！

桂花爸一抬头，哟，天已过午了，这才想起该给总理做午饭啦。总理笑着摆摆手：“今天不吃了，我还有事。等你家明年杀猪，我来吃肉！”

小桂花和爸爸一直把总理送到公路上。总理回头朝他们招招手：“等你们日子过红火了，一定再来你们家作客。”

困难的日子过去了。一九六三年春节，桂花家杀了一口大肥猪。她站在门口朝公路望着，望着，盼望总理到她家来和她一起过年，一起吃肉。

“我也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天晚上，周总理用了整整一个晚上，阅读了雷锋的日记和有关雷锋事迹的材料，写了下面的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有一次，他对一位医务人员说：“你们青年要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也要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位医务人员想：您日夜为国家操劳，您的工作已远远超过雷锋多少倍了。她怀着敬佩的心情说：“您已经学得很好了。”

“这是停止的论点。”总理笑着说：“怎么能说我学得不错了呢？不只是你们青年人，全党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虽然不能像雷锋同志那样推那么多的土，但是我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加倍地为党工作，为社会主义增砖添瓦。我们都要加倍地工作！”

雷锋是解放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但是他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品德。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总理身体力行地向雷锋学习，这说明了他自己的谦虚。

“为人民服务到底！”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一位穿着不太合体但却笔挺笔挺的西装的客人，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这是谁呀？他就是小时候教周总理做鸽哨的表哥万叙生。

万叙生这身衣服是东奔西跑借来的。他想，自己的表弟当了总理，接见的都是大人物，自己不能穿得太寒酸，要不会给表弟丢脸的。他好不容易借到这么一身西装，整齐倒是整齐，就是小了点。凑合着吧，这可是高级衣服呢！

谁知见到自己那位当了总理的表弟，就被他开了个玩笑：“哦，你可是个‘上宾’啊，打扮得像个阔老爷了！”

万叙生一听，再看看表弟那身朴素、略显破旧的制服，不由得红了脸。

表弟非常体贴表哥的心情，赶紧说：“坐下坐下，以后可别这样了。到我这儿，就像到家里一样，兄弟们叙谈叙谈，可别讲客套哇。”

中午，表弟招待表哥一顿炸酱面。两人边吃边谈。

表弟问：“你还记得教我做鸽子哨的事吗？”

表哥一听，眼前坐着的国家总理顿时成为自己少年时代喜爱的表弟，立刻笑着说：“记得记得，你做得可真好哇！”

两人从童年一直谈到今天，表哥讲了自己坎坷的一生，觉得自己受尽煎熬，现在解放了，打算过个安闲的晚年。

总理听着，递给他一个削好的苹果，说：“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事，好，是爱国的；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你怎么能不想干工作呢？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下月二十五日，准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劳动光荣啊！有的劳动模范比你年龄大得多啊！按你的年龄，还可以为人民干十五年！”他伸出五个手指头，翻了两次。

万叙生听着，心想，这位表弟真行，目光心胸就是远大。

“那，我能干些什么事呢？”他问。

“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

万叙生回到他居住的扬州市，按照表弟的话参加了街道居民工作，下决心一定干上十五年。

他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被选为居民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陪审员，银行协助储蓄员，税务所协助税务员，红十字会的办事员，一切有益于群众的事他都热心地去干。

一九五四年，扬州发大水，他涉水查看每一栋危险房屋，动员居民迁出；他把自己全部生活补助费赠给一位姓齐的居民，让他治好脚病。

一九六三年，扬州一家药房错把滴滴涕粉剂当小苏打卖给了居民。七十一岁的万叙生深夜得到消息，便连夜访问了八十多个家庭，说明情况，避免了事故，居民们非常感动。报上也介绍了他的事迹。

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天，扬州大雪，万叙生老人清晨起来，照例为大家扫雪，突然心肌梗塞，昏倒在雪地里。

他在医院一苏醒过来，就挣扎着给自己的表弟写了一封信：

翔宇表弟：

……叙生碌碌如常，毫无进展，所幸在为人民服务工作方面，未敢懈怠延误，也未犯过错误，所做工作均得各方面满意。至为遗憾的是，你要我为人民服务十五年，我才工作了十三年……

这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老人，就这样带着一种惋惜之情离开了人间。

扬州市政府，为这位模范老人举行了追悼会。

周总理给扬州市公安局寄来一信，并邮来人民币一百五十元。信上说：万叙生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是应该的。追悼会如果花了钱，就用这一百五十元作补偿；如果没花钱，可转给他的亲属使用。

这就是周总理和他表哥的故事，一个老人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为人民服务到底。

孤儿不孤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天，十七岁的周同山和他的弟弟妹妹，兄妹五人，接到了一张烫着金字的请帖，这是国务院给他们的，请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外宾和外国小朋友的联欢会。同院的叔叔、阿姨们都为他们高兴，急忙帮他们梳头、洗脸、换新衣，送他们上了来接他们的汽车。

他们是什么人呢？干嘛这样的大会要请他们去呢？

他们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啊！

同山的爸爸，解放前拉人力车，妈妈拣破烂，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解放了，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谁知这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爸爸妈妈先后离开他们，去世了。他们兄妹五人一下成了孤儿。大哥同山十五岁，最小的同义才三岁。同院的邻居，街道上的大叔大婶，还有许多不认识他们的人，都伸出手来帮助他们。“孤儿不孤”，这是新社会给他们的温暖呐！可他们没想到，周总理也在关怀他们，还给他们送来了这张请帖。

他们走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位头发灰白，穿着一身朴素的灰衣服的老奶奶，笑着朝他们走过来。这是邓颖超同志啊！她拉过这个来瞧瞧，又亲亲那个，把最小的同义抱在怀里。小同义一个劲儿亲热地叫着：“邓奶奶！”

邓奶奶不住地问他们：“你们生活怎么样？有困难没有？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周总理要我问你们好！”孩子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里含着泪，只是笑。还是小弟弟同义不认生，他靠在邓奶奶怀里说：“奶奶，幼儿园可好了，净做肉包子吃。”一句话把邓奶奶和哥哥姐姐们都逗笑了。

联欢会上，邓颖超同志把他们小兄妹介绍给全体外宾和小朋友，大家向他们鼓掌，请他们讲自己的生活。联欢会快结束的时候，邓奶奶来同他们话别，一再嘱咐他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啊！”孩子们望着她，含着泪不住点头。心想：“她就是我们的亲奶奶！”

一九六五年春节，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周总理又请来照顾他们兄妹生活的邻居田大婶。周总理握着田大婶的手，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他们现在怎么样？老大当兵了？在哪个部队？”

田大婶不住地点头，说：“挺好，挺好，总理放心！”

现在，兄妹五人都长大了，走上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岗位。

冒着余震的危险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田地裂缝翻沙。严重的灾情牵动着周总理的心，三月九日，总理乘直升飞机到灾区视察。

直升飞机飞临重灾区隆尧县上空。机组同志想让周总理看看灾区全貌，在空中盘旋着。周总理焦急地说：“唉，你们不了解我的心情。我是来看灾区人民的，你们老是在天上转什么呀！”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周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人们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周总理也含着热泪同大家一齐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当天晚上，周总理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突然，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直落，这是五级以上的余震。同志们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

周总理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

就在这震裂了墙壁的楼房里，周总理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钟才离去。

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站在一个木箱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最后他领着群众高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讲完话，他挨家挨户慰问，在断墙残壁中，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

在一堆碎砖烂瓦前，他抱起一个小女孩，对村干部说：“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要很好地照顾。一定要带好娃娃。”

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又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周总理又亲自来灾区慰问。

四月一日，周总理到了宁普县东汪村，走遍了每一个帐篷，握遍了一百四十多名伤病员的手。他蹲在老贫农贺全胜身边，撩起他的褥子，看铺得厚实不厚实；又轻轻掀起他的被子，查看他的伤情。贺全胜激动地说：“总理呀，解放军把我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来看望我们。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

周总理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离了东汪村，又到何家寨。那天正刮着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人们朝总理身边涌过来激动地说：“俺们受了灾，把您老人家惊动来了。”周总理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

周总理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叮嘱不要挤着娃娃，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为了能够看到每个干部和群众，周总理就站在一个装救济物资的小木箱上，和大家讲话。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在水面上的灰尘，喝几口灾区的水。他从早忙到晚，人们劝了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不忙。”从早晨五点到晚上九点，我们的周总理呀，一口饭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他走了两个县四个地方，讲话累得嗓子都哑了。

晚上，他到了一个驻军营房前，同志们恳求他到城里去用饭，他说：“不必了，和战士们一起吃就行了嘛！”

那天，他和战士们一起，吃了他全天唯一的一顿饭：战士们吃的家常烙

饼炒白菜。

野菜饭

困难时期过去了，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可是有一回，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抢”了一顿野菜饭吃。

那是他们在外地开会的时候。

有一天，警卫员们利用休息时间在山上采了一篮苦苦菜。

中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开完会走进饭厅，突然闻到一股野菜味。

“唔，真香啊！”陈副总理说。

“走，看看去！”周总理站起来就要走。

这下可把服务员急坏了，连忙拦住：“总理，您快吃饭吧，饭菜都凉了。”

“别忙，别忙！”他俩朝厨房走去。

厨房里，热气腾腾的一盆野菜刚出锅，警卫员们正要“消灭”它，忽然见到他俩来了，连忙用身子把那盆野菜遮住。

“你们在干什么？”周总理问。

“没什么……总理，您吃饭去吧！”

“没什么？”周总理轻轻地拨拉开警卫员：“哈，苦苦菜！好家伙，你们把好东西藏起来，不给我们吃！”

陈毅用四川话接上去：“真太自私罗！”大家都笑起来。

“总理，您，年纪大……”一位警卫员说。

“噢，年纪大就不能吃了？那么是你们年轻人吃的罗！是不是？你们说说，为什么吃？”

“向革命前辈学习，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噢，这么说我和陈老总就不要革命传统，不要艰苦奋斗的作风了，啊？哈哈！”周总理眼睛朝陈老总一瞥，哈哈地笑着说。大家也跟着笑了。

“好了，给我们来两碗吧！”

警卫员们互相瞅瞅，谁也不肯递过碗去。

“好！”周总理从炊事员手中把勺子抢过去：“你们不给我吃，嘿，那谁也别想吃！”

炊事员只好递过两只碗。警卫员们还是不大乐意。

周总理接过碗，看看警卫员们：“这就对了！”说着，就盛了满满一碗苦苦菜。

陈老总怕总理吃得太多，不太好消化，连忙伸过筷子从他碗里拨去一半。

周总理说：“你怎么抢我的？盆里多着呢！”说着，又把碗加得满满的。

陈老总笑着说：“您呀，您一个人一大碗，别人都没有了，您也太自私了！”

“哈！”大家又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

周总理和陈老总大口大口地吃着苦苦菜，吃得香甜极了。

“周伯伯教我们学说话”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的校园里驶进几辆汽车，原来是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参观了。

聋哑孩子们高兴地跳啊，笑啊，摇着花束、彩旗，不住地打着手势，还有的用僵直的声音尽量地喊着：“周总理，周总理！”

周总理来到手语教学班。这里的孩子一句话也不会说，可是他们的眼睛在说话呀，在表达自己的敬爱和激动啊，瞧他们一个个眼里含着泪，不住地使劲鼓掌。

老师用手语教算术的加减法，小朋友们算得很认真，三位同学到黑板前演算，都算得很对。周总理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赏，孩子们都欢快地无声地笑了。

周总理来到针灸治疗班。这里在用长长的银针为孩子们治疗聋哑。他一边看着医生治疗，一边关切地看着孩子的脸。他拉住一位刚扎完针的小姑娘的手，问她：“扎针疼不疼？”

她抬起头，眼里滚着泪水，努力地说着：“不疼！”

在发音训练班。这里都是经过针灸治疗会说一些简单字句的学生。黑板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老师指着黑板，学生们齐声朗读。

周总理听着，忽然站起来，走上讲台，拿起教鞭。

“啊，周伯伯要亲自教我们说话了！”聋哑孩子们激动极了。他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注视着周总理慈祥的脸，注视着他的嘴，向他学习发音的口形。

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学生们一字一句地重复，整齐、准确。

周总理高兴地放下教鞭，向孩子们鼓起掌来，夸奖他们读得正确，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祝愿他们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会说话。孩子们也鼓起掌来，拍呀，拍呀，要把自己对周伯伯的感激之情，全部表达出来。

参观完了。学会了几支歌曲的聋哑儿童要给周总理和外宾唱歌，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

校园里，响起了聋哑儿童还不太悠扬的歌声，周总理用脚尖轻轻踏着拍子，为他们击节，指挥他们唱歌。

让这歌声飞吧，飞到蓝天里，飞到大地上……

“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过去，在江苏省淮安县周总理旧居的院墙上，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们知道，周总理的故乡在淮安。家乡的人民和全国各地的出差者、旅游者，经过淮安，都想看看敬爱的周总理的诞生地，想看看他住过的房屋，表达一下自己对总理的倾慕之情。他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打听：“周总理的故居在哪里呀？”于是，总理的旧居前总是有人来来往往。

“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也请邻居们不要往外说。”解放初期周总理就这样告诉过自己的亲属。以后，他又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让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人民群众太爱戴他了，还是不断地前来参观。周总理对他的亲属说：“把房子拆掉，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

可是当地政府和群众不愿意这样做。只是把总理出生和居住过的东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两边宅院，搬进了居民。院墙上钉上了这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

来参观这所房子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看到这块牌子，都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

周总理知道了这情况，心中很不安。多年来，他希望自己的旧居“不留痕迹”，可是参观者却有增无减。这样下去怎么成呢？没办法，他只好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办公厅向淮安县委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

- 一、不要让人去参观；
- 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
- 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根据总理的指示，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天晚上向国务院办公厅作了汇报。

十一月三十日晚，国务院办公厅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的三点决定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五天以后，又来电话，询问对“三条”执行的情况，回答是：“认真执行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周总理从亲属口中知道，“三条”虽然执行了，可外地人还是千方百计找上门来。

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邓颖超说：“拆迁吧，我们出钱。”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事情一时没有定下来。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保存下来。如今，它已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敬爱和怀念的地方。

“有了孩子请务必告诉啊！”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乒乓球女运动员栗本君代（原名松崎君代），她受到了周总理“像对女儿或孙女般的爱护”。

她第一次认识周总理是一九六一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君代女士当时是上届的女子单打冠军，被称为“乒乓球女王”。可是，在北京的锦标赛上，却出乎意料地在复赛的时候被打败了。她第一局打得很好，赢了。第二局、第三局都是打到最后一分时，对方的来球不是触网而过，便是擦台而出，使她无法接球，因而失败了。但是，这位著名的选手并没有因此而恼火，相反，却处之泰然，主动向对方选手祝贺。

当时，周总理不在北京。他从外地的电视上看到了君代女士的比赛，非常喜欢她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锦标赛闭幕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为各国选手举行送别宴会。周总理参加了宴会，特地把君代女士的座席安排在自己旁边。周总理在致词的时候，特别提到君代女士的名字，说：“胜不骄，败不馁，她是体育选手的榜样。中国的选手应该学习她的技术和作风，两方面都学。”这使君代女士非常感动。

以后十多年中，君代女士几次应邀访问中国，都受到了周总理亲切的接见。她从来没想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竟然穿着洗得褪了色的衬衣，在家中吃最平常的饭菜，对她这样一位外国运动员又是那样慈祥 and 亲切。她觉得，周总理就像自己慈祥的父亲或祖父。

一九七五年六月初，君代女士再次来到中国。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地接待了她。谈话中，周总理知道她虽然结婚已经十年了，但还没有生育，因此非常关怀她。专门请了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为她检查，还邀请她的丈夫栗本隆朗一起访华，检查身体。

君代女士要回国的时候，周总理握着她的手说：“有了孩子，请务必早日告诉啊！”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关怀她。

如今，君代女士一想起这句话，就止不住热泪盈眶，向着中国的方向，面对大海，双手合十默祷……

“要扎根在草原”

周秉建是周总理的侄女。一九六八年秉建初中毕业，她主动申请到内蒙古大草原去锻炼。

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把秉建叫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吃晚饭了，端上来一盘炒苦瓜，他们边吃边谈。周总理说：“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最好的粮食就是精神上的支持，你说对吗？你到草原去当牧民，我们坚决支持。你到牧区去工作，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动摇。你的决心坚定不坚定？”

“坚定。”秉建回答。

“不要忽视困难。你过去不吃牛羊肉，到了牧区以后就要锻炼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这也很重要。”周总理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

邓颖超同志也对她讲了红军长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

秉建要走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握着她的手一再嘱咐她，一定要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和蒙古族同志搞好团结，做一个草原好女儿。

两年以后，秉建在内蒙古参了军。周总理知道后，很不赞成。总理对她说：“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也一样嘛！内蒙古这么多青年人，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了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你还是回到草原，还是要住蒙古包，永远扎根在草原。”

周总理还找了军区的负责同志，要他一定把秉建送回去。周秉建听从了伯伯的教导，愉快地回到草原。

一九七二年，贫下中牧推荐她上大学，她想起伯伯的教导，放弃了这个机会，以后又两次谢绝了到工厂当工人的推荐，一直生活在内蒙古的草原上。

一九七五年，周秉建向伯伯汇报，想好好学习蒙古语，以便更好地工作。周总理说：“学蒙古语的事，我是赞成的，这对工作有利，也可以更好地向群众学习。”这样，当年十月，秉建才考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专业。她表示：“我一定好好学习，毕业后还回到草原。”

这时候，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但还是关怀着下一代的成长。他送给侄女三个字：“还要看！”看她能不能在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走到底。

小刘的衬衫

小刘叫刘秀新，是北京低压电器厂的工人。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傍晚，她骑着自行车上街。她刚学会骑车不久，听见后边汽车喇叭响，心一慌就跳下车来，正站在快车道上。汽车司机赶紧刹车，但还是把小刘刮了一下，衬衫破了，后背蹭破了一点皮。这时候，小汽车的车窗帘刷一下打开，一个人关切地向外看着，小刘一见：哟，这不是周总理吗？司机急忙下车问她：“同志，碰着没有？”

小刘红着脸，忙说：“没事儿，没事儿。”

汽车里坐的正是周总理。他不放心，赶紧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下车，办好三件事：第一，马上用另一辆车送她上医院；第二，不要告诉她车里坐的是谁，以免她心里不安，更不要批评她；第三，要给她买件新衣服。

周总理还有紧急的任务，只好先乘车走了，请工作人员陪小刘到了医院。原来这位同志是周总理的医生。他为小刘作了细致的检查，刚检查完，医院的电话响了，是周总理打来的，询问小刘的伤势。周总理听说只是擦破了点皮，才放下心。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国务院的干部匆匆赶来，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衫，硬要小刘穿上。她不肯收，说：“我的衬衣破了，不怨司机，怨我呀！怎么能让你们给买呢！”

可是这位干部一定让小刘收下，说：“不然完不成任务，领导要批评的！”

小刘明白了，这是周总理送来的衬衣，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医生还请来小刘车间的支部书记和班长，和他们一起到交通大队去说明事故经过。

第二天，周总理又派人到小刘家里看望，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使刘秀新全家深受感动：“这真是咱们贴心的总理呀！”

这件包含着周总理的慈爱的衬衣呀，小刘怎么舍得穿？她一直好好地保存着，看见它，就给自己增添了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建设美丽的北京

北京是美丽的。可你们知道美丽的北京城里，每一座漂亮、雄伟、高大的新建筑里，每一处新建的居民区里，包含着周总理多少心血吗？

我们说几个小故事。

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建起来的。从设计到施工，周总理一直亲自过问。人民大会堂要建成一座万人礼堂，建筑专家们都感到为难，要容纳万人的会场，体积必须比普通的礼堂和剧场大十倍，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不好，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设计方案提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周总理知道了这情况，在一次设计会上说：“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本，物为人用’。让使用大会堂的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代表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己是建筑的主人。”

他启发大家：“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远，看天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着，他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屋顶棚，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周总理不是一位建筑家，可是他丰富的知识和从实践中得来的体会，一下子启发了建筑专家们思想，“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确定了。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穹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当你进入万人大会堂抬头仰望那圆形的屋顶、那海浪似的顶灯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周总理提出的设计构思给了建筑家们以智慧吧？这座大会堂同周总理的睿智一齐留在了人间。

人民大会堂一兴建，周总理就想到了这块地方原来的住户们，他指示为这些住户新修了楼房。人民大会堂建成的时候，还请他们去参观，请他们坐在大会堂里看一场电影。

天安门城楼要翻修了，周总理非常关心，一边听汇报，一边把模型拆开又组装上，一一问个明白，才放心地批准翻修计划。

现在的北海大桥宽敞平坦。从前这里是金鳌玉桥，拐好几个弯，常常出交通事故。改修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直线的方案，要把北海前面的古迹团城拆掉。周总理不同意，他亲自步行视察了现场，提出绕过团城的方案。结果呢？大桥也修了，团城也保存了。周总理是多么爱惜咱们古老的文化遗迹呀！

首都体育馆多么雄伟壮丽，它的馆址方位是谁定的呢？也是周总理。他老人家亲自登上广播大楼的楼顶，向西北方向眺望，确定了把首都体育馆建在紫竹院对面。

北京的建筑多么高才合适？周总理亲自做调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已经身患重病，天又冷，可是他还是冒着严寒，坐在运石料的电梯上，登上正在修建的北京饭店新楼第十六层屋顶，用望远镜观察了全市的高层建筑。从上面走下来，他已经很疲乏了，可是他只吃了一小碗面条，又冒冷风，顶严寒，徒步登上西华门的城台实地观测。最后才确定了首都高层建筑的高度。

周总理最关心的是北京居民住宅的建设。他指示，凡是盖大建筑，一定为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就近盖宿舍，给居民兴建住宅。从一九七一年以来，他讲了十几次，一定“要重视人民的健康”，“要为后代着想”，“绝对不做遗害子孙后代的事情”，“要把首都搞成一个清洁的城市”。一九七三年二月，重病中的周总理还登上北海公园白塔的平台上，亲自察看全市消除烟

尘的情况。他沉思地说：“首都烟雾弥漫，污染相当严重，要赶快采取措施解决啊！”

他还对石油化工厂的青年工人们说：“你们青年人要有志气，把黄烟消灭掉，让祖国的蓝天永远是晴朗的天空！”

一九七四年早春，周总理又一次在朝阳晨风中登上人民大会堂屋顶，指点着首都，畅谈未来的规划。

一个美丽、清洁、现代化的文明的新北京的蓝图早就在他心里勾画好了呀！

一张大字报

周总理太疲劳了。他天天从深夜一直工作到黎明太阳升起。他两鬓上一绺绺白发增多了，前额上一条条皱纹加深了。

怎么办？谁也劝不住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出一个办法：造他的“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一张大字报贴到他办公室的门上：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吸引了多少人呐，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表示支持。邓颖超同志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周总理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爽朗地笑了。二月四日他在大字报后面写上：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周恩来

但是，事实上，周总理还是日日夜夜地工作着，工作着。他像蚕一样，要把最后一口丝吐给人民。

总理的“礼服”

我们常常从照片上，在电视、电影中看到周总理。他穿着一套多么合身、多么整洁的灰色中山服啊。可你们知道吗？那套衣服补过不知多少次了。袖子上的补丁已经有袖子的三分之一大了。给周总理缝补衣服的工人师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含着泪说：“几十年啦，总理做了几件新衣服，我们记得清清楚楚；但是给总理修补衣服的次数，谁也无法数清啊！”

有一回，要接待外宾，周总理风趣地对工作人员说：“同志，我今天该穿那套‘礼服’了。”那位工作人员指着衣服上一块织补过的痕迹说：“总理，您这件‘礼服’早该换换啦！”

总理说：“这蛮好嘛，穿着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客人，织补的痕迹不要紧，别人看看也没关系，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总理还有一套睡衣睡裤，是一九五一年做的。多年来缝缝洗洗，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没有绒也没有格纹的白布了。这套睡衣，光是邓颖超同志就不知补过多少次了。可是，周总理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连出国访问都使用它。同志们劝他换一套新的，他总是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能穿的衣服扔掉了，不是太可惜了吗？”

还有那条浴巾，年头也不少了。有一天早晨，周总理发现毛巾换了一条新的，就问工作人员：“我的毛巾呢？”

“原来那条太破了，不能用了。”

“能用，能用！”总理连声说。一直到把那条毛巾找回来，周总理才洗脸。

那条毛巾后来补了补改成浴巾。后来，做浴巾也不行了，就改成擦脚巾。

总理有个补袜子用的袜板，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他从平山县西柏坡带进北京城，一直用到他逝世。

总理和理发员

北京饭店有位理发员朱殿华老师傅，他给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周总理常常亲自来饭店理发、刮脸。北京饭店有两个理发室，一个为贵宾和国家领导人理发，一个是普通理发室。周总理总是到普通理发室理发。有时候人多，他就和大家一样，坐在椅子上看报，排队等候。朱师傅和等候理发的同志都要让他先理，他总是笑笑说：“这不是一样嘛，大家工作都很忙。”

理发也是周总理了解情况的机会，他总是和同志们亲切地攀谈。

只是他太忙的时候，才请朱师傅到他家去理发、刮脸。每次总理总是在门口迎接朱师傅，握着他的手说：“老朱，又麻烦你走一趟了。”

有一回，朱师傅给周总理刮脸。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口子。朱师傅心里真难过，忙说：“总理，真对不起你，我工作没做好……”

周总理哈哈笑起来：“怎么能怪你呢，老朱，是我不好，咳嗽的时候，没有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要不，哈哈！”

说得朱师傅也笑了起来。

周总理怕他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当天非留下朱师傅一起吃晚饭不可。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住院了。朱师傅常到医院给他理发、刮脸。北京饭店的职工每次都托朱师傅向周总理问好。每次周总理总是说：“好，好，这不是很好嘛。”他要朱师傅转告大家，不要为他担心，他很好。可是对饭店的同志们却非常挂念，他问：“做西餐的老陈师傅病好些了没有？”“新来的小林情绪怎么样？”“大家在学习什么，有什么困难？”他在病重的时候，还想着一切普通人。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朱师傅有二十多天没有去给总理理发了。他心里着急，急得发闷。大家也都奇怪。他天天等电话，睡觉的时候也梦见给总理理发。新年到了，他实在忍不住了，给总理的秘书挂了电话：“过年了，说什么也得给总理刮刮脸呐！”

总理的秘书没有回答，老朱可更犯疑了。

一月八日，周总理突然与我们永别了！老朱简直不敢相信，他呆住了。接着放声大哭。

一月十日，朱师傅去给周总理遗体整容，他总觉得一进病房的门，就会听见周总理的招呼：“老朱，又麻烦你了！你看，我好了！”

从医院大门到周总理病房，只有几百米，可是这几百米怎么今天变得这么长啊！老朱一走进病房，就看见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他扑过去，哭叫着：

“总理啊，我跟您二十七年呐，在您最后的时刻，却没有给您理理发，刮刮脸，太对不起您啦！”

总理的秘书含着泪扶起他，颤着声音说：“年前，你让我捎信给总理，我捎到了。可是总理说：‘老朱跟我二十多年，看我病成这样子会难过的。就不必让他来了，谢谢他的一番好意吧！’”

老朱师傅凝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总理的安详的遗容，一边轻轻地为他梳理头发，一边热泪横流，口里不住地叫着：“总理，总理啊！”好像要把亲爱的总理唤醒，把他再还给全体中国人民……

手术之后

周总理病了，住院了，全国人民都为他的健康揪着心。

一九七五年年初，要为周总理做手术了。

手术以后，周总理躺在手术台上，慢慢地睁开眼睛，用细微的声音，轻轻说：

“请，把李冰请来。”

李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著名的医生。她刚刚走出手术室，听说周总理叫她，又急忙返回来，俯下身说：

“总理，您觉得怎么样？”

“我，很好。……李冰，……”

“嗯，我在这儿。”

周总理停了一下，轻轻喘口气，看得出他很虚弱。李冰心里非常难过，屏住气息，俯身到他床前。

总理吃力地动着嘴唇：“云南锡矿工人……肺癌的情况……你知道呀？”

李冰一听，愣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同癌症作斗争的总理，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想到的却是远在万里之外、边疆地区的广大矿工。

她含着泪点点头：“我知道，您放心！”

“你们要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去。”周总理说得很慢，很轻，但是很坚决。矿工兄弟的病痛在煎熬他的心呐！

李冰连忙说：“我就去，就去。请您别再说话了，您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忍住泪，低着头，急急走出手术室，站在走廊里，大颗大颗的泪水流下面颊。

遵照总理的嘱咐，医务人员跨千山渡万水，来到云南省锡矿区，普查和医治肺癌，工人们听说这是周总理在手术台上发出的指示，都滚下了热泪，面对北京的方向，祝愿工人阶级的贴心人、敬爱的周总理永在人间，永在我们身边。

最后的几句话

无情的病魔缠住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医生们的努力没有能够恢复他的健康。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周总理的病情十分危急。从下午开始，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护士守护在他身边，恨不得替他经受难忍的痛苦。

长长的一天呐，过去了。当天夜里十一点钟，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看一眼身边的每个同志，用微弱的声音，十分吃力地说：

“我这里没有事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快去照顾其他同志要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所有在场的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痛苦。默默地转过身，任泪水滴滴流下。

谁知道，这就是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几句话！

让这几句话响彻天空，汇入大海，长留在人间吧！

十个小时以后，周总理，我们最敬爱的人，永久闭上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停止了心跳。

啊，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别人，别人呐！

他永远活在祖国的大地上

他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离开了养育他的人民。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这块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然而，他觉得这还不够，他要把自己永远溶化在这可爱的疆土中，汇入奔腾的江河湖海里。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江河里。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难道他真的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吗？不，他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周围。

清晨，当第一线阳光照耀着你，那是他在向你微笑。

当你背着书包，踏着祖国的大路走向学校，是他在托扶着你迈出轻快的脚步。

当你在江河里游泳，你没感到他正在拥抱你吗？

当你戴上鲜红的领巾，你没觉得他的温暖的手正抱拢你的双肩吗？

等你长大了，你登上山峰守卫祖国的疆土，他同你并肩而立；你俯身在计算机旁工作，你身旁就闪烁着他慈祥的目光；你在舞台上唱歌，他就在观众席上亲切地凝视着你。他同你一道收割，一道操作机床，一道奔向新的岗位。在祖国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他的脚步，都有他的身影，他——大地的儿子，永远活在祖国的大地上。

爱他吧，因为他将永远引导你前进！

